

回忆录 激溇



第三十一卷
【桂林文史资料】

- 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 桂林市政协 印

漓江出版社

回忆梁漱溟

桂林文史资料 第二十三辑

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桂林博物馆 编

主编 魏华龄
副主编 罗标元
编辑 周德荣

(桂)新登字03号

桂林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

回忆梁漱溟

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桂林陆军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5 插页2 字数163,000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800册

ISBN 7-5407-1200-7/G·267

定价: 4.00元

纪念梁漱溟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目 录

- 梁漱溟先生生平……………新华社发（1）
- 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费孝通（5）
- 哀悼梁漱溟先生……………叶笃义（8）
- 沉痛悼念梁漱溟老师……………李渊庭（14）
- 我与梁漱溟先生的交往……………马秋帆（25）
- 梁漱溟先生及其在山东从事乡村建设的活动
……………万永光（31）
- 梁漱溟先生和桂林……………朱袭文（62）
- 漱溟先师在无锡国专讲学的情况……………萧德浩（66）
- 梁漱溟与中国民主同盟……………植恒钦（73）
- 梁漱溟先生与民主运动……………万永光（83）
- 怀念梁漱溟先生……………何砺锋（93）
- 梁漱溟先生在贺县……………薛汉权（96）
- 梁漱溟先生对进步青年的支持和帮助……………唐宦存（107）
- 梁漱溟与毛泽东……………汪东林（120）
- 对梁漱溟受到毛主席批判一事的补正……………陈 鸣（147）
- 梁漱溟与毛泽东1953年历史公案补遗……………汪东林（152）
-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的梁漱溟先生……………汪东林（157）
- 梁漱溟“文革”自述……………汪东林（176）
- 梁漱溟先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汪东林（194）
- 梁漱溟——中国最后的儒家……………秦时月（207）

漱溟先生的峻峭风骨·····	曾敏之 (213)
铮铮风骨 表里如一·····	牟小东 (217)
——悼梁漱溟先生	
梁漱溟先生的高风亮节·····	吴小如 (219)
廓然大公 物来顺应·····	张小曼 (222)
——纪念梁漱溟伯伯	
梁漱溟勸勉台湾青年·····	吕光光 (224)
病中未敢忘忧国·····	梁钦东 (226)
侍疾日记·····	梁培宽 (229)
编后·····	编者 (237)

梁漱溟先生生平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1988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梁漱溟先生，原名焕鼎，字寿铭，广西桂林人，1893年生于北京。1911年加入同盟会京津支部，顺天中学毕业后任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编辑兼记者。1916年任南北统一内阁司法总长秘书。1917年10月，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1924年辞离北大，赴山东主持曹州中学高中部。1928年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1929年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并接办北平《村治月刊》。1931年与梁仲华等人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院长，倡导乡村建设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8年访问延安。1939年参与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与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勱等商定将该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并赴香港创办其机关报《光明报》，任社长。香港沦陷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撤回

桂林，主持西南民盟盟务。1946年作为民盟的代表参加政协会议，是年再访延安，并以民盟秘书长身份，参与“第三方面”人士国共调停活动。1947年退出民盟后，创办勉仁文学院，从事讲学与著述。1950年初应邀来北京，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0年后相继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文化书院发展基金会主席等职。

梁漱溟先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甲午战争前一年出生的梁先生，与同时代的志士仁人一样，为民族独立、为国家富强积极追求探索。他曾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先赞成“君主立宪”，随后又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后来他转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向”。他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必须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并积极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但由于他认为中国缺乏阶级，不赞成用暴力革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到头来他虽付出“一生心血、全幅肝胆”的努力，仍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宿愿。新中国建立后，他“醒悟”到自己走的是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尽管如此，梁先生那种“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爱国初衷和为之奋斗的不懈努力是值得人们称道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先生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一起，坚决主张团结抗日，一致对外，提出“一多相容，透明政权”的主张。他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挑起“党争”、破坏抗战，忧心如焚。为联合中间势力，形成政团力量，促进联合抗日，梁先生发起参与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又是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1941年梁先生在《光明报》发表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明确主张“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1943年梁先生对国民党当局“民有痛痒务掩之，士有气节必摧之”的独裁专制极为不满，断然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操办的所谓“宪政实施协进会”。1946年梁先生任民盟秘书长，积极参加了当时的政治协商会议，同其他民主人士一道为争取国内和平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同年，梁先生受民盟总部委托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发表《李闻案调查报告》、《李闻被杀真相》，旗帜鲜明，义正词严地痛斥国民党特务的暴行。他激愤地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梁先生在白色恐怖面前，不畏强暴，表现出崇高的气节。解放前夕，梁先生拒绝参与国民党策划的假和谈，在重庆等待解放。1955年，他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台湾同胞归来欢聚”，使“祖国统一达到完整无缺”。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他同情并敬重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和为之进行的努力。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并没有妨碍他在争取独立、民主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梁先生曾两次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全国解放后，他为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的形势所鼓舞，庄严宣布：“我已经认定跟着共产党走了。”并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同时，他以“帮助共产党认识旧中国”为己任，对解放初期的政治运动提出意见和建议。1974年在

“批林批孔”运动中，梁先生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批判孔子与批判林彪相并提，并为刘少奇、彭德怀同志辩护。当受到围攻时，他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在“四人帮”猖獗一时，万马齐喑的境况下，梁先生不顾个人身处逆境，仗义执言，表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敢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品格。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梁先生对我们党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十分欣慰。他坚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是有希望的。

梁漱溟先生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是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在半个多世纪里，他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著作，主要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论文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我的自学小史》、《中国文化要义》等。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梁先生重新活跃于学术舞台，完成了50年前着手的《人心与人生》，出版了《我的努力和反省》、《梁漱溟教育论文集》等。他还参与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并亲自为学员授课、答疑，接待来访的国际著名学者。梁先生为弘扬民族文化，扩展中外文化交流，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新华社发）

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

(1987年10月31日在北京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费孝通

今天，我能来参加关于梁漱溟先生思想学术的讨论会，感到很荣幸。因为梁先生是我一向尊敬的前辈，是当代中国一位卓越的思想家。我学生时代就读过他的书，虽然没有全都读懂。但梁先生的确是一位一生从事思考人类基本问题的学者，我们称他为思想家是最恰当不过的。

梁漱溟先生在他自己1984年出版的《人心与人生》一书的第27页这样说：“我曾多次自白，我始未尝有意乎讲求学问，而只不过是生来好用心思；假如说我今天亦有些学问的话，那都是近六七十年间从好用心思而误打误撞出来的。”

好一个“好用心思”，好一个“误打误撞”！这几句简单的心里话，正道出了一条做学问的正确道路。做学问其实就是对生活中发生的问题，问个为什么，然后抓住问题不放，追根究底，不断用心思。用心思就是思想。做学问的目

的不在其他，不单是为生活，不是为名利，只在对自己不明白的事，要找个究竟。宇宙无穷，世海无边，越用心思追根，便越问越深，不断深入，没有止境。梁先生是一生中身体力行地用心思，这正是人之异于禽兽的特点，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属性。人原是宇宙万物中的一部分，依我们现有的知识而言，还只有人类有此自觉的能力。所以也可以说，宇宙万物是通过人而自觉到的，那正是宇宙进化过程本身的表现。进化无止境，自觉也无止境。思想家就是用心思来对那些尚属不自觉的存在，误打误撞，把人类的境界逐步升华，促使宇宙不断进化。

我正是从梁先生的做学问和他的为人中，看到了一个思想家之所以成为思想家的缘由。他的思想永远是活的，从不僵化；他可以包容各种学科，各科学说，从前人用心思得到的结果中提出新问题，进行新思考，产生新的学问。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人不唯上、唯书、唯经、唯典？为此舞文弄笔的人也不少，却常常不敢寻根问底，不敢无拘无束地敞开思想，进行独立思考。可见要真正做一个思想家，是多么不容易。正因为是物以稀为贵吧，我对梁先生的治学、为人，是一直抱着爱慕心情的。

我原本想就梁先生用心思打撞的问题提出一些我自己不成熟的看法，但这几个月来一直没有坐定过。因此这次讨论会上我不能提出论文来求教于梁先生和诸位到会的学者，请予原谅。我只能利用这个机会表达我为什么爱慕梁先生的心意。我认识到他是一个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认真求知的人，一个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说真话的人。我认为，在当今人类遇到这么多前人所未有遇到的问题的时刻，正需要有更多

的这种入，而又实在不可多得。什么是文化，文化不就是思想的积累么？文化有多厚，思考的问题就有多深。梁先生不仅是个论文化的学者，而且是个为今后中国文化进行探索的前锋。限于我本身的水平，我对这位思想家的认识只到这个程度，仅能提供与会的朋友们、同志们作参考。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为大家庆祝梁漱溟先生从事教育科研70周年和95岁寿辰表示祝贺。我敬祝梁先生健康长寿，为中国思想界作出更多的贡献。

哀悼梁漱溟先生

叶笃义

随着岁月的增长，记忆力的功能正在急速减退，然而记忆的选择性仿佛也在增强了。一些事情忘却了，而另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更鲜明起来。对于梁老的记忆正属于这样一些事情。

浩繁的往事往往难以冲淡人们最初的记忆。我首次见梁先生是我第二次到重庆参加民盟中央工作的1946年4月。我一到重庆就担任协助接待中外记者的工作。当时梁先生是民盟的秘书长，所以我一上来就同他有很多的接触机会。

“你是中国的圣雄甘地”

梁先生一个人出去见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的时候，总是带着我担任翻译。除了梁先生而外，张君勱和罗隆基，他们以国外关系委员会主任和宣传部长的身份，同外国人接触机会更多。但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对梁先生特别尊重。不只一次，马歇尔、司徒雷登当面称赞梁先生是中国的圣雄甘地，当时担任翻译的我听了这样恭维的话也感到与有荣焉。

“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从1946年六七月起，蒋介石在全国发动全面大规模的内战，政协和和谈活动均已停止。周恩来为了抗议，由南京移到上海居住。9月30日，周分别致函马歇尔及蒋介石，说明倘不停止对张家口的进攻，那就是和平的全面破裂。10月10日梁先生由南京到上海去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夜车，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到南京，下车一见报，看到蒋军已攻下张家口的消息，不禁惊叹地对记者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这是当时南京报上遍传的趣话。

10月15日先是雷震，以后是吴铁城、邵力子到上海，敦促第三方面（民盟、青年党及社会贤达）出面劝周恩来到南京继续和谈。当我们提到梁漱溟的“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的趣语时，青年党的李璜大发“死马当活马医”的议论。

10月21日周恩来终于在第三方面的敦请下乘飞机由上海到南京。陈家康（当时中共上海发言人）在20日发表的继续和谈的声明说：“国共之外，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精神为民主和平呼号奔走，悲天悯人，可感可泣……”中共声明中的这个“死马当活马医”的提法就是针对梁漱溟及李璜而言的。

我参加政协秘书处的工作

重庆的政协除了参加进去的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及社会贤达五个方面各派一个代表团组成外，另由国、共、民盟、青年党各出一人组成政协秘书处，协助各

该代表团工作。代表国民党的是雷震，代表共产党的是齐燕铭，代表民盟的是蒋匀田，代表青年党的是刘东岩。

张君勱在当年8月间在民社党改组成立（民社党和海外宪政党于1946年8月合并成立）大会上虽然抵制住了立刻退出民盟的建议，但会后他受到党内反民盟势力的压力，越来越在民盟内部闹独立性。9月间他给民盟梁漱溟写了一封信，说以蒋匀田为民社党驻民盟的代表，民盟发表的任何公开文件必须事前经过蒋匀田的同意。这样一来，岂不是蒋匀田成了民盟的太上皇了吗？当时梁漱溟认为蒋匀田只能是代表民社党参加政协秘书处，而不适宜再代表民盟了。于是，他以民盟秘书长的身份改任我担任民盟政协代表团的秘书。从此，第三方面政协代表们开会的时候，作为秘书代表民盟与会的除了蒋匀田而外还有我。

梁先生脱离了民盟

蒋介石在10月16日发表声明，提出和谈的八项办法，前七项提出中共所无法接受的军事及制宪要求，最后一项提出，如中共接受这七项条件，他就下令停战，“在下令的同时，共产党应宣布参加国民大会并提出其代表名单”。中共中央紧跟着在10月17日发表声明，提出针锋相对的两项反建议：1. 军事恢复1月13日停战协定生效时的双方驻军地位。2. 承认实行政协一切决议为一切政治商谈的准则。

国民党八条，中共两条，是针锋相对，无法调和的。于是，第三方面推出以梁漱溟为主、以黄炎培和莫德惠为副的三个人起草了第三方面的方案。这个方案，根据民盟和中共之间的默契，本应事前和中共接头通气才对。这一点梁等并

未做到。这个方案共三点。第一点关于军事，第二点关于地方政权，实际上是迁就了蒋介石的八点，而和中共的两点大相径庭。除此而外，还把中共驻军地点限为齐齐哈尔、北安和佳木斯三处，又提出蒋介石可以派警察接收中共所在铁路沿线的各县地方政权。这个方案于10月28日送到国、共、美三方。

上述方案首先送到共方，理所当然地遭到周恩来的严厉斥责。幸而虽然已经送到国、美两方，但在时间还来得及之前，即时撤收回来，使该方案未能发生作用。

第三方面调解失败，梁先生感到内疚，随即离开南京到四川北碚勉仁中学。从此最后脱离了民盟。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全国解放后，梁先生自四川来到北京，任全国政协委员。这是一个荣誉职。1953年他遭受不实事求是的批判，但他淡然处之，没有做违心之论的自我检讨。“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同全国人民一样，遭到抄家、没收、扫地出门的待遇。但“文革”后落实政策时，号召大家申报所受损失，他却拒绝申请。他说：“我所受的损失，不是任何金钱所能补偿回来的。”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时，他公然反对把林孔并列，提出只批林而不批孔。这种“披逆鳞”式的行动自然遭到有组织的围攻。在群众批判之后，让他表示一下自己的思想反映时，他却傲然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两句话来做回答。此外，他还写了一篇《今天我们如何评价孔子》的文章，最后提出“不妨拭目以俟之，可耳。”这篇文章写于1974年6月批林批孔运动高潮当中，注明“一九七四

年十一月八日立冬撰写完成不发表。”《群言》杂志在1985年第2期、第3期上分期刊出。

“何思何虑，至大至刚”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管押在秦城监狱。“文革”以后，我同梁先生分配在同一所公寓，因而来往比较方便。我撰写民盟历史时因核对当时情况常常就近请教他。我现在把他写给我的一封信全文抄录如下：“顷承移步过我叙谈甚快。留示之件亦经读了。叙述当年事实基本无误。我存有记录亦尚可供参考。再则我每念前闻兄所谈往年被管押几年中思想感情的变化进境极为可贵。亟盼兄写出贻示后人，人生经历即是真学问远胜理想空谈也，手布敬叩大安，漱溟再拜。”随后，他又写给我一副对联。上联是“何思何虑”，下联是“至大至刚”。梁先生心中所说的“大”和“刚”的具体内容，我们可能不尽同意，但他的“何思何虑”，则我确实认为，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他确能做到心口如一，而不“思虑”到个人的得失的。

梁先生的最后一次学术讲演

费孝通同志主办的《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今年在香港大学举行，研讨的题目为“中国宗教伦理与现代化”。为了筹备这项工作，他去年曾托我特请示梁先生能否同行。台湾方面的钱宾四（穆）先生也拟届时由台湾前往香港。彼时梁先生的健康条件确实无法承担如此跋涉之劳了。他说他亟愿为“中国宗教伦理与现代化”这个题目做一个录像讲话。于是在去年10月由民盟安排在他家里做了一个十几分钟的录

像。这个录像带由孝通同志带到香港大学去播放，深受与会人士的欢迎。这是他一生当中最后一次学术讲演。

他住进医院时，已疲惫无力，躺在床上，神智虽然还清楚，但不能多讲话了。有一次我去看他，正好刚从台湾来的一个人，由一位中国文化书院的同志陪同一道去看梁先生。他看到梁先生的样子，知道无法进行对话了。于是他站在梁先生病榻前面，央求陪他一道去的人为他照了一张像。他又拿出本来预备同梁先生对话时所用的录音机来，一个人在机前喃喃自语讲了大致如下的一小段话：“我是一个刚刚由台湾来的人。我在台湾时候就对梁先生的著作有所接触。来到北京，我首先提出来要求见见梁先生。我今天见到了梁先生是我莫大的荣幸。我要求见的是一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不随风倒的如×××式的人物。……”讲完了上面一段话后，他就向梁先生鞠躬告退了。

偶然机会，碰到这样一个插曲，我不禁更进一步感到梁先生确是一位值得使人尊敬的人。

1988年7月1日

沉痛悼念梁漱溟老师

李 渊 庭

梁老师离开我们已满两个月了。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对老师的思念之情与日俱增，无时或已。6月23日，梁老师逝世后，我曾写了这样一幅挽联：

治学邃于思辨，抉幽发微，著述等身；首创东西文化比较研究，弘扬东方学说，探索人生真谛，自成思想体系，中外共仰，道德文章无愧一代宗师。

处世巍然卓立，尽瘁国是，席不暇暖；发起豫鲁乡村建设运动，组织民主同盟，创办光明日报，关心民间疾苦，宠辱不惊，高风亮节堪称举世楷模。

我写这篇悼文，就是略述它的含义。

梁老师毕生致力于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一是中国前途问题。他老人家从青年到晚年，始终围绕这两个问题读书、讲学、写作并从事社会活动。从外表看，梁老师是位文质彬彬的读书人，而实际上，他老人家是一位英勇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不少知名之士主张中国学

习西方，要全盘西方化，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甚嚣尘上。梁老师当时已在北大任教，主讲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他热爱东方学术，对当时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感到苦闷和不安。于是首创东西文化比较研究，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提出人类文化发展三阶段理论，指出：“中国文化不是落后而是早熟”，“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本书在1921年秋出版，到1929年印行八版，在批评全盘西化，阐扬和维护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发生了很大影响。

1928年，梁老师在广东曾提出开办“乡治讲习所”建议，因审量时机似仍未到，决定先到国内各地考察乡村运动。梁老师认为挽救中国的道路，必须从我国是农业国的国情出发，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逐步改造中国社会。1929年以后，他积极从事乡村建设运动，主编《村治》月刊，先后参与创办河南村治学院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以邹平、菏泽等县为实验县，创办乡学、村学，普及教育，试行政教合一，移风易俗，兴修水利，推行科学种田，提倡发展农副业生产，举办农民贷款，流通农村金融，……这些做法，在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农民生活和社会风气方面，收到一定效益。固然，在当时蒋介石厉行独裁统治，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图谋大举入侵我国的形势下，梁老师的从乡村建设运动入手，提高群众民主政治意识，改革我国政治和经济的想法和做法是不会成功的，但是他热爱祖国，探索救国途径的热忱是十分感人的。

1935年秋后，梁老师鉴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之势咄咄逼人，曾向山东当局建议在推行乡建运动的同时，作全民抗日准备，分期分批训练民兵。但“七七事变”后，梁老师在山

东目睹韩复榘对日本侵略不战而逃，蒋介石部队节节败退的情况，对抗日前途产生了悲观情绪。1937年12月下旬，乡建的梁仲华等率领了鲁西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和实验县的八个师范院校师生1000多人，从邹平撤退到河南镇平，安排了带出的人员后，即到武汉，联系访问延安。

1938年1月1日，梁老师首次登程访问延安。梁老师这次访问延安，可以说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毛主席与他谈了八次话，有几次是通宵长谈，给他讲了《论持久战》的主要内容（当时尚未公开发表），论证了日本侵略必败，我国抗战必胜的道理，使他改变了悲观情绪，“心中烦闷一扫而光”，焕发了为促进团结抗日而尽力的信念。由于这次访问延安，目睹了延安的党、政建设和人民生活安定的情况，使他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怀疑和批评态度。虽然当时梁老师在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上（存不存在阶级）以及将来抗日胜利后如何建设新中国，有他自己的看法，但对延安一切讲道：“完全佩服，非常佩服。”

1939年2月初，梁老师带了五六个朋友和学生，到豫、鲁、晋、皖、冀以及苏北等八大省市部分敌后游击区巡视，于10月上旬返抵成都。在八个多月中，他到过50多个县市，食宿过的村、镇将近200个，经历多次惊险奔波，备尝饥渴风雨之苦，多数是在黑夜赶路，辛苦可想而知。对这次巡视各战地，梁老师说：“总括起来，有三句话：第一句是老百姓真苦；第二句是敌人之势已衰；第三句是党派问题尖锐严重。”

为了促进国共团结抗日，梁老师奔走于重庆、成都之间，联系一些知名人士，先后发起并参与创建“中国统一建

国同志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并亲自到香港创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光明日报》前身）。1941年9月18日在在创刊的《光明报》上发表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明确主张“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厉行法制，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

梁老师参与组建民盟，创办《光明报》，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周恩来副主席的关怀。1941年3月下旬，梁老师决定到香港办报，在离渝前夕，到曾家岩看望了周恩来同志，就民主政团同盟工作和办报方针问题作了商谈。梁老师说，当时在香港工作的中共党员范长江同志对他办报亦予以很大关怀和帮助，《光明报》的报名，还是范长江同志提出的。国民党方面，除了造谣诬蔑外，竟派孙科到香港阻挠报纸出刊，勾结香港当局，对梁老师百般刁难、威胁、迫害，《光明报》出刊后，借审查大开“天窗”，大段大段内容被删除。梁老师置之不顾，在《光明报》上发表多篇文章，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罪恶行径口诛笔伐，直至日军入侵香港，《光明报》被迫停刊。1942年，梁老师住在桂林，国民党刘百闵从重庆来到桂林，对梁老师说：“蒋先生（介石）对梁先生很恼怒。”梁老师一笑置之。

1946年初，梁老师作为民盟谈判代表团成员之一，积极参加了旧政协会议，为争取和平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5月，梁老师担任了民盟秘书长职务。在云南的闻一多、李公朴两位民盟领导人被暗杀后，梁老师义正词严地痛斥国民党特务的暴行。他激愤地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

“我在等待第三颗子弹！”在白色恐怖面前，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接受民盟总部委托与周新民同志一起飞赴昆明，与云南民盟支部相配合，对李、闻惨案进行调查。他们深入下层，走访各方，最后根据调查材料，梁老师亲自写出《李闻案调查报告书》，指出：杀害李、闻两位烈士的凶手和主使者就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部”。并讲：“我们今天所要作的，绝不在枪毙几个大小特务，为李、闻二先生抵命，乃在证实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政治上的罪恶，而取消特务机关。”

这年10月底，梁老师鉴于国共和谈面临失败，和平无望，便离开上海、南京回到重庆北碚，从事写作、办学。梁老师一向认为，建设新中国，必须认识旧中国。他为了帮助人们认识旧中国，于1949年写成并出版了《中国文化要义》一书。

1949年，北京解放后，梁老师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让我设法转交，信中主要说明他“三年内对国是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他在这年发表的《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提出“我就要求作一诤友”。

1950年1月中旬，梁老师应毛主席、周总理之邀来到北京。1951年，在全国政协第一届三次会议上，被增补为政协委员。梁老师在这次大会上作了《信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改造自己》为题的发言。发言中曾讲：“我们的会议在听取报告表示拥护之外，是不是亦可以亦应该有些合理化建议呢？”表达了他想进言的意向。

1951年10月，梁老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长文，开始检讨自己的错误。1952年5月，他又写出《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长文，进一步分

析了自己过去过分强调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不承认中国社会存在阶级和武装斗争的错误，认识到自己走的是改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梁老师将他写出的这篇检讨自己错误的文章，送请毛主席指教。后来毛主席对他说梁先生思想有进步，还应继续努力等意思的话。

1953年9月，在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次会议上，梁老师在周总理的一再邀请下，发了言。他在表示拥护总路线之后，提请领导上注意农村问题，把他听来的在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农民生活艰苦的话，都讲了出来；他还讲，交通运输和轻工业的发展，领导上一定也有一个相应的规划，希望大家知道。他本着1951年他曾讲过的，在政协会议上，除了表示拥护还应有些合理化建议的精神，讲了自己心中要讲的话，不料这一席发言，遭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导致一年多的对梁老师的大批判。

梁老师从1950年1月到北京后，两年多来曾多次受到毛主席的邀请接见，是毛主席的座上客；至此，一下子就成了反动派、反面教员，过去的一切活动和言论都被否定。在受到如此重大委屈的情况下，他懊悔的却是自己不该在大会上顶撞毛主席，不该把朋友讲的话拿到大会上讲，政治影响不好，检讨自己不该意气用事，而未动摇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

1957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前，周总理召集少数知名人士座谈，征求意见。梁老师应邀出席，发言说“赞成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并说：“一让两有，一争两丑。汉族与少数民族，都要互以对方为重。”周总理总结时说：“我同意梁漱溟先生说的‘要互以对方为重’这句话。”

“互以对方为重”是中国人的传统精神，梁老师应用到处理社会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的关系上，启导了时代的新机运。

在十年动乱时期，梁老师遭遇了被抄家、游街、批斗等等冲击和折磨。在“四人帮”猖狂摧残中国文化、摧残老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在万马齐喑之时，梁老师为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为维护人的尊严，再次仗义执言。1974年春，在当时热火朝天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梁老师坚持应一分为二看孔子的观点，历数孔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建树与影响，反对把孔子与林彪相提并论，毅然指出刘少奇和彭德怀都是为国家和人民公开提出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梁老师在被大会围攻三天之后，宣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1974年春节，我和老伴给梁老师拜年时，谈起当时开始宣传的“批林批孔”运动，梁老师讲：“他们批林、批孔、批周公，你们知道么？批周公实际上就是批周总理！”梁老师多年来敬重周总理。他在政协学习会上，就“批林批孔”运动作的长篇发言，不但是维护中国传统文化和人的尊严，而且有现实意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梁老师一边受大会、小会批判，一边愤笔写作，写出《我们今天应如何评论孔子》一文后，继续撰写《人心与人生》一书，1975年7月初脱稿；接着又修改了早年写的《东方学术概观》，补充《人心与人生》一书中对东方学术弘扬之不足。

《人心与人生》一书，是梁老师探索人生真谛，历经50年之久的苦心钻研而写出的著作。他参考了古今中外有关专家、名人的大量著作，综合有关人类研究的各门科学而会

通，对人心与人生作了深入分析，指出：“人类生命异于动物生命者，在人类不断争取上进，在有自觉，在有理性。”

“暴力——强霸之力……此斗争本能为人类同于动物所未能免。当其掩复着理性、理智而行动，即愚蠢可悯，人类原不只有聪明，绝不愚蠢呀！”“鄙弃暴力，屏除一切暴力，人类将来有可能有这一天。”并讲：“假如整个社会人生艺术化……那应当是人类文化最理想优美的极则吧！”书中再次指出：“世界最近未来是古中国文明之复兴。”

在大半个世纪中，梁老师为国家、为人民做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好事，真是屈指难数呵！行文至此，我不禁老泪纵横。

记得在勉仁斋师友中，陈亚三先生1965年春因患肺癌在北京病逝后，梁老师曾邀黄良庸、张云川、郭大中和我多人，在陈宅聚会，慰问陈夫人。梁老师说：“亚三先我们而去，良庸也可能先我而走，我还不能走，因为我要写的书还没有写完。”果不出所料，黄先生于1976年11月在北京病逝。

十年动乱初期，1966年8月26日，梁老师家被红卫兵抄了个精光，上房被红卫兵霸占，逼梁老师和夫人住在临街门的一间小南屋——原来堆放扫帚等杂物的小屋。南屋一无所有，老师和夫人就睡在地上。有次，我偷着和郭大中去看望他老人家，他很高兴，谈了被抄家的情况后说：“我曾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我尚未写完的《人心与人生》一书底稿，被红卫兵抄走了，希望毛主席设法把这个稿子发还我，以便我继续写下去。我还说：这个稿子千万毁不得，如果毁了，我生于斯世何益？信发后不久，原稿就退回来了。”老人家谈这段话时，面有喜色。

其后，梁老师被勒令从住了半个世纪的祖居——小铜井一号迁到铸钟厂一间小东屋。当时，我也被“专政”，政协红卫兵停发了我的工资，收回了公费医疗证和出入证，宣布政协不要我了，并勒令我呆在家中，不准与梁老师往来，不准到政协。之后，又被作为我妻家属下放湖北沙洋人大政协干校劳动。1972年才回到北京。其时，梁老师已迁居朝阳区新中街一套两居室的小楼房。我回京后即看望了梁老师。11月，黄艮庸、马仰乾两先生从广州回到了北京，梁老师在全素斋请马、黄两位先生吃饭，函邀我作陪、聚会，我依约赴会。在当时那个风声鹤唳的形势下，都仍不便多走动，梁老师从这封信开始，即与我通信联系，告诉我他写出了什么文章，嘱我取阅，每封信都流露想与我见面之情。

1976年4月21日，梁老师在写给我的信中说：“我今年已84岁，虽身体无病，精神如常，但人寿毕竟有限，艮庸病入广州医院，我写信给他，说他生命力已衰，或将先我而去，我亦不出一二年。我不出一二年的话，我且泰然说给培恕，并将一些身后事详细嘱咐培恕。盖我要写的书都写出了，此生负担的历史使命大致完成，我国可去矣。……”

回忆1926年，梁老师在北京大有庄开始写《人心与人生》一书，边写边给我们讲，他讲的时候用了两个英文名词：Awareness, Consciousness，他讲这两个英文名词的声音，现在仍在我脑中萦绕。这两个名词的中文意思是自觉与意识。他讲：“人类是从生物进化演变上来的，是生物进化史上的顶点，生物进化到人类，才开始突破了本能而得以大解放，开出了人类的创造性。人的一颦一笑，吟一首诗，唱一曲歌，画一幅画，乃至科学上的发明，都是人类创造性的

表现。人类生命是从下向上翻新的，他是刻刻不停，生生不息地在那里向上翻新。”他当时讲这段话时的音容笑貌仍然活在我的心里。我原以为梁老师可以活到百岁，想不到他竟然一病不起，辞我而去。他的逝世，使我领会到心丧的意味。当时听他这段讲话的师友，10多个人都已逝世，今天活在人间的只有我一个人了，尤其使我悲痛不已。

今年春节——2月17日上午，我的儿子李润霖陪我去给梁老师拜年，我问他看了我们为他写的年谱没有，他说“看了些”。我又问怎么样？他说：“太密。”我当时以为是抄写的密了，没有再问，最近听培宽讲，他是嫌内容太多了。我原也想删掉一些，但为了较详细的反映梁老师一生的思想变化和曲折道路，则宁可详细些，不能失之过简呵！由于为梁老师编写年谱，使我对梁老师的一生有了更深的了解，对他一生勤奋治学，为国奔波，关心民情，直言进谏的精神十分感佩，所以写了那幅挽联。

95岁高龄的梁老师，近年来肾功能日衰，终日默坐，甚少开言。今年4月13日回良乡祖坟扫墓之后，病情日益加重，于25日住进协和医院，医生诊断为尿毒症。梁老师住院期间，我和我老伴多次看望，表面看去，病情稳定。我对他说：“一切听老天安排，自己不必着意。”他深深点头。我老伴说：“希望先生早日康复。”他说：“我已命尽，康复不了了！”我最后一次去看梁老师时，坐在他病榻前，彼此对看多时，他看出我要想讲话，说：“我已没有讲话的力气了！”看到梁老师病情日趋严重，我的心情非常忧伤，两条小腿突然紫青，浮肿的厉害，不好行走，只好命我老伴和儿子李润霖代我到医院看望。6月23日上午10时，我老伴打电话

到梁老师病房，得知病情不好，便立即赶往医院。我老伴走后不一会儿，我在床上模模糊糊入睡，梦见梁老师手持一物向我走来，我用手接时，惊醒了。看表已11点多钟。我不由得衷心哀痛，感到梁老师已离我而去了。下午两点多钟，我老伴回来时，见我木然呆坐，惊问我怎么了。我也从她的脸色看出情况不好，一问，梁老师正是在11时35分辞世的。

64年的师生关系，彼此了解越深，情谊越厚。

“儒家孔门之学，反躬修己之学也。孔子固尝自述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吾人可以看出孔子只在自家生命生活上理会，而不在其外，却又须知自家生命宇宙天地万物浑然一体而不可分的，是故孔子周游列国，便有‘孔席不暇暖’的话。

修己亦云修身慎独，可取孟子、大学、中庸互参。”

这是1987年，梁老师在他95岁寿辰时，亲笔写在我笔记本上的一段话。今年6月初，我到医院看梁老师，他在病榻上侧转过身来久久望着我，好象有什么话要讲，我问他“想对我讲话么？”他断断续续问我：“你比我小多少岁？”我说“我今年82岁，小13岁。”老师还是望着我，没讲话，流露出一一种深切希望的目光。今日回想起来，倍感哀痛。我一定不辜负梁老师的教诲，努力学习，时时刻刻做慎独的功夫。不敢稍有懈怠，以慰老师在天之灵。

1988年8月23日于北京

我与梁漱溟先生的交往

马秋帆

数年前，我曾经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写过“梁漱溟”这个辞条，1987年10月末，我写了重新认识梁漱溟教育思想的文章，在北京参加了“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最近又受友人托，为《教育大辞典》撰写“梁漱溟”辞条。在查阅有关资料时，引起了若干回忆。梁漱溟先生已经逝世，然而许多往事和梁先生的音容笑貌时刻萦绕在脑际，使我深切怀念，永远难忘。

我和梁漱溟先生有师生之谊。我曾在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乡村教育系和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民众教育系学习，梁先生在这两个学院都讲授过乡村建设理论（曾任江苏教育学院特约讲席教授）。我除了听他讲课外，还多次拜谒他，请他指教一些问题。1938年夏天，四川教育学院在歌乐山乡村建设社举行讲习会，我听漱师讲了几个专题，特往他的住处拿出纪念册，请他惠赐教言，他给我题了“自爱爱人，自新新民”八个字。不久我又单独到重庆市内看望漱师，他约我在张家花园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先生的书斋中回答我提出的关于乡

建问题，由我笔录下来。他对问题分析得很详细，未能尽意，又约定我次日在原地址继续谈话，我仍然作笔录，使我受到很大启发。1939年秋，漱师又来重庆，住在青年会的高楼上。当时我在重庆出版的《现代读物》上发表了《抗战二年来的乡村建设运动》一文，我将这篇文章赠送给他并与之长谈。临别时，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对你很抱希望！我深信只要少数有志之士能够认真考虑人生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发出深心大愿，洗涤俗见俗肠，致力于乡建运动，中国就会有救。”他的这番话使我深受鼓舞。我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学习时，再次听漱师讲乡建理论，又和他多次长谈。后来我在桂林七星岩背面农村中的实验国民中学任导师时，他曾偕董渭川先生到这个学校参观过。

1945年初冬，成都五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华西协合大学）邀请梁先生在赫斐院讲学。当时我任教于光华大学，特陪同他到达华西协合大学赫斐院广场，当天他讲的题目是《中国文化与政治之出路》。晚间，五大学部分负责人和教授柯象铎、罗忠恕、蒋旨昂等又请他开座谈会，我也陪同参加。会上大家提出不少问题，他对其中某些问题作了回答。

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血案发生，梁先生曾往昆明调查，并以民盟秘书长身份发表书面谈话。他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我在这里等待着他。”（见《人民英烈》）他能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大义凛然，令人敬仰！

1946年我任教于华西协合大学，常与住在北碚的梁漱溟先生通讯。他曾赠我一个条幅，写的是：“发现真理，须要

有超凡的怀疑，同时要有非常的武断。没有怀疑，不能启其门；没有武断，不能进入。”

1948年暑期，梁先生特派勉仁文学院赖钧伯教授来成都招生，我对赖先生尽力相助，把华西协合大学一些教室借给他作招生之用，并在《西方日报》上发消息，介绍勉仁文学院近况及对梁先生退出政治协商后继续研究文化问题加以赞扬。

1949年梁先生撰写完成《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交成都路明书店出版。他致函给我，嘱我为该书做校对。当时我工作甚忙，负责校对了该书的前一部分，其他部分由江东之校对。

建国初期，梁先生到北京。我曾有意到华北革大学习，特请他作介绍。他致函中共中央统战部徐冰同志，介绍我与孟同志二人。徐冰同志复信给他，说明孟同志现在在北京，无工作单位，可以到华北革大学习；马同志现在在华西协合大学任教，不必来京学习。他将这种情况转告我，同时中共川西区委统战部洪秘书长又约我面谈，再次表明中央统战部的意见，恐怕我闹情绪，我很感谢！

1952年我奉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调派来沈阳，任教于东北教育学院。是年10月，我偕吴伯萧、周传儒及东北教育学院第二期毕业学员赴北京参观学习，特抽时间往颐和园长廊附近的住宅拜谒梁先生。他见到我很高兴，留我共进午餐，他和我畅谈一直到午后3时。他仍然关心中国文化研究及世界文化比较研究问题，并表示自己不愿参加在政府之内，只愿在政府之外效力。

梁先生在京曾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一文，他把这篇文稿分别交给他在北京的朋友们看过，又于1953年把这篇文稿寄给他的外甥邹晓青（当时东北人民广播电台台

长)，并囑邹转送给我请提意见。我读了这篇文稿（是用毛笔写的很工整的小楷），感到很欣慰！因他在解放前非常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性，认为中国革命是从外引发，而非社会内部自发，因而倡导乡建运动，注重多做教育工作，去调整社会关系，以团结求统一，反对以武力求统一。他是不轻易改变这种观点的。然而，现在他却承认错误，发觉自己是改良主义者，并能揭出其思想根源，作些分析检讨，也真不容易！我写了对这篇文稿的读后感奉函给他，又将这篇文稿转寄给四川的宋乐颜。

50年代中期，全国报刊对梁先生的思想展开批判。1957年6月，我到北京全国政协俱乐部出席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40周年纪念会之后，特往德胜门内积水潭小铜井一号看望梁先生，他告诉我潘梓年曾约请他参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座谈的一些情况。我提及：“近年国内发表不少批判老师的文章，不知是否打算写点什么？”他回答：“我不想写什么。”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梁先生任全国政协常委。我多次赴各地出席一些学术会议，经过北京时，我特往木樨地22楼5门17号和梁先生晤谈。他心情舒畅，著述不辍，他的《人心与人生》等书得以出版，他的几本旧著也陆续再版。在美国有梁漱溟思想研究会，美国学者艾恺著《梁漱溟传》，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日本建立“梁漱溟先生教育基金会”，定期鼓励优秀的中国留日学生，并作为日本翻译出版《梁漱溟先生全集》的部分费用。近年我国掀起文化研究的热潮，中国文化书院举办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曾邀请梁先生讲学，报社记者多次采访他并发表他的谈话，引人注目。特别是《团结报》连载了汪东林同志的《梁

漱溟先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长文和《人物》双月刊连载了汪东林同志的《访梁漱溟问答录》长文，使学术界对他生平一些重要史实及其思想有了较多的了解。正因为这样，他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声誉日益增高。

1987年10月末至11月初，中国文化书院邀请中外专家、学者在北京隆重举行“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念和祝贺他从事教学、科研70周年。在大会上周谷城、费孝通、张岱年和民革中央贾亦斌副主席等讲话，都盛赞他为发展我国文化事业作出的贡献。在香山饭店，中外专家、学者就梁漱溟思想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样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收到中国文化书院的邀请信，特偕同我的二位研究生赴京出席会议，我带去《重新认识梁漱溟的教育思想》论文，并在会上作了发言。当时正值重阳节，我为梁先生祝寿，购得印有竹子作封皮的精美的祝寿卡，在扉页上我题了几句话：“阐明东西文化，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倡导乡村建设运动，在国内外有深远影响，强调人生行谊教育与人生艺术，以身作则，充分显示出崇高人格之美。恭祝漱溟吾师九五华诞。”我把这个祝寿卡奉赠给他，并在旅馆内写了七绝五首：“文化哲学早著名，深心大愿济苍生，乡村建设开风气，抗敌参政布赤忱。”“理性弘扬气雄浑，反躬修己最率真。社会人生艺术化，教育功夫力万钧。”“举国震惊杀李闻，调查血案赴昆明，伸张正义求民主，取消特务喊连声。”“‘文革’恶浪猛翻腾，傲然答辩语惊人，匹夫无权志不改，高风亮节实堪钦！”“重九登高聚群英，国际会议齐争鸣。学术长存人长寿，香山红叶倍精神。”我与参加讨论会诸同志曾在香山饭店池边和梁先生合

影留念。会议闭幕后数日，我又到木樨地22楼看望梁先生，我询问他关于杨效春之死等问题。恰好这时邹平县政协郭蒸晨、成学炎同志来，我和他、梁培宽、田慕周、郭蒸晨、成学炎合了影，没有想到，我们和他合影这竟是最后一次。

梁漱溟先生及其在山东从事 乡村建设的活动

万永光

梁漱溟先生是我国当代一位有影响的人物，30年代他在山东从事过“乡村建设运动”。近年国内外都有人对他的思想和活动进行研究，在国外已有专著出版。在这里笔者只根据个人所知（有些事是我当时所见所闻，有些事是访梁先生所得），对他的生平及其所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作一简单介绍。

一、家庭出身和少年时期

梁漱溟先生原籍广西桂林人，原名焕鼎，字寿铭，一字寿民或瘦民，1893年出生于北京。先世为蒙古贵族，元末未随元顺帝北归，因居汴梁，以梁为姓。经过明清两代与汉族通婚，早已汉化。他的曾祖、祖父和父亲三辈都是举人或进士，做过清朝的官吏。祖母贵州毕节刘氏，母亲云南大理张氏，也都系名门，知书识礼，能为诗文。他兄弟姐妹四人，大哥是日本留学生，两妹在清末毕业于京师女子师范学堂，

他就是生在这样一个“诗书门第”的仕宦之家。

他6岁开始读书，时值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停科举，废八股，因此，他7岁就入了北京第一所“洋学堂”——中西小学堂，嗣入顺天中学堂（后改名顺天高等学堂），因当时学制未定，肄业五年半，于1911年冬毕业，时年19岁。那时中学生程度不齐，年龄也相差悬殊，他年龄最小。同学中后来知名者有张申府、汤用彤等。

他的父亲梁巨川^①，是一个倾向变法维新的人，曾捐资帮助友人彭翼仲^②创办北京第一家中国报纸——《京话日报》。在1907年前后，梁巨川搜集了大量的新书报，如梁启超在日本出版的《新民丛报》等及各种介绍新思想的书籍，给梁漱溟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他自十三四岁就开始课外自学，逐渐接触到各学派的学说。他说受父亲的影响很深，有着“一片向上心”和“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且性喜用脑思考，认为“单是求知识还不足以尽自学之事，求知盖所以浚发吾智慧识见，有了智慧识见发出来，就是生命向上自强之效验。”他自己说，一生在两个问题上探求不已，一个人生的根本问题，一个是现实的社会问题。他带着这两个问题研读了他当时所能见到的西洋哲学、政治学、印度佛教以及中国周、秦、宋、明各学派的学说。十六七岁涉猎过佛学书

① 梁济，字巨川，清末仕至内阁侍读，任职民政部。民国元年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应赵秉钧之召，入内务部，因不满临时政府不恤民困，而以增加官吏薪俸为急务，辞职家居不出。1918年于自己生日之前夕投北京积水潭自尽。

② 彭翼仲（彭治孙）苏州人，1902年在北京创办《京话日报》，为北京第一家中国报纸。

籍，在人生问题上，倾向于佛教思想，曾有出家为僧之志愿；对于政治则以英国式的君主立宪、议会制度及政党内阁为理想。

二、从参加革命活动到就任北京大学讲席

他中学毕业那年正是辛亥革命的一年，他本是热心于君主立宪的，尤不同意排满，当时在革命高潮推动下，他参加了汪精卫、李石曾、魏宸组所领导的京津同盟会（中国同盟会的京津支部）。清帝退位后，他在同盟会的报纸《民国报》（先在天津，后迁北京）任编辑兼外勤记者，他现用的名字“漱溟”二字就是在《民国报》当编辑时的笔名。

1912年8月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他作为党员代表曾参加过在北京举行的成立大会。辛亥革命后建立了中华民国，许多同盟会人士以为革命已经成功，可以按照欧美议会政治的格局，实施宪政。所以要把作为革命暴力集团的同盟会改组为普通政党，以便通过议会来掌握政权。为了取得议会的多数席位，与几个小党合并，吸收了大批投机政客入党，并降低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将原同盟会的“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改为“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而将民生主义作为一项政策。同盟会原有女同志，新党章则规定不收女党员。据梁漱溟先生回忆，孙中山和黄兴都出席了那次大会，会上对删去的民生主义纲领和不收女党员问题发生了激烈地争议，有个女同志唐群英起而质问，甚至要上台殴打宋教仁。只是由于孙总理一再长时间讲话，说服解释，才勉强完成选举程序。由早8点开会直到天黑，整天未得休息，昼长天热，疲惫不堪。

国民党改组后，将《民国报》改为党总部的机关报，由汤漪主持，梁漱溟等人离开了报社。由于他当记者时经常出入民元（按：指民国初年）的临时参议会、民二（按：指民国2年）的国会两院、国务院和各政党总部采访，看到当时政治舞台上袁世凯和军阀政客们的政治阴谋诡计，卑鄙龌龊的行径，使他对心目中一向奉为政治理想的议会制度和政党政治发生了怀疑，1912末至1913年初，他曾一度热衷“社会主义”，认为财产私有是造成社会问题的根源。曾撰写《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自刻蜡版油印数十份，分赠友人。及至对现实政治感到失望，由功利主义转为消极出世，就更加倾向于佛教哲学。1913年，20岁，开始茹素（一直坚持至今，已70余年），搜求佛典，精心研读，费力甚苦，决心出家当和尚，并学习中西医，准备以行医为主，以代替佛家之“乞食”。他的父亲对他一向持放任态度，虽然反对他拒婚和出家当和尚的想法，却也不加强制。24岁时他完成《究元决疑论》的著作，在上海《东方杂志》上连续发表（后又印单行本，收入《东方文库》），内容主要评议诸家学派，而推崇佛教哲学。

袁世凯帝制失败后，1917年，西南各省讨袁势力唐继尧、陆荣廷、刘显世等与段祺瑞妥协，组成所谓“南北统一”政府，“政学会”首领张耀曾代表西南势力参加内阁，任司法总长。张耀曾系梁先生舅父，即以梁为机要秘书，专管与西南往来密电。这时教育总长范源濂邀请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在民元临时政府任教育总长时，范任次长，临时政府北迁，蔡即辞职出国，此时应范邀回国）。蔡到北京，梁漱溟先生拿着他所著《究元决疑论》，诣蔡请教。蔡说他

在上海已从《东方杂志》上见到此文，认为很有学术水平。并说他在北京大学的办学方针是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拟开设“印度哲学”一门课程，正找不到合适的人讲授，就约请梁先生任该课讲席。当时梁正任司法部机要秘书，又送妹丈灵柩回湘安葬，未能脱身，乃托一许先生临时代课。不久，张耀曾被北洋“督军团”赶下台，梁先生就到北大当讲席了。当时他颇受学术界注视，已名满天下的梁启超曾专程到他家访问，请教佛学问题。他对蔡元培、梁启超等前辈奖掖后进、虚怀若谷的精神非常钦敬。

当时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在学术自由的气氛中，各种新思潮、新学说蓬勃兴起；各种社团、刊物纷纷出现，百家争鸣，异常活跃，《新青年》杂志批评旧文化异常锋利。他讲的印度哲学属于保守一派，受到新思潮的压力很大。他曾对校长蔡元培和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陈独秀说：“我要为孔子、释迦说个明白，出一口气。”为了争得学术阵地，他对中外各学派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写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主旨是将中国、印度、西洋三大不同文化体系，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给以适当的位置。而在人生问题上则归结为中国儒家的思想，指出世界最近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从此以后，儒家思想就成为他的基本思想，只是日益深化，而没有改变。经过这一番研究，他的生活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从消极出世又“回到世间来”，放弃了出家当和尚的想法，30岁结了婚。他说：30岁以前过的是佛家生活，30岁以后转到儒家生活。

他在北大时，虽然学术思想上与新思潮处于对立地位，但在争取学术自由方面，立场还是一致的。1919年1月，北

京大学成立哲学研究会，他是发起人之一，其他发起人为杨昌济、马叙伦、陶履恭、胡适、陈公博等。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滹启新知”，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同志亦曾参加该会。梁与先进人物李大钊私人关系不错，时相过从，李大钊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北京后，曾向梁谈国民党改组情况。最近首都博物馆举办的“李大钊同志纪念展览”上展出的李大钊同志牺牲后，为李大钊同志家属募捐的收据存根，其中梁漱溟捐款50元（银元），数目还是较多的（捐款最多的是汪精卫1000元，其次陈公博300元，鲁迅100元，一般多为10元、5元）。

三、梁漱溟的“中国文化”思想及乡村建设理论

梁漱溟先生创立“乡村建设运动”是根源于他对中国社会的特殊认识。他常说，他研究学问是为了解决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不是为学问而学问”，他“感受中国问题的刺激，切志中国问题的解决，从而根追其历史、其文化，不能不用番心，寻个明白。”他得到的认识“不是书本上的知识，不是学究式的研究，而是从活的问题和活材料寤寐以求之一点心得。其中有整个生命在，并非偏于头脑一面之活动；其中有整整40年生活体验在，并不是一些空名词，假概念。”他的研究成果，就是他的四本主要著作：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作于1920——1921年；《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作于1929——1931年；《乡村建设理论》，作于1932——1936年；《中国文化要义》，作于1946——1949年。

这四本书思想内容基本一致，且多重见或复述之处。他

说：“此盖其间问题本相关联，或且直是一个问题，而在我思想历程上又是一脉衍来，尽前后、深浅、精粗有殊，根本见地大致未变。”

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有其独特见解，不失为一家之言。他认为中国人受周公、孔子的教化，“理性早发”，构成“伦理本位社会”，于是，由此而产生了中国社会的一系列特点，中国社会的发展就走着与西洋完全不同的道路。伦理关系就是情谊关系，推家人父子之情的广之，亲亲而仁民。人们相互之间因情而有义，是一种义务关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朋友乃至一切相与之人，莫不互有应尽之义务。而人人反省自求，“向里用力”（反省、自责、克己、让人、知足、安分等），信赖自己的理性，所以这种义务不假强迫，完全出于自觉。

伦理精神贯穿于政治、经济，社会礼俗等各方面，政治上以教化为治，“以孝治天下”，经济上家人共财，亲朋邻里有通财之义，富人之以亲疏为厚薄，施财亦为义务；即东伙（劳资）之间亦为伦理之相依，而乏对抗等等。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不存在阶级分野。但伦理本位社会只重视人事关系，不重视向自然斗争，科学不发达，经济停滞。且由于中西社会结构不同，中国人缺乏团体生活、公共观念、纪律习惯、法制精神等等，这些也不适合现代世界生存之需要。这是由于“理性早发”，造成“文化早熟”的缺欠，不是落后，而是因其超过而后不及的。“中国的伟大非他，原只是人类理性的伟大，中国的欠缺却非理性本身的欠缺；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所以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以中医为譬，中国的病是虚

症，不是实症（有余之症），要补，不需要泻。

由于中国社会具有特殊性，社会的改革就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他认为自清末以来的宪政运动到民国以来的现实已证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中国是“第一个行不通之路”。中国社会改造的方法，只有根据“伦理本位”的特点，用教育的方法改革政治，培养新的政治习惯，结成团体，加强社会的组织性，普及教育文化，引进科学技术，经济上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从乡村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农业工业迭相推引，逐渐以合作的道路达于为消费而生产，于生产社会化的进程中，同时完成分配的社会化。”这一切须从小范围（基层）着手。这便是“乡村建设运动”，或称“社会本位的教育运动”。

梁漱溟先生说：“我所主张之乡村建设，乃是想解决中国之整个问题，决非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建设什么？乃是中国社会之新的组织构造（政治、经济与其他一切均包括在内）。因为中国社会的组织构造已完全崩溃解体，舍从新建外，实无其他办法。”他认为建立中国社会新的组织构造也就是“完成了中国的革命”。

四、受聘村治学院，讲授“村治”理论

梁漱溟先生自称他“一向喜欢行动而不甘于坐谈”，他要把自己的学说付诸实行。1924年他离开北大到山东去筹办“曲阜大学”未能成功。便与山东的政治活动家王鸿一合作，在曹州（菏泽）办高级中学，他办的高中与普通学校不同，首先着重“人生道理，即儒家哲学和伦理思想的教育，教以谦抑宽和处己待入之道，以求人生向上”，其次要“合

中国古人之讲学与近代社会运动而一之”。“广求师友”，聚合了一批同道，培养了一批门徒，他们都有志于社会改革，形成了一个派别，这就是后来“乡村建设派”的雏型。这个派别有个特点，就是特别注重师统观念，不但接受过教育训练，或听过讲学的人以师生相称，即后来乡建派的各种组织中，上下级之间亦皆以师生相称，纳隶属关系于师生关系之中，这可能是源于儒家“作之君，作之师”的传统思想。

曹州高中的重要人物有陈亚三、郭俊卿、葛象一、熊十力、黄良庸、王平叔、王子愚等。陈亚三（山东郓城人）后成为乡建派的领导人之一，直到晚年还追随梁先生，后在北京去世。郭俊卿是菏泽回民知名人士，交游甚广，任六中校长多年，远近人称“郭老师”。熊十力以研究佛学《唯识论》闻名。王子愚即王近信，美国留学生，曾任山东省教育厅秘书主任，后来曾任邹平研究院副院长。黄良庸（广东人）、王平叔等均为梁的得力门生。

1925年曹州高中因受军阀战争影响停办。梁先生回北京，聚集了一些信仰他的学生，约请熊十力和他一起讲学。1927年春，以《人心与人生》为题，假北京大学开设讲座，讲了三个月。《人心与人生》是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修正和补充，是他的重要著作，过去未出版，1975年重新写定，最近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

1924——1927年，从国民党改组到北伐战争，是中国局势发生激烈动荡和变化的时期，在这三年中，梁漱溟先生在北京静观时变，没有做什么事（也未教书），只是派王平叔、黄良庸、徐名鸿三人去广州考察。这三个人到广东后参

加了北伐军，随陈铭枢打到武汉。“宁汉分裂”后，王、黄回北京，徐名鸿则参加了共产党（后在“闽变”中牺牲）。接着国民党“清党”反共，大革命结束。到这时，梁先生确信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苏联式的政治制度在中国都是走不通之路。“亟当回头认取吾民族固有精神，来作民族之自救运动”。1927年5月，他偕王平叔、黄艮庸到广东李济深处，李时为国民党西南政治分会领导人、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代总司令留守后方。李要推荐他任广东省政府委员，他辞不就。在广州新造细墟乡间住了一段时间（这期间发生了广州起义），研究了农村经济问题，他的乡村改革思想乃完全成熟（他自称乡村建设思想萌芽于1922年，大体决定于1926年冬，到1928年完全成熟），就向李济深建议在广东试办“乡治”。李请他担任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代主席，在广州举办“乡治讲习所”，并接办广州第一中学，以黄艮庸为校长，准备在广东省推行“乡村自治”实验。

为了了解其他各地乡村改革工作状况，以资借鉴，他于1928年2月离粤北上，先后考察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江苏昆山徐公桥“乡村事业改进会”，河北定县翟城村的“乡村自治”，定县平民教育会的“华北试验区”和山西太原、汾阳、介休等县的“乡政”。写了《北游所见纪略》一文，对各该地工作有所批评，后在《村治月刊》上发表。当他从山西回到北平时，李济深已在南京被蒋介石扣留，广东政局发生变化，已不能再回广东了。这时王鸿一正在北平参与汪、阎、冯“扩大会议”的反蒋活动。因王鸿一之介绍，他认识了河南“村治”派的梁仲华和彭禹廷。梁、彭邀请他帮助筹办“村治学院”，并主编《村治月刊》。他为该学院起草《河

南村治学院旨趣》、《组织大纲》和《学则课程》。他主编《村治月刊》后，连续在该刊上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等著作，宣传他关于乡村改革的主张。

1929年韩复榘任河南省主席时，彭禹廷在河南辉县百泉创办了一所“村治学院”。彭原为西北军军官，解甲归田后，在家乡办民团，剿土匪。因与韩复榘有西北军的旧关系，得到韩的支持，办了这所学院，于1930年1月开学，专门培训“村治”干部。邀请梁先生担任教务主任，讲授“村治”理论，是该校的理论指导者。

这个学院的主要人物有：院长彭禹廷（彭锡田，河南镇平人）；副院长梁仲华^①；教育长王炳程（王怡柯，河南汲县人）；班主任孙则让^②、高赞非^③、张倬知等。

不久，蒋、阎、冯中原大战开始，河南成为战场，该学院乃暂迁北平，借农学院上课，并请燕大、师大几个教授讲课，梁先生继续讲授“村治”理论。中原大战结束，该学院又迁回百泉。但韩复榘已调往山东，新任河南省主席刘峙对村治学院不予支持，经费发生困难，只好停办。彭禹廷回到他的家乡镇平办“乡村自治”去了。

五、赴山东兴办“乡建运动”

在河南办“村治学院”时期，梁漱溟先生就与韩复榘建

-
- ① 梁仲华（梁耀祖），河南孟县人，为孟县有名的大地主，后为乡建派领导人之一。
- ② 孙则让（孙廉泉），山东鄄城人，日本留学生，为山东乡建派领导人之一。
- ③ 高赞非，山东鄄城人，为山东乡建派骨干分子，抗战期间在山东与中共合作，参加革命。

立了联系。早在冯玉祥任北洋政府陆军检阅使时，曾请梁到驻地南苑为所部军官讲学，当时韩为团长，就听过梁的理论，对梁的“乡村建设”主张极为赞赏。当然，韩复榘有他自己的打算，他看到乡村基层组织的改革，将有利于巩固和加强他的军阀统治，梁先生的乡村建设则依靠实力派来实现。他说：“我们与政府是彼此相需的。而非不相容的。至于落到依附政权，则亦有不得不然者。”并说“你不能排除它，就要利用它，不反对它，要拉住它。否则你就不算会办事，就要自己吃亏而于事无益。”而梁先生对当时中国政局的一种看法——认为由于中国没有西洋那样强大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形成一个现代统一国家。自民国以来，袁世凯、吴佩孚直到蒋介石都要用武力统一中国，都是痴心妄想。中国的统一，只有在乡村建设式的地方自治的基础上实行联合才能实现。这种看法无异为地方军阀割据提供了理论根据，当然也适合韩复榘的需要。

1930年，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不久，就电邀梁漱溟先生来济南商谈在山东开展乡村改革问题，决定设立一所象河南“村治学院”那样的学校，并决定划给一定地区，供作改革实验，于是山东乡村建设运动的各项工作就逐步开展起来。自1931年到1937年，时达七年之久，乡村建设的改革办法已在全省许多地区推广实行。

韩复榘对梁漱溟先生非常尊敬，称之为“梁先生”而不名，在有关乡建工作方面可谓言听计从，任凭他放手去做。有一次，韩复榘在省政府纪念周上讲话说：“我就是迷信梁先生啦。”梁在山东办乡建，不但与国民党势力有矛盾，而且与韩复榘的省政府各部门也发生了矛盾，因为“乡建派”的骨干

分子不少人身居专员、县长要职，他们的实验区、实验县用人行政自作主张；还在全省许多地区分配干部，掌握基层政权，夺取了省政府各部门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如用人权、财权、教育权等。只是由于韩复榘全力支持，谁也不敢说话。

“七七”事变后，日军打到山东，韩复榘在撤退前夕的1937年11月下旬，曾在千佛山与梁漱溟先生作过一次长谈。梁漱溟先生对韩复榘放弃山东深感失望，他曾到武昌向蒋介石报告韩复榘的撤退意图，并到徐州要求李宗仁下令阻止韩的撤退。但没有阻止住韩的撤退行动，“乡建派”的大部分人也都跟着韩复榘撤退了。

六、山东的“乡村建设运动”

山东的“乡村建设运动”，概括地说，就是以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为指导，以乡村建设研究院为中心，训练了大批干部，先后设计了两套改革乡村基层组织 的办法，即“乡学、村学”制度和“乡农学校”制度，分别在邹平和菏泽两个“实验县”进行实验，然后划定更大范围的“实验区”，将乡农学校制度在全省许多地区逐步推广，以实现县政改革。

1932年12月，国民党内政部召开全国第二次内政会议，梁漱溟先生和定县平教会的晏阳初、无锡教育学院的高阳（高践四），均应邀参加（他们都是简派的省地方自治筹备员）。会议通过县政改革案，决定各省设县政建设研究院及县政改革实验区，可截留地方收入50%作实验经费。适用此规定，自1933年起乡建研究院实际上成为山东省的县政建设研

究院（名称不变），以教育机关兼为行政机关，对各县有指导监督之权。邹平、菏泽两实验县成为县政建设实验县，经费由统收统支改为截留田赋等收入30%包干（此款在邹平为每年5.8万余元，在菏泽为6.2万余元）。所有通行各县之法令，凡与县政改革计划有碍者得不受其约束。这样，山东的乡村建设就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具有“合法性”。

（一）乡村建设研究院。乡建研究院设在邹平，1931年初开始筹备，6月正式成立，它是全省乡建工作的指导中心，又是训练干部的场所。内分三部分：一为乡村建设研究部。招收大专学校毕业生或同等学力人员，由梁漱溟先生亲自指导进行理论研究，以培养高级人才。先后办了三期，共毕业五六十人。二为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招收中学、师范毕业生或同等学力人员，着重业务训练，作为基层干部。三为实验区，即邹平实验县，后又增划菏泽为实验县。实验县由研究院直接领导，县长由研究院提请省府任命，用人行政悉由研究院自行决定。研究院因工作需要，设有一些业务部门，有农场一处，从事农业技术的改良示范和推广工作；有社会调查部、乡村服务指导处、合作指导处、美棉运销合作社等。并有医院、图书馆，还设有一所乡村书店，出版乡建书籍，发行《乡村建设旬刊》，在济南、济宁等地设有门市部，抗战期间迁武汉。

梁漱溟先生是乡建派的领袖，主要从事理论指导。在他周围有一批骨干分子做具体工作，研究院主要人员有：院长梁仲华（1933年10月起，梁漱溟任院长）；副院长孙则让（1933年孙出任菏泽实验县县长，副院长先后由王冠军、王子愚担任）；研究部主任梁漱溟，助教王平叔、侯子温；训

练部主任陈亚三（1935年陈出任菏泽实验县县长，兼研究院分院院长，由黄良庸继任）；军事主任王冠军（王绍常，山东菏泽人，曾任西北军的军长，与韩复榘关系较深）；总务主任张倬知（四川石碛人）。班主任及导师：裴占荣、张国维（四川剑阁人）、周葆儒（浙江海盐人）、汤茂如（四川大竹人，后任乡村建设专科学校校长）、张筱珊（山东菏泽人）、赖执中（江西宁都人）、方铭竹（江西上饶人）、云颂天（广东文昌人）、高赞非（山东郯城人，后任菏泽分院教育长及第二乡建师范教育长）等。乡村服务指导处主任时济云（山东齐东人）。编辑部主任茹春浦（山东蓬莱人）。农场主任于鲁溪（山东临淄人，曾任定县平教会及河南村治学院的农场主任，在研究院兼办美棉运销合作社）。合作指导处主任秦亦文（山东新泰人）。

此外还约请清华、燕京、农学院等大学教授许仕廉、杨开道等临时讲课和指导作社会调查，有的参加了乡建工作，如燕大教授张鸿钧任汶上县长，杨开道任济宁训练处教育长。

1936年将研究院的训练部纳入师范教育体系，改称“山东省第一乡村建设师范学校”，菏泽分院与原有的省立第五师范合并，改称“山东省第二乡村建设师范学校”，内部均设特别师范部招收高中生，一年毕业；普通师范部招初中生，3年毕业；简易师范部招小学毕业生，4年毕业；同时，为从长远着眼，使培养乡建干部向正规教育体系发展，在济南筹建“山东省乡村建设专科学校”，以定县平教会的汤茂如（美国留学生）为校长。专科学校系就原济南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及济南乡村师范合并组成，内设乡建专科（招高

中毕业生，培养“乡农学校”校长，4年毕业）、高级农职（招初中毕业生，培养技术员，3年毕业）、特别师范部（招高中生，培养乡农学校的佐治人员，1年毕业）、普通师范部（招初中生，培养高小教师，3年毕业）、简易师范部（招高小毕业生，培养村学教职员，4年毕业）。另设实验部，有配套的实验农场、乡农学校、完全小学、短期小学、村学、合作社、农业推广部、卫生组织，以达乡村建设之整个教学做合一之目的，校内除讲授实验外，皆有实习场所。学生第一、二学年，在校修业，第三学年分往各专员区实习，第四学年回校研究实习中之问题。但此项计划未能完全实现。

为解决当时需要，还举办了一些短期训练班。1934年曾将在各县候差的山东警官学校毕业实习生100余人，集中菏泽分院，成立了乡村自卫干部训练班，训毕分配到各县任乡农学校自卫干部。1936年又将山东八个师范学校应届毕业生500余人分别集中在济宁（男生）、邹平（女生）加以训练，分配任乡农学校干部。1937年又在济宁设立“山东省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分班训练从乡农学校校长到事务员的乡农学校的各级干部（见后）。

研究院训练部及分院共办了三期，训练学生约1000人，两个乡建师范毕业的学生有五六百人；警校及八校师范生共600余人。合计先后训毕、分配工作的基层干部约2000余人。梁先生说：“吾侪前后同仁同学总计不下4000余人。”

（二）邹平县的“乡学”、“村学”制度。邹平是研究院的第一个实验县。自1931年冬开始，研究院师生在梁漱溟先生亲自指导下，到该县各区乡调查研究，试办乡村教育，总

总结经验，制定出一套改革办法，就是“乡学”、“村学”制度。1932年在全县实行。取消原有的区，将全县划分为10个乡，乡设“乡学”，乡以下分为若干村，村设“村学”。就区划面积看，乡与原来的区相当（略小），村则相当于原来的乡，村学是乡学的基础，乡学是村学的上层。“乡学”、“村学”既是行政机关，又是教育机关，又是乡民的自治团体，“行政机关教育化，社会学校化”。以一村或一乡的一切人（男女老幼）为教育对象，称为“学众”，全村人非学生即师长，无一非村学的构成分子。乡学、村学皆遴选当地有资望的领袖人物三五人为学董，组织学董会，为议事和执行机关，从中推举齿德并茂者一人，由县府礼聘为学长，为一村或一乡之师长，主持教化，调和众人，但不负事务责任。再由县府与学董中择一有办事能力者委为理事（常务学董），负“办公事”之责，其他学董共同协助，任期皆为一年。县府又派辅导员一人，教员一二人（皆为受过训练的学生）以辅助之，而为实际上的行政和教育的负责者。

乡学和村学的工作是：（1）办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村学设成人部、儿童部、妇女部，对失学儿童设共学处，因陋就简，随处施教。乡学设高级小学部、职业训练部（合作社职员、社员冬春训练蚕业、机织传习等）。（2）推行各项改良措施，如禁缠足、戒早婚及买卖婚姻，禁烟、禁赌、戒游惰、戒斗殴，农业改良，造林、修路、讲卫生等。（3）经济方面。扶助农民组织生产、消费、运销、信用各种合作社，以办生产、运销社为主。各乡经常办合作训练班，训练合作人员，凡村学教员均须经合作函授班毕业，会指导办合作；高小及成人部教育加入合作内容，把合作社作

为从经济上组织农民的主要手段。每乡有美棉运销合作社联合组织，县有总会。邹平设金融流通处，作为县金库，并经营农业信贷业务，贷款以合作社为对象，不贷个人。辅以技术指导，良种推广，推动合作组织普遍发展。（4）办理乡村自卫。自卫组织名为“联庄会”，先由各乡选送优秀青年施以严格军训，委充各乡的多队长、副乡队长。办理联庄会训练班，每年办一次，训期两个月，轮训18—30岁之壮丁，先训富农，依次征调，不许雇替。截至1935年共训三届，2281人（以后数字不详），并购买一部分枪支（归村有，丁银40两购快枪一支，已有的免购，全县丁银3.7万两，有枪约近千支）。受训后按地段编组，每村编为一村组，设村组长、副组长。全乡编为一乡队，受乡学节制及乡队长指挥，维持治安，防护青苗。在不妨碍农事原则下，每月至乡学集合一次，举行“乡会乡射”操演练习。并由乡干部传达政令时事，这叫作“纳军事于礼乐之中，明政教于长老之前”。该县在建立自卫组织的同时，将原有民团及公安派出所裁撤，选留部分精壮兵警，经过严格训练作为过渡性维持治安之力量，及至联庄会组织扩大，即遣散兵警，成立警卫队，一面为联庄会员复习训练机关，一面作为常备部队，担当地方警卫任务。每期抽调会员40人，训期4个月，期满轮换，成绩特优者留队任班长，遇缺提升干部。联庄会员除维护治安外，且为各项工作骨干，如兼办户籍登记，办合作社等。

乡学、村学的目标是师法于宋儒吕大钧《吕氏乡约》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总的口号是：“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要求学众遵规约，守秩序，敬长睦邻，“尊敬学长，接受学长训饬”，“信任理事，

爱护理事”，学众可监督理事，“勿使陷于不义”，但应避免正面冲突，可向学长反映，由学长转告。由此“培养新的政治习惯”，即团体生活习惯，进而建设“新的社会结构”。梁漱溟先生把这一套办法称之为“社会本位的教育体制”。

先后担任邹平实验县县长的有梁秉锷^①、朱桂山^②、王怡柯、徐树人等，梁先生自己也曾一度兼县长。

（三）“乡农学校”制度及其推广。“乡学”、“村学”制度是根据梁漱溟先生的“伦理本位社会”思想而来，着重教化，要“养成新礼俗”，“形著其组织关系于柔性的习惯之上”。梁先生说：“邹平工作侧重乡村组织，求有以启发培养乡村自治力量，不能有速效，始终未向邹平以外推广。”孙则让等一部分领导人就研究设计了另一套办法，这种新办法就是“乡农学校”制度，即将邹平的乡学、村学两级组织简化为“乡农学校”一级组织。经研究院领导集团商定，邹平仍按原实验办法不变。1933年3月，另划菏泽为第二个实验县，对新办法进行实验，同时在鲁北滨县、沾化、利津试行。按新办法把菏泽县原有七区改划为20个乡，每乡设一“乡农学校”。乡农学校有校长、教育主任、指导员、事务员、军事教练各一人。校长领导“乡农学校”工作。教育主任主管学校及社教，指导员主管农业、合作、建设等事项，军事教练主管组织自卫队，训练壮丁。号称为“政、

① 梁秉锷（梁勤诚），河北大城人，曾任山东莱阳、邹平县长，北平市社会局秘书长。

② 朱桂山，山东省单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为王鸿一的好友，曾任邹平实验县县长。

教、养、卫合一”的组织。另有乡长一人，由当地士绅担任，类似邹平的“学长”，不做实际工作，作用不大。乡农学校的中心工作是按土地多少为序，抽调壮丁，自带枪支（鲁西民间枪支较多，无枪者购枪亦不难，无地者不抽调，故有雇穷人冒名顶替受训的），办理自卫训练班，分批训练，训毕编为自卫队，维护地方治安，并定期召集检阅演习，号称“寓兵于农，守望相助”。梁漱溟先生说：“菏泽工作，一面革新行政，以行政力量推动一切；一面从民众自卫训练进而为各种训练，树立各项建设基础，其收效较快，且适合国防需要。”

由于有地方自卫武装，菏泽治安情况确有改善。1934年刘黑七（刘桂棠）股匪流窜数省，到菏泽未能入境。是年第一期自卫训练班结业，请韩复榘亲临检阅，韩见把老百姓变成号令严整的队伍，有这么多人枪，大加赞赏，因而“乡农学校”制度很快就在全省大部分地区推广开来。

根据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关于县政改革的决定，1935年以菏泽为中心，增划济宁等13县（共14县）为“县政建设实验区”，设“实验区长官公署”于济宁，以王绍常为实验区长官，负责改组区内各县县政府，在新划入的济宁等13县推行菏泽的“乡农学校”制度。1936年又改划了三个行政督察专员区。第一区以济宁为中心，辖10县，以梁仲华为专员；第二区以菏泽为中心，辖9县，以孙则让为专员；第三区以临沂为中心，辖8县，以张里元为专员。在各县区内，各县普遍实行“乡农学校”制度。此外还在寿光、莱阳推行，后又增划了其他专区。截止“七七”事变，共在七个专区内，各县都实行了乡农学校制度。即在全省107个县中推行70余县。

原计划三年内全省普遍实行乡农学校制度，因日军侵略未能实现。

乡建派在山东所作的“实验”，对于乡村基层组织形式及作用确实起了很大变化。旧日的区公所只有一名区长和一名助理员，乡公所只有一名乡长和一二名乡丁。组织很不健全，除摊派捐税外，几乎办不了别的事，老百姓除完粮纳税外，与政府也无关系。新的办法使基层组织大为充实，具有多种职能，什么事都管，干部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学生，具有一定工作能力。特别是基层组织掌握着武装，具有权威性，这样就加强了基层政权的效能，便于对农民的组织管理，有利于各项政令的贯彻执行。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做法便利了韩复榘的军阀统治，所以得到韩复榘的支持。抗战期间孙则让在湖南、四川任行政督察专员，为国民党政府办“乡政实验”，对于帮助国民党加强反动统治也起了一定作用。1940年国民党政府推行“新县制”就是采用了“乡农学校”的一些办法，可见其影响是不小的。

邹平实验县比较重视经济工作，做了一些改良农业技术，推广美棉良种、组织合作社等工作，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活跃农村经济有一定效果。特别是改良棉种，推广长绒棉，经济效益显著。邹平所产棉花经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评定，质量超过灵宝棉，为全国最优者。根据“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的主张，还计划在邹平孙家镇筹建纺纱厂和织布厂，因“七七”事变发生，未能实现。

对于组织教育农民的工作，梁漱溟先生认为效果也不够理想。他说：“乡村建设工作，必须以知识分子引导而以乡村人为主体。”又说，“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

们帮他们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惟不动，甚至因为我们动，反而和我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做不下去。此足见我们未能代表乡村要求！我们自以为我们的工作对乡村有好处，然而乡村并不欢迎。”还说，“我们是走上了一条站在政府一边来改造农民，而不是站在农民一边来改造政府的道路。……我们与农民处于对立的地位。”

（四）乡建研究院与全国的乡村改良运动。中国的乡村改良运动早在1904年就有米迪刚在定县翟城村办“村治”。这是“村治”一词的由来。入民国后有山西“模范省”的“村政”，“五四”以后有“新村运动”和定县平民教育运动、南京的晓庄师范等，但活动范围和影响都不大。30年代初，我国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和国内战争的破坏，出现了民族工业凋敝，农村破产的局面，社会矛盾激化，农民暴动时有发生。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全国各地兴起了一阵乡村改良运动的浪潮。各种各样的乡村工作单位纷纷出现。有官方机构，如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农业处、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江苏和浙江的县政改革实验县、山西和广西的“村政”实验等。就连已失去地盘的张学良也派人到邹平考察，在西安成立了“乡村建设研究会”。有学术机关：山东乡建研究院、河北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无锡江苏教育学院、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该社在昆山、镇江、泰县、苏州、宁波等地有乡村改进实验点）。学校有：中央大学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燕京大学农村建设科、燕大社会学系清河实验区、南开大学与平教会合办的华北农

业研究改进社、齐鲁大学龙山农村服务站等。乡村自治团体有：河南宛西各县的自治委员会、村治学院同学会。救济机关有：华洋义赈会。宗教团体有：江西黎州基督教农村服务社。还有经济界，如华北工业改进社，上海的金城、交通银行等。据说最多时全国不下200余单位。这些单位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各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如梁漱溟就不同意晏阳初的中国社会问题是“愚、贫、弱、私”之说。但他们有共同的目标——改良农村。这样，就从四面八方联合到一起来了，他们互通声气，互相观摩，自1933年至1936年先后举行过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一次在邹平，第二次在河北定县，第三次在江苏无锡，互相通报情况交流经验。邹平研究院、定县的平教会和无锡教育学院号称乡村工作的“三大中心”。尤以邹平乡建研究院规模最大，影响最广，为乡村改良运动之巨擘。

七、抗战初期的“乡建派”

（一）从宣称“守土抗战”到撤出山东。

“七七”事变开始后，山东的“乡建派”宣称要组织民众，守土抗战，加紧了各县的壮丁训练。在他们所举办的训练中，也加强了有关军事的教育，并分派学生到各地进行战时动员、组织群众工作的实习。但是他们依附并听命于韩复榘。韩复榘先是态度暧昧，后来急于撤退（怕日军在平汉线截断其退路），一心想从山东多带走壮丁、民枪和钱款，乡农学校变成了韩复榘害民的工具，最后乡建派自己也跟着韩复榘撤退了。

梁漱溟先生于1937年秋冬之间，风尘仆仆地奔走于邹

平、济南、济宁、徐州、南京、武汉等地，除为济宁的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讲课外，还会晤了韩复榘、蒋介石、胡宗南、李宗仁等人，商谈山东局势问题，并出席国防参议会，相当忙碌，但他未能阻止韩复榘撤退。他于10月中旬离开邹平，11月底离开济南，1938年2月离开曹州，从此离开了他经营七年的山东。

乡建派的两个重要人物梁仲华和孙则让撤退时都带走了大批壮丁和民枪。孙则让带走1000人（编为一个旅，补充了军队）。梁仲华带走了1000人（后来改编为“政治大队”）。与乡建派关系密切的人物，留在山东抗战的只有高赞非、张里元、周同等少数人。高赞非与中共合作，后来参加了革命。张里元是三区专员，在鲁南山区打游击，因与沈鸿烈不和被撤职，又任国民党苏鲁战区游击第一纵队司令。周同是滕县县长，1938年日军进攻津浦路，因他配合军队死守滕县而闻名（当时讹传他已牺牲），国民党政府曾予明令褒扬，旋升任第一区专员。但他们都已不再打“乡村建设”的旗号了。盛极一时的“乡村建设运动”，随着韩复榘的撤退而销声匿迹。

梁仲华是山东乡建派的第二号人物，他的撤退，颇具典型性。这里略述其经过：梁仲华是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山东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副处长（名义上韩复榘任处长，实际由梁负责），该处是为适应“乡农学校”制度逐步在全省推广需要，在八校师范生训练处的基础上扩大组织成立的。1937年春招生，内分乡农学校校长班、教育主任班、指导员班和事务员班。训练时间半年，准备训毕后分派任各该职务。教育长是扬开道，教师除梁漱溟先生讲授“乡村建设理论”外，

有于永滋（合作社专家）、赵冕（原东吴大学教授，定县平教会人员）、张金鉴（后任国民党内政部次长）、雷震（教育学家）、杨太空等。该处开学时，“七七”事变已发生，“八·一三”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山东形势日趋紧张。梁仲华声称要领导所属地区群众守土抗战，在各县进行了宣传动员工作，加紧训练壮丁。在训练处内由各班挑选一部分学员成立军事班，施以严格军训，备作军事干部，其余也加强有关游击战争等教育，以便能在基层领导群众进行游击战争。为表示决心，他在是年冬一天的凌晨1时，集合训练处全体师生和专署、济宁县有关干部千余人，在训练处大礼堂举行宣誓大会。设香案、香烛、三牲，供“轩辕皇帝”和“先师孔子”神位，梁仲华等领导人均着“常礼服”，连那位洋博士杨开道也换上长袍马褂，梁仲华拈香致奠后就带领大家宣誓：“余等誓以至诚，领导民众守土抗敌……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每人还须在誓词上签名盖章，以昭信守，气氛异常严肃隆重。但过了几天，他就带着训练处师生和调集的各县壮丁民枪逃奔河南去了。

他带着这批人枪撤至鱼台，由鱼台开往河南。出发时，他对全体人员讲话说：第三路军溃退，山东局势混乱，济宁已情况不明。我们在鱼台受到刘耀庭（韩复榘的特务队）的威胁，想守土抗战也站不住脚，情况紧急，只好暂到河南休整一下，再回来抗战。因壮丁们纷纷开小差，他就下令当场枪毙了一名逃兵，以杀一儆百，然后立即带队出发。行至商丘，传来韩复榘被扣的消息。他作为守土有责的地方官，处境非常被动。他急忙跑到武汉去找门路（队伍暂住淮阴），结果国民党给以“军委会战时干部训练团第一团直属第一大

队”的名义，由赵冕任上校大队长，学生到武汉受训（豫鲁干部班），壮丁暂住豫西镇平训练。

乡建派随韩复榘撤退，带走壮丁民枪，引起山东人民强烈不满，因而乡建派声名狼藉，为人所诟病。继任山东省主席的沈鸿烈说乡村建设“不合法令”，下令把全省乡农学校一律撤销，恢复了区、乡、闾、邻（或保甲）制度。

梁漱溟先生对山东乡建运动的结局十分痛心。他说：“吾侪工作主要在乡农学校，乡农学校一面为社会教育，民众训练机关，一面又为下级行政机关，以其为下级行政机关，一切政令均借此而执行。当初借以推动各项建设者，今则以当局要壮丁、要枪支、派差派款，执行其一切苛虐命令。凡当局一切所为之结怨于民者，乡农学校首为怨府。更以其为民众训练机关，平素之集合训练在此，召集调遣在此，壮丁枪支皆甚现成，于是每每整批带走。假使无此民众训练，或不兼为训练机关，则当局虽要壮丁、要枪支不能如此方便，乡间亦自有许多通融挪移回避之余地。然今皆以乡农学校而不能，更有怨毒最深者，则以欺骗手段收取枪支，带走壮丁之事屡屡发生。例如：始而只说集中训练，多日以后，一道命令忽然几十人整批带走。事前乡农学校固未料到，而曾向乡民以绝不带走为担保式之声明者，至此毫无办法。自己落于欺骗民众地位。甚至有时乡农学校亦在被骗之列，而乡民仍认为乡农学校行骗，怨毒之极致有砸毁乡校、打死校长之事。我同学之死于此者竟有数人之多，曷胜痛吊！其实不顾信用，为此巧取豪夺者，除省当局外，或系专员，或属县长，或为军队，与乡农学校校长何预？以建设乡村之机构，转而为破坏乡村之工具，吾侪工作至此，真乃毁灭无余矣！

吾同人同学几乎不能在社会上立足，几乎无颜见人矣！言念及此，真堪痛哭！”

（二）梁漱溟先生在抗战初期的一些活动。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为装点“全民抗战”的门面，延揽各党派和社会知名人士为国防参议员，在南京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参议会。参议员有共产党的毛泽东、周恩来（毛主席未参加开会），救国会的“七君子”等。梁漱溟也是参议员之一，他就是在国防参议会上认识周恩来的。国防参议会由蒋介石任主席，汪精卫任副主席。参议员经常听取关于军事外交情况的报告，讨论重大问题，提出建议。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就是国防参议会商定的。1938年在武汉时期，国民党特别代表大会后，把国防参议会扩大改组为国民参政会，梁漱溟先生是驻会参政员。在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期间，蒋介石时常召见几位参议员就某一问题举行谈话，梁漱溟先生也被召见几次，蒋介石对在野名流是注意拉拢的。

梁先生退出山东后，1938年3月，在徐州发表了《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其中总结山东乡建工作失败的原因：“第一，抗战起后（韩复榘）未容吾人尽力于抗战的民众工作；第二，当局急切退离山东，遂以毁灭吾侪工作。”

关于组织乡建派团体，后来拟定了《中国乡村建设学社成立缘起及信约》、《乡村建设纲领》和《中国乡村建设学社社章》。《纲领》共25条，分为“对于中国问题之基本认识”，“确定建国之理想目标”，“进行之方针路线与步骤”，“负担工作之系统力量”和“可能成功之新社会”五部分，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种设想的总纲领。后在四川成立了一个“乡村建设学会”，主席为梁漱溟，副主席

为黄炎培和晏阳初。但这个学会并没有什么严密的组织，后来随着时局的变化，逐渐无形解体。黄炎培组织了中国民主建国会，晏阳初后到台湾任农村复兴委员会主任，不久即去美国，并在菲律宾办“乡村建设”。

梁漱溟先生欢迎国共合作，赞成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他于1938年1月，第一次赴延安访问。那时由西安到延安还没有公路，交通不便，他是由武汉乘飞机到西安，然后搭乘八路军办事处的运货汽车，走了两天，于1月7日到达延安的，他受到中共中央的热情接待，并和毛主席作了深夜长谈。

（三）“政治大队”组成和梁漱溟先生赴敌后视察。

1938年夏，在战干团“豫鲁干部班”受训的学生结业，连同梁仲华带往河南的学生和壮丁，合编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战地服务团第四团”，接着又改称“军委会政治部直属第三政治大队”（当时政治部部长是陈诚，副部长是周恩来），除原有学生、壮丁外，有少数参加人员，共千余人，由秦亦文^①任政治大队少将大队长，下分五个支队，其中壮丁队500人编为警卫支队。1938年秋开回敌后，一个支队留河南，一个支队赴鲁北，其余在鲁西活动，不久又赴鲁南山区。学生队员皆为尉级军官待遇，分配到省属部队或地方作政治宣传工作，警卫支队配合当地政府打游击。警卫支队长陈登五是陈亚三之弟，曾在西北军当营长，在庐山军官团受过训，原为济宁训练处的军事教官。梁仲华由山东撤退时，将壮丁队交给他带，即以训练处军事班学生为连、排干部。

^① 秦亦文，山东新泰人，是乡建派中的国民党分子，号称“合作专家”。

陈有带兵及作战经验。1938年冬，在鲁西活动时，在郛城一带与敌作战，夺得敌人部分马匹枪支，得到士兵爱戴和群众好评。第二区专员卢翼之（沈鸿烈的人）极力拉拢他，许以郛城县长职位，秦亦文却令警卫支队随大队赴鲁南。到鲁南后又受其他一些人的拉拢，他滋长了个人野心，不甘于在政治大队中作一个警卫支队长，乃于1939年初率领全支队官兵声明脱离政治大队，要求归属沈鸿烈，沈也有意拆“乡建派”的台，就给他发粮、发饷，指定防地（博山芦芽店一带），暂归省府教导团团长沙尹（沈鸿烈之侄）指挥。

1939年春，梁漱溟先生商得蒋介石的同意，以军委会特派员名义赴华北敌后观察，蒋送给经费10000元。他是抱着希望而来，想看一看乡建派这一支仅存的有组织力量的政治大队回山东后的情况，希望能把散处各县的乡建派同人、同学发动起来，重整旗鼓，成为一支在敌后的抗战力量，为乡建派在山东恢复声誉。不料政治大队内部发生分裂，使他非常扫兴。过去他在韩复榘支持下，培植乡建派势力，抓地方政权，与山东的国民党势力有深刻矛盾，因此，他这次来山东活动，就遭到国民党省党部的反对。他一到当时的省府所在地沂水东里店，街头就出现了攻击他的传单，他来山东也使沈鸿烈处于尴尬地位，只好以陈登五为牺牲品，送给一笔路费，勒令陈登五离队回家。陈登五走后，秦亦文拉拢警卫支队干部，又把队伍拉了回来，其中一个中队因单独驻防，通知不及，仍留在教导团，被改编为教导团的一个连。

不久，日军飞机轰炸东里店，大举扫荡沂蒙山区，政治大队的武装力量缺乏有效的指挥，加以几经变化，人心涣散，很快被敌打垮，大队部被敌包围，秘书主任韩晓塘等数十人

被俘，遭敌就地惨杀，只有两人被带到济南（其中一人为秘书王伯平，到济南后经朱经古保释，后来当了伪济南市社会局局长）。这时警卫支队收集残余，还有200余人，因士兵都是鲁西人（原为第一专区各县乡农学校壮丁），他们就公推一位中队长刘涌深，率领他们回鲁西去找陈登五。其时陈登五在鄆城住闲，忽然有旧部来投，他就同乡建派人士裴占荣^①、宋乐颜与当地国民党县政府协商，由县政府给以“濮县教导队”名义（当时鄆城属濮县），由县供给，听县指挥，但保持客军性质。由裴占荣任队长，陈登五任队副，宋乐颜任政治主任，还请一位在延安抗大毕业的陈某任政治指导员，此人后来被陈登五排斥走了。

梁漱溟先生在鲁南赶上日军“大扫荡”，政治大队垮台，他无人保护，只好同他的秘书、参谋两三人窜山沟、钻山洞，备尝艰险，好容易躲过敌兵搜山，跑到八路军防地，才脱离险境。八路军派人辗转护送到鲁西鄆城，他在鄆城对裴占荣说：“这次来山东，不如不来！”他说经过八路军防区，见到那里生气勃勃，工作、生产井井有条，没有混乱现象，甚为称赞。谈到国共磨擦问题，他说自己今后的任务就是努力协调国共关系，促进团结抗战。总的说来，他这次来山东，是乘兴而来，败兴而返。他以后又到晋南太行山一带视察，10月回四川。

“濮县教导队”通过当地乡建派的社会关系，在兵员、武器上稍作补充，保持在300人左右，他们还敢与日伪军作战，打死过日本兵，夺得过武器，纪律较好。1939年下半年

^① 裴占荣，字雪峰，河北滦县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毕业，是个道家，以研究《易经》闻名，喜算卜，批八字，人称裴老师。

年，鲁西国共磨擦加剧，该队就投奔了国民党的第二区专员孙秉贤，仍属客军性质，不接受二区的番号，自称“政治大队”。此时裴占荣、宋乐颜离开队伍，裴任定陶中学校长，宋到四川在梁漱溟办的勉仁中学教书去了。1941年秋，国民党的冀察战区游击总指挥兼山东省政府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以该队不服从指挥为名，将该队缴械解散，陈登五被枪毙。至此，乡建派在山东的最后一点残余武装力量就被彻底消灭了。

1986年

（原载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1991年7月版）

梁漱溟先生和桂林

朱 袭 文

一代宗师、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已于今年6月23日与世长辞。漱溟先生一生磊落，耿介不阿，数十年来，在新思潮一浪接一浪的冲击下，他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保持独特的风格，为民族独立，为国家富强而上下求索。

漱溟先生原籍桂林，但自他的曾祖父进京参加会试之后，全家都迁居北京。他1893年重阳节生于北京，并长期生活于北京，是一位听得懂桂林话而不会讲桂林话的桂林人。

漱溟先生的祖父和父亲都一直隶属于广西留京同乡会而一直未回过桂林，漱溟先生的一生中却先后四次回到老家。

第一次是1935年年初，当时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有励精图治，和蒋介石分庭抗礼之意，邀请漱溟先生回广西参观并提供意见。他就带着私人秘书李渊庭应邀而回，先到桂林，看望了亲友，游览了名胜古迹，愉快地第一次在老家度过了春节，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事隔50年之后，漱溟先生和笔者谈话中，尚能忆及当年在故乡度春节时看抬阁、顶马游街的热闹情景。随后才转往当时的省会南宁。

第二次是1941年4月。这年元月发生了“皖南事变”，当时重庆的政治气氛很恶劣，作为“乡建派”的漱溟先生和“职教派”的黄炎培、“民社党”的张君勱、“青年党”的左舜生，一道在重庆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鉴于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府钳制压迫很严，重庆没有发表言论的适当论坛，民主政团同盟决定在香港建立自己的言论机构，并派漱溟先生去主持。由于在重庆无法购到去香港的飞机票，他只得由重庆经贵阳到桂林再设法出云。4月初到达桂林，即为老朋友、广西大学校长雷沛鸿挽留，在雁山的广西大学讲学一个多月，所讲的内容就是后来整理成书的《中国文化要义》。并应邀到两江的桂林师范和迁到桂市的江苏教育学院演讲。这期间，漱溟先生常从所住的雁山进城，李任仁、陈劭先、朱荫龙、梁焕誉等都曾往雁山看望他。一直到5月20日才飞往香港筹办《光明报》。

1941年秋，《光明报》在港问世，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日军随即入侵香港，漱溟先生和陈此生等，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协助下逃离虎口，各历艰辛，于1942年2月5日辗转到达桂林，第三次回到故乡。由唐现之等安排，下榻于普陀山下的广西教育研究所，并一度应邀到西华门科第塘朱荫龙家小住，在那里，每天都有一些新知旧好去看望，有时畅叙到深夜。1944年8月，日军进逼广西，桂林疏散人口，漱溟先生就偕在桂续弦不久的夫人避往贺县的八步镇。这段在故乡的时间首尾三年，漱溟先生曾应邀参加广西建设研究会的活动，和老朋友李济深、唐现之等以及文化界人士柳亚子等都保持接触，先后应邀到无锡国专、桂林中学、汉民中学、中山中学等学校演讲，写下了《香港脱险致宽恕二

儿》、《我的自学小史》、《纪念蔡元培先生》、《纪念梁启超先生》、《论广西国民中学制度》、《中国以什么贡献给世界》等，并着手撰写《中国文化要义》。

第四次回故乡是1957年4月20日至5月2日，这次是衔周恩来总理之命，与卢汉、裁涛、陈此生、钟夫翔、谢鹤筹等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组成小组来广西，主要任务是了解并参议关于酝酿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问题，以及视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地方的贯彻情况等。在桂林市人代会上，漱溟先生以小组长身份就协商成立壮族自治区的问题作了讲话，并听取了有关方面的汇报，还会见了远房亲属和地方知名人士魏继昌等。

4月30日，笔者陪同漱溟先生由榕湖饭店至伏波山脚下一间极简陋的小房，看望他的一位患精神病已久而卧床不起的年轻堂侄，漱溟先生到床前即问：“还认识我没有？”那瘦骨嶙峋的年轻人瞪目相视，随即将手伸向漱溟先生，微弱地叫了一声“伯伯”后即闭目倒头而逝。归途中，漱溟先生对我说：“早不咽气，迟不咽气，正好在我来看望他，叫我一声之后就咽气了。”有深觉不解之意。

漱溟先生四次回到故乡，居住虽未及四年，但对故乡一直怀有感情。早在1923年就在桂林旅京学会作过演讲，次年又在《广西学生留京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晚年对故乡感情弥笃，过去题字，从未用过“桂林梁氏”的印章，近数年的题字落款处，每出现“桂林梁氏”这么一方印章。桂林的同志当面或去信请他题字，尽管他认为给别人题字是件苦事，但都从不谢却，并且每以“乡兄”相称。桂林的同志去看望他或请他提供有关资料，都一一会见并尽可能地详细提供。

1985年，笔者伴同市志办张汉宁和他多次长谈，有时竟谈而忘倦，经保姆催促休息时才不得不结束。他当时虽已92岁，曾应邀为故乡书写“锲而不舍，精义入神”八个大字，作摩崖石刻之用（早已刻于穿山大洞洞口）。漱溟先生的著作，近年先后出版或重版，他从来都没忘记送给故乡的桂林图书馆等单位。今春，笔者受桂林市文化、园林部门之托，请漱溟先生题写《桂林文化纪年》和“湖心亭”，九五高龄的漱溟先生，正患腰疾卧床，由于是故乡单位的请求，还是扶疾命笔，即速寄下，现在看来，已成为此老生前最后留给故乡的一点纪念。6月初，漱溟先生病势已沉，笔者曾往协和医院探望，获知老人有骨灰归葬桂林之愿，这就更不难看出此老对故乡的一往情深。

1988年10月11日

漱溟先师在无锡国专讲学的情况

萧德浩

先师漱溟先生逝世已有二年多了。而先师的音容神貌，时时萦于脑际，终岂能忘。

我是40年代初考入桂林无锡国学专修科学校。梁老师在香港沦陷前夕，得到我地下工作者的帮助，化妆逃离香港，经过几番周折，才来到桂林，1943年至1944年上半年，梁老师应冯振代校长的邀请，住进无锡国专校园内（地址在桂林市东郊穿山村，与汉民中学隔壁），并开设《中国文化要义》，每周讲一次（每星期天，上午讲课三个小时），全校学生不分年级，都来听课。冯振代校长和桂林市一些社会人士也来听课，二三百人将一个木板结构的礼堂（也是饭厅），挤得满满的。梁老师讲课时，礼堂里鸦雀无声，大家为丰富的内容，精湛的哲理，精辟的语言，生动的事例所吸引，它似一块具有强大的磁力场，吸引着数百颗年青的求知若渴的心，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此事距今已有46年之久，可是，当时梁老师讲课的音容神貌，历历在目，永不消逝。

我还清楚地记得，梁老师第一次讲课时，是讲述他的自学小史。他首先说：有人说梁漱溟是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都不是。若有人问你们，梁漱溟是什么人？你们应该这样回答：“他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接着，他说：十六七岁时，中学毕业去考北京大学，未获录取。自此后，他天天蹲在北京图书馆里，以白开水送馒头或烧饼过日子，勤奋苦读，潜心研究中国哲学、佛学、先秦哲学思想。后来，写了一篇有创见的学术论文《究元决疑论》，发表在上海出版的《东方杂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看了之后，立即聘请他到北京大学去讲授印度哲学。当时，梁老师仅24岁。梁老师在无锡国专第一次讲课时，就在同学的心田中投下了一剂振奋剂。

梁老师用一年多的讲课时间，讲述《中国文化要义》，阐明儒家的伦理学说。他认为：伦理是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儒家文化）的精髓，也是华夏民族的精神支柱，西方许多古老的封建国家早已解体了，中国自夏商至清代，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封建主义时期最长，就是外族之侵之后，他们也会被华夏文化所同化，融合成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伦理就是融合过程的催化剂。伦理，这是梁老师讲《中国文化要义》的一个中心主题，他在讲这个中心主题时，除了从理论上阐述外，还举了很多生动的事例，引古喻今，深入浅出。他的结论是：中国是一个具有深厚的以伦理为社会基础的国家，日本侵入中国，中国是不会被灭亡的。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进入第四个年头了，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他这番话，给学生甚大的鼓舞。

当时，出现一支插曲。在梁老师讲述这些内容之后，不

到一个月的时间，桂林《大公报》就发表一篇文章辩驳梁老师的中国有了伦理，就不会亡的观点，作者是梁老师的无锡国专的学生。这位同学认为伦理不能当作武器，抵抗不了日军，日军的飞机大炮也不认伦理。（因时间过久，文章原意记不清楚，现凭记忆所及写来，恐不符原意）可是，梁老师看到报纸上辩驳他的文章，特别是他的学生写的文章，他表现很安祥，也不生气，讲课时，仍如往常一样，淋漓尽致地畅谈他的《中国文化要义》。梁老师这种宽容宏量的仁者风度，为我们莘莘学子树立了楷模。

梁老师当时开设这个课程，并不是搞纯学术的学究式那套。他在讲课中结合当时的实际，对抗战中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和看法，对那种投降卖国，消极抗日，积极反人民的主张和行为，进行揭发和驳斥，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那种爱国忧民的思想，梁老师这种结合实际，不尚空谈的学风给无锡国专中一些死读书读死书的同学很好的启迪，激发了许多同学的爱国热情，培养同学们高尚的民族情操。

梁老师讲课时，用许多具体的生动的事例，深入浅出地去阐明一些哲理，启发我们去思考，使我们获得了一些哲学思想的知识，引起我对哲学、中国思想史的学习兴趣。此事距今虽有40多年之久，我还记忆犹新。

动和静是哲学思想中两个不同的命题。主动主静之争，由来已久，众说纷纭。梁老师在讲述这问题时，结合实际情况，由浅入深，从形象到思维，从事实到理论。讲课时，他先说一个故事：有一个当家的和尚要外出云游，交待两个小和尚看守庙门，庙门前竖有一支旌幡。有一天，小和尚看见旌幡飘动，小和尚甲就说是旌幡自身飘动，小和尚乙说旌幡

没有飘动，是风吹动。就这样两个小和尚争论起来，大家找证据来说明各自的论点，互不信服。争论了几天，还未解决，就去请求一位师傅解答。这位师傅听了双方的申述后，不直接解答飘动的问题，而说了四句揭语：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常拂扫，勿使惹尘埃。小和尚听了后，仍是争论。他们又去问另一位师傅，那位师傅也说了四句揭语：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何须常拂扫，勿使惹尘埃。是风动呢？抑是幡动？两位老和尚都没有直接解答，梁老师在讲这故事时，也未点明，而是让同学去思考去判断。梁老师在讲课时，却提出他一个颇有影响的论断：“动是静的连续。”当时，他举了许多事例来说明这个论断。其中有一事例是：电影中人物的动作，是通过许多静止的画面，用分镜头连续放映，才构成一个动作。还说：鸟飞行时，它的翅膀展开扇动，这是翅膀在静止中的连续下进行，人们眼看见的是静的连续，因而感到它在扇动了。我们听了感到稀奇。他的话，所说的事例，也打开了我们思考问题的门户，引起了我们对学习哲学，学习思想史的兴趣。动与静的问题，在同学中展开热烈地讨论。

动、静之说，是哲学认识论中一个重要的命题。主静与主动，即认识世界是静止的或是发展（动）的，这是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心主义认识论根本的区别。梁老师虽然在讲课中没有直接说明主静或主动，但就讲课时所举事例其观点都是主静的，他是用静止的观点来考察中国社会的。他不主张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解放初期，他受到公开批判。

梁老师是一位国内外著名的学者，著名的民主人士。他平易近人，和我们谈话时和蔼可亲。讲课时循循善诱，摆事

实，讲道理，从不以权威架势训斥学生。有一次晚饭后，我和两位同学在穿山村三拱桥畔的松林里散步，适遇梁老师在我们前面散步，他边走边哼京剧。当时，我是一个从穷乡僻壤来到桂林读书的乡巴佬，没听过京剧，他又是低声的哼，我以为梁老师在唱歌，就和那两位同学议论。有一位同学懂得京戏，他就纠正我的说法，我们在争论中，发出嬉笑的声音。梁老师回头看望我们，我们即趋前鞠躬致意，可是，我的心怦怦跳动，担心受到一番训斥，因为在老师、长辈的背后大声嬉笑，这是对老师、长辈极不尊重极不礼貌的行为。梁老师却慈和地向我们点头。

1943年秋，我买了一张宣纸拿到他的房间，敬求老师的墨宝，他欣然接纳我的请求，为我书写一副对联：“大地皆春龙天欢悦；六时恒吉日月光辉。”字迹透逸苍劲。我如获至宝，它成为我最心爱的一件东西，世事沧桑，几经风雨，至今我还完好地保藏下来。我对这副对联具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因为梁老师是我一生中最敬爱的一位老师。

梁老师之所以受我之敬爱，第一，学识渊博，诲人不倦。在讲学中真正起到“传业解惑”的作用。虽然有些观点，我们不敢苟同，但老师也不以盛名之威，强迫学生接受，在一年多的讲课过程中，始终是启发、诱导学生去思考问题、辨明道理。他是启开知识和哲理的大门，让学生自由自在地往前走。第二，梁老师一生耿直不阿，一身正气。是一位表里一致，品德厚道的学者，为中国的富强，民族的兴旺，人民民主事业，他不怕牺牲奋斗几十年。他曾经告诉过我们一件事：日军侵占香港时，他在中共地下党的同志帮助下，化装逃离香港，衣物书籍全部损失，到桂林时，已是一无所有。

当此困苦时刻，蒋介石就伸手出来拉拢他，从重庆汇来一笔丰厚的治装费和旅费送给梁老师，并多次电催“来渝共商国事”。梁老师分文不取，坚决不去重庆，拒绝蒋介石的邀请和利诱。过去在重庆时，梁老师为抗日救国，为实现民主政治，和平统一而奋斗。蒋介石当时曾欲收买他，遭到拒绝，蒋介石又以逮捕、杀头等来威胁，他亦不屈服。这次当他困苦的时候，蒋介石又以金钱官位来拉拢，他拒之于千里之外。在梁老师的身上闪烁着民族的正气，表现了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高尚气节，这种正气、情操，当时深深地熏染和激励着年青的同学们。

在那个“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大批判”的日子里，我却不敢在任何人的面前说我是梁漱溟的学生，更不敢将那副历经沧桑保存下来，梁老师亲笔书写的对联挂出来，更使终生悔恨不已的是将梁老师讲课本焚去，只将尊敬、爱慕和思念的感情，深埋于心的底层，丝毫不敢流露。这是我有愧于先师的啊！

1984年阳春三月，我因公上北京，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去北京大学蔚秀园拜望我的师母梁佩云（她是山西师范学院院长阎宗临教授的夫人，抗战时阎宗临老师亦是桂林无錫园专教授）。梁师母告诉我，梁漱溟老师的住址，在木樨地公寓大楼。恰好我当时住在木樨地中联部的招待所，离公寓大楼不远。中午，我辞别梁佩云师母后，赶到木樨地公寓大楼，当我按址叩门时，一位中年男人开门，问明来意，禀告梁老师后，才请我进入厅室。梁老师站起来表示欢迎。当时，梁老师已是91岁高龄的老人。有关部门为保证梁老师的健康，规定平时会客的时间，不许超过20分钟。梁老师看

我是来自广西的学生，前来拜望，特别高兴，很慈和地询问我的工作、生活情况，还询及广西、桂林、南宁的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不知不觉谈话已有30多分钟了，我要起身告辞，梁老师挽留地说：你好不容易来一次北京，多谈些不妨碍呀！我目睹梁老师面色红润，头脑清醒，举动灵活，谈话这么久，没有一点倦容。他讲话时的声音和40多年前在桂林无锡国专讲课时没有多大的变异。我向他告别时，他站起来要送我，我请求他不要客气，他握着我的手，激情地嘱咐我在科研上多出成果。我向他鞠躬，祝福梁老师健康长寿。此情此景，久久地在我脑海中回荡。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梁老师了，这次握别，竟成永诀。今写此文，以寄托我哀念之情。

1990年9月写于广西社会科学院

梁漱溟与中国民主同盟

植恒钦

梁漱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学者，也是中国民主同盟创建人之一。抗日战争中期，他曾回桂林从事同盟地下活动，并应聘为各高等院校的学术讲座教授，传播他的学术思想和民盟的政治主张。在梁先生诞辰百周年到来之际，写下此文，以表晚辈对梁先生的缅怀和崇敬。

一、参加创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赴港创办《光明报》

梁先生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央常务执委，抗战时期，他是桂林民盟领导人。我为了写抗战时期桂林民盟的历史，1986年3月，和吴天佑前往北京拜访了梁先生。

梁先生住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2楼5门17号。我们按照民盟中央办公厅与梁先生约好的时间，前往梁先生的寓所与梁先生相会。

我们进屋时，梁先生知道我们是桂林来的，他兴致勃勃地健步向我们走来，我向他鞠躬后说：“梁老师您好！我是您的学生植恒钦，我在国立桂林师范学院读书时，您给我们

讲授《印度哲学（佛学）与中国文化》。”梁先生亲切地招呼我们坐下后，说：“是的，是的，40多年前的事，瞬即过去了，时间过得真快。”梁先生已是九三高龄的老翁了，可是他的精神充沛，思路敏捷，语言流畅，尽最大努力追忆过去的经历，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梁先生给我们讲了民盟的创建，民盟在桂林的活动。

梁先生说：民盟是1941年3月创建的。由3党3派6个单位联合组成，大家都主张实现民主、要求团结抗日，所以能联合起来，取名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张表方（张澜）是无党派的，他资历好，威望高，刚直不阿，我们也邀请他以个人名义加入。初时推选黄炎培当主席，黄推辞不干，改选张表方任主席。后来蒋介石搞伪国大时，国民党拉一些党派加入蒋介石政府，民盟始终拒绝不参加，青年党和民社党到国民党那边做官去了，国民党给青年党李璜当经济部长，他不干，还算是明白人，他不干是很高明的，他还健在，已90高龄了。

在蒋介石独裁专政统治下，民盟没有取得合法公开的地位，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言论主张。民盟中央决定到香港建立机关，创办报纸，向世界宣布民盟的成立和政治主张。民盟中央决定派梁先生去香港建立机关，创办《光明报》。

梁先生说，创办《光明报》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接受任务后，先到重庆中共办事处（曾家岩50号周公馆）拜访周恩来同志，谈了去香港办报的打算，请教他：“到香港同什么人接头好？”周恩来同志说：“到了香港可以去找廖承志、范长江等同志，有困难，他们会协助解决的。”

梁先生到达香港找到廖承志、范长江，才知道他们是中共驻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他们说：“周恩来同志来讯说民盟要来香港办个报纸，我们非常欢迎。”还说：“报纸的言论最好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讲话，象毛主席说的以中间偏左的立场出现最好了，站在右边不好，左边也不好，以中间偏左的姿态出现，接近共产党，对共产党有帮助，对全国大局有好处。”这番话对办好《光明报》很有启发和帮助。在中国共产党驻港办事处及中国救国会的海外组织的积极支持和具体帮助下，很快解决了经济、设备、人力等问题。柳亚子、何香凝、沈雁冰（茅盾）等也从旁帮助，很快建立了《光明报》的领导机关，梁先生任社长，萨空了任经理，俞颂华任总主笔，还有羊枣（杨潮）等人担任编辑。《光明报》于1941年9月18日正式发行。10月10日《光明报》发表启事，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已在重庆成立，公布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即“十大政治纲领”）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由金仲华同志翻译成英文向英、美发布，英、美等地的报纸相继刊登消息，在海内外影响很大。重庆国民党政府大为震惊、恐慌，蒋介石急忙下令在香港的孙科发表演说，说这是一些文人招摇撞骗之举，绝无其事，不要轻信等等，以此攻击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央针对国民党的攻击，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已成立多时了，由于政府不批准，未能与公众相见，现在向全国公布我盟的政治主张，本盟坚持抗战到底，恢复领土完整，实践民主政治，加强国内团结的方针，争取抗战彻底胜利，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诞生，为中国民主运动增添了一支

生力军。

二、回桂开展民盟地下活动

194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太平洋战争，12月香港沦陷。

梁先生在陈此生、范长江两同志的陪同下，得到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秘密离开香港，历尽辛苦，于1942年2月5日回到桂林。

在香港与梁先生共事的李伯球，离港后去重庆向盟中央汇报工作，并拜访了周恩来同志，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两广的情况，周恩来同志指示李伯球回两广建立民盟组织，开展活动。民盟中央也要求李伯球回两广发展民盟组织，开展活动。李伯球于1942年9月回到桂林与梁先生会晤，商讨民盟有关事宜。

梁先生说：他和李伯球见过面，是在漓江的船上，他们同乘一艘旧式木船，同睡在一个铺位上，商量在桂林开展民盟活动事宜。梁先生把他曾去找过国民党广西省政府，申报在桂林成立民盟组织，要求给予合法地位，准许公开活动，省主席黄旭初一口拒绝，说：“你（指梁）回广西工作表示欢迎，但要求成立党派，进行政治活动，是不允许的。”等等，告诉李伯球。李伯球向梁先生介绍了重庆情况，传达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和盟中央的意见，李说：盟中央负责组织工作的章伯钧要求李、梁迅速在两广打开工作局面，桂林由梁主持工作，韶关由李章达主持工作，在两地分别建立民盟的核心小组。李和梁商定：既然不能公开，就建立秘密组织，开展地下活动。过了几天，也是在漓江的船上，邀集罗子为、曾伟、张文、周鲸文等开会，成立了以梁先生为首的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桂林核心小组。

广西建设研究会驻会常委陈劭先先生是中国救国会的会员，梁先生从香港回到桂林，陈劭先先生就聘请梁先生为广西建设研究会的研究员。陈劭先、李任仁、梁漱溟成了莫逆之交。李济深（名誉会长）、李任仁、陈劭先、梁漱溟、李民欣、陈翰笙、陈此生等常常以聚餐为名，商谈工作，议论时政。（《广西文史资料》第18辑20页）梁先生也借各种集会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在广西建设研究会担任研究员的中国救国会会员金仲华、千家驹、陈此生、张锡昌、狄超白等也加入了民盟。梁先生在怀念陈劭先的文章中说他们“经常在八桂厅（广西建设研究会会址——现在的桂林市工人文化宫）聚晤，共商国事”，“团结各方以反对独裁之蒋”。（《广西文史资料》23辑28页）1943年，万仲文前往中山大学任教，启程前，梁先生委托万仲文到广东曲江（韶关）宣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方针，去联系一些中山大学教授共同要求实施宪政，开展民主活动。（《广西文史资料》18辑20页）当时，梁先生致力于民主宪政运动，游说各方，为人人所敬佩。

有一次，梁先生和李任仁、陈劭先等在广西建设研究会会议厅谈话，接着甘介侯（桂系、无耻政客）也来了。梁、李所谈是关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活动问题，以及人民对蒋介石不满的情况，不料甘介侯竟以此作为材料，写了一封信向行政院长孔祥熙告密，说广西建设研究会有图谋不轨的活动等等。（《广西文史资料》18辑10页）

重庆的蒋介石政府曾要求广西当局撤消广西建设研究会，广西则置之不理。因此蒋介石派了心腹人物陈立夫、朱

家骅、徐恩曾等先后来桂林视察。当时，广西建设研究会敢于召开座谈会，由名誉会长李济深主持，并请陈立夫、朱家骅前来参加，发言的人很多。陈立夫在座谈会发言说：重庆虽听到一些关于广西建设研究会的流言蜚语，但有任公（李济深，字任潮）主持，任公是我的老上司（北伐时李济深任总参谋长，陈立夫是机要科长），我是放心的。朱家骅则说广西建设研究会是书生论政，不会构成问题。徐恩曾则和陈劭先、李任仁进行了秘密谈话。蒋介石三个心腹人物来过之后，就没有听到要取消广西建设研究会的话了。（《广西文史资料》18辑44页）事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活动地点转移到阳桥附近的天然饭店，继续坚持地下斗争活动。由此可见，在争取民主，反对独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斗争中，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桂林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梁先生仍然团结全体盟员，坚贞不屈，把民主运动继续坚持下来，使之不断发展扩大。

三、疏散到桂东，筹建民盟东南总支，在敌后开展抗日民主运动

1944年，日本侵略者进犯广西，李济深召集一些进步人士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李济深不去重庆，而回他的家乡苍梧县，进步人士也到桂东南去，打算在日军入侵广西后，在桂东南组织武装自卫，进行反蒋、抗日，割据桂东南，使桂东南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主区域。（《广西文史资料》18辑21页）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桂林小组的同志表示赞成，并付诸行动。

桂林沦陷，桂林民盟成员大多数疏散到桂东。欧阳予

倩、张锡昌、千家驹、周匡仁、莫乃群、萨空了等去昭平，梁漱溟、陈此生、柳亚子、张铁生等到八步。革命老人何香凝同志也去八步。八步成了桂东抗日民主运动的中心。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中国民主同盟，取消同盟的团体会员制，以后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加入，民盟成为有党派与无党派的广大民主人士的联盟。1944年底，狄超白几经转折，从重庆回到桂东昭平，向张锡昌、欧阳予倩、千家驹、周匡仁、徐寅初、莫乃群等传达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桂东尽快建立民盟组织，在敌后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并传达了民盟代表会议有关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和以后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入盟等决定。梁先生特地从八步赶到昭平黄姚主持盟员入盟宣誓，和民盟广西支部成立会议（《桂林文化城纪事》56—57页）。事后，梁先生回到八步，和陈此生共同努力，发展临江中学校长李镇，教导主任刘彦忠，教师肖敏颂、张铁生等加入民盟，并于1945年春，根据民盟中央的指示在八步召开盟员会议，成立民盟东南总支筹备委员会，负责领导粤、桂、闽、浙、赣、湘等省盟务活动，推选梁先生负总责。在昭平的民盟同志创办《广西日报》（昭平版），在八步的同志创办《民主政宪》（广西版）杂志，互相配合，积极开展抗日民主宣传活动。梁先生和陈此生在八步举办学术讲座，由梁先生主讲《到民主宪政之路》，陈此生主讲《唯物辩证法》，肖敏颂主讲《抗日战争形势》，张铁生主讲《国际形势》，革命老人何香凝讲《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政》，柳亚子讲《抗战文艺》等。当时在政治上摆脱了国民党独裁专政的统治，言论自

由，人身安全，抗日民主运动空前发展，讲座越办越红火，听众越来越多，远在钟山、富川、贺县等地的青年不辞辛劳，跋涉百多里路到八步听课，据李镇回忆，听众多时达五六百，远道青年还在临江中学借宿，可见青年爱国热情的汹涌澎湃，爆发出抗日救国的巨大力量。

四、去重庆参加政治协商

1945年抗战胜利，梁先生奉民盟中央的指示，离开广西去重庆，担任民盟中央秘书长，肩负筹备政治协商会议的重任。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梁先生是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成员之一，他与中共代表团密切配合，致力于谋求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民主团结，建设繁荣富强的人民民主共和国。政治协商步履困难，会议刚闭幕，国民党反动派就制造了“二·一〇”重庆较场口血案，民盟中央执委李公朴被特务打伤。国民党公开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梁先生以民盟秘书长的身份代表民盟向国民党提出批评和抗议，要求国民党政府惩办凶手，取缔特务活动，撤消特务机关。7月，国民党反动派在昆明又制造了暗杀李公朴的流血事件。民盟在重庆举行悼念大会，梁先生非常愤慨地发表《向广大的社会申诉》为题的演说，他说：“我个人的意见，不向国民党当局作无效的抗议，只要向广大的社会申诉好了。只要社会人士明白，现在政治是这样黑暗，统治者已经超过法律，用恐怖手段行其统治，……试问所有‘民主’、‘宪政’等还有没有希望？”（《李公朴纪念文集》55页）几天之后，民盟中央执委闻一多在昆明又被特务暗杀，梁先生得知后立即

发表书面谈话说：“当李公朴先生被暗杀发生后，我个人说过，只向社会申诉，不向政府抗议的话，现在闻一多被暗杀继之再发生，我却认为非向政府抗议不可了。我们抗议：政府允许不允许人民在其政治轨道内有其政治活动之自由？李、闻两先生都是文人、学者，手无寸铁，除以言论号召外，无其他行动。假如这样的人都要斩尽、杀绝，请早收起宪政民主的话，不要再说，不要再以此欺骗国人。我们要从眼前的事情上考验政府的诚意，一面要看眼前事情上政府负责不负责，一面还要督促快取消这种特务机关。政府口口声声要各党派参加到政府里来，但同时却拿这种机关监视我们，威胁我们，试问我们怎么能参加呢？我们正告政府当局，这种机关不取消，民主同盟断不参加政府。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象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我在这里等待着他。”（《李公朴纪念文集》50—51页）梁先生不愧为坚强的民主战士，他临危不惧，亲赴昆明深入调查李、闻血案。9月30日发表了《李闻案调查报告书》，把真情公之于世，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正抗议，要求立即捉拿凶手（凶手真实姓名，因各种原故未敢公开），进行公判，并取消特务机关，禁止一切特务活动。

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民主运动进入高潮，国民党反动派动用军警在全国各地进行血腥镇压，斗争越来越激烈，内战越来越扩大，国民党政府在占领张家口后，竟然擅自宣布召开一党国民代表大会，国共谈判破裂，政治协商陷入绝境。中共代表团及其全部工作人员被

梁撤离国民党统治区，中国民主同盟被勒令解散。梁先生被迫退出政治，隐居重庆北碚，潜心著作，在文化领域为祖国效劳。

1993.1.10

梁漱溟先生与民主运动

万永光

一、民主活动

武汉失陷后，梁漱溟先生在四川办了一所勉仁中学（先在绵竹，后迁重庆北碚），又办了一所勉仁书院，后来又办了国学专科学校。这些院校的办学方针和办法，当然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些学校也就成为乡建派在大后方活动的据点。

自1939年起，国民党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与共产党、八路军发生“磨擦”。政策日趋反动，引起全国人民强烈不满，大后方民主运动随之蓬勃兴起。梁漱溟先生在华北游击区亲见国共磨擦，深惧演成分裂，妨碍抗战。回到大后方之后，他奔走各方，希望能解决党派关系问题。他的主张是“多党并存，而收一党之效”。即“各党彼此为有分际的合作，实行介于一党多党之间的制度，一面于理想有合，一面于现实无违。”他曾到重庆曾家岩50号中共办事处与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董必武、吴玉章诸人交换意见。国民党方面他与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谈得最多。

在中间力量方面，他与黄炎培、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等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要把国、共以外的各党派联合起来，争取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合法存在，对国事有发言权，以推动全国团结抗战。并由张群、王世杰陪同他去见了蒋介石，当面解释。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得到蒋的谅解。1940年国共关系更加紧张。12月底，梁漱溟与黄炎培、左舜生聚会于张君勱家（张未加入统一建国同志会）。四人会商，认为中间派任务重大，非加强组织不可，决定在统一建国同志会基础上扩大组织“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共极为愤慨，提出12条件，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梁漱溟等第三方面人士奔走调停。在这期间，“民主政团同盟”于3月间正式组成，由沈钧儒、左舜生、张君勱、黄炎培、章伯钧、梁漱溟分别代表救国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民社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及乡村建设学会六单位参加，梁漱溟被推为秘书长。为争取对国事的发言权，必须有自己的言论机关，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办一张自己的报纸是不可能的，他们就推派梁漱溟到香港去办报。

梁漱溟先生于1941年5月份抵香港筹备，9月间发刊《光明报》（即今《光明日报》前身），10月10日在《光明报》上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及《十大纲领》，宣言是梁漱溟先生起草的，提出了“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的口号。《十大纲领》是早经民主政团同盟议定又经梁加以润色的，其主要内容是：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实行民主，结束党治，在宪政实施以前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军队国家化；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实

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人身自由，反对非法之特殊处置等等。同时，内地的“民主政团同盟”组织也于10月10日公开了（前此是秘密的）。

梁在香港办报期间，蒋介石曾先后派李石曾、杜月笙劝他回重庆，说有意见可与蒋介石面谈。杜月笙自称“大义著于天下，言必信，行必果”，保证亲送梁到重庆见蒋，然后再亲自陪送梁回香港，决不食言。均被梁先生拒绝。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很快沦陷。梁漱溟身陷敌区，他不会说广东话，又无社会关系，处境十分困难。幸经友人范长江、陈此生设法雇得一条民船，帮助他们逃往澳门，又通过中共关系，从澳门经中山县转往桂林。他在桂林和广西贺县住了三年多（当时有不少民主人士住在贺县八步镇）。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毛主席到重庆谈判，他才应国民党政府之邀回重庆，准备参加旧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旧政协开幕，梁漱溟是代表之一，在会议中，他着重参加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商，他认为军队国家化是关键问题。

梁漱溟先生虽然与其他民主人士共同进行民主运动，但在政治问题上，他抱有不同见解。他一贯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文化失调问题，政治问题只是表层，中国的宪政要从中国固有文化引申发挥，生出一个自根自本的政治制度来（即从小范围乡村建设入手，培养新的政治习惯而形成新的政治制度），不能袭取外国模式。不论英、美式的议会政治或苏联式的政治制度，都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宪政不是救济药方，而是最后成果。早在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通过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案，并成立“宪政期成会”，他认为这

是“文不对题”，是国民党为应付各方意见玩弄的花招，沈钧儒、左舜生、张申府在重庆召集“宪政座谈会”，他谢不参加。1941年5月，周鲸文在香港主编的《时代评论》出版“人权专号”，民主人士纷纷写文章，唯他坚辞固拒。1943年10月，国民党于国防最高委员会内成立“宪政实施协进会”，蒋介石自任会长，而以各党派人士为会员，邀他参加，也被他拒绝，他在答复邵力子拒绝邀请的信中说：“五六年来，民有痛痒务掩之，士有气节必摧之，政之为政，党之为党，如此而已。……古人忠恕之道，今人民主之义，一分行之，一分实效，感应至神，不言可信，不必以宪政为号召也。……言宪政必备其条件，是以有筹备宪政之说；至于民主精神何所求备于外？古人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政府诚有取于民主精神，政府自实践之，何用许多人来筹备？不此之务，日日为言说，层迭开会议，腾之众口，涂饰耳目，诚恐益失国内外之望。”他为了顾全大局，与争民主的朋友们保持行动一致，这些不同的见解，当时并未公开发表，以免为国民党张目。

关于政治体制问题，1945年他在广西发表的《论当前宪政问题》一文中提出一个方案，原则是：（一）以尊重国民党的领导权，实行全国各党派合作，为今日从党权政治达到民权政治的过渡形式；（二）从战时之国民动员引致国民参与政治，因动员机构以建立民意机构，为民权政治之始基。内容是：

（一）结束国民党的党权政治，从统治地位改居领导地位，其一切独占性、排他性之特权应即废止。

（二）全国各党派在法律上之地位一律平等。均得合法

存在，公开活动。

（三）成立国事协议会，为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假定其议员100名，按4方分配之：

甲、国民党40名，由乙丙两方协议推出之；

乙、共产党20名，由甲丙两方协议推出之；

丙、民主同盟20名，由甲乙两方协议推出之；

丁、无党派人士20名，由甲乙丙3方协议推出之。

（四）由国事协议会产生国防政府，其组织及产生办法由国事协议会决定。

（五）国防政府为举国一致之政府，总揽全国治权。所有现在待决之陕北、晋冀等边区政府问题，应由国事协议会协议解决，实现全国统一。

（六）全国所有军队应脱离任何党派关系，统一于国家。其应有整编改编事宜，由国事协议会特设一委员会负责监督国防政府办理之。

（七）国防政府产生后，国事协议会即居于决定国家大计及监督政府之地位。

（八）党派问题由国事协议会特设委员会处理之。

梁先生说：“由各党派构成之协议机关自无须民选议员。各党名单由其他方面协议互推，其间实有一种用心；盖团结合作其事至难，苟非有互让精神，则随时可以僵持不下，惟有如此互推之法，乃使热心合作顾全大局之人，较之坚持党派立场缺乏互让精神者易于入选。但全由他方推选而不许其本党自为斟酌，或亦难行，可于他方推选之后，许其本党调换十分之一。”他的这一套政治蓝图，可谓“自出机杼”。

旧政协达成五项协议，政治格局基本上是仿效西方民主政治，梁漱溟先生认为这是早期学英美制度的回光返照，但他还是起立赞同了。因为眼前似乎需要它，但它只是过渡，中国终要有中国的政制出现。旧政协会议后，就当时情况看，好象政协任务已经完成，他决定“结束行动，致力言论”。他说：“今后我不在现实政治上努力，要站在远一步说话，我并不认为中国政治问题已解决，相反，认为现在拟议中之宪法不足解决中国政治问题，我的意见不同，有必要发抒意见，掉转工作方向。”于1月27日托周恩来带致延安毛主席一信，表示不参加拟议中之新政府，并在重庆《大公报》接连发表《八年努力宣告结束》及《今后我致力之所在》两篇文章，说明他要回到文化岗位上从事中国文化问题的研究，为准备一条建国大道作贡献。毛主席复信不赞成，说言论和行动可得而兼。他于是年3月再一次赴延安，向中共中央请教。这一次是搭乘美军飞机由重庆飞北平，再转飞延安。中共中央为他举行了欢迎会，毛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坐在一起，共同倾听他讲述自己的意见，他的看法得到中共方面的注意和理解。他自称与中共的关系是“和而不同”。他说：“我与共产党之间显然有很大距离……然而根本还是相通的。我对于民族前途，对于整个人类前途，有我的看法及远大理想；而他们恰是一个以远大理想为性命的集团。说到眼前一桩桩事，尤其说得通。这样，遇到该当合作的事就可以合作。……在人格上我不敢菲薄人家，至于见解主张之不同，不妨宽以居之。异中求同，依然有同可求。”

二、参与国共和谈

日本投降后，毛主席应邀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统一问题。达成“双十协定”。1946年1月，举行旧政治协商会议，商定五项协议。1月10日国共双方在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协助下，签订停战协定，并共同下达停战令，自1月13日起停战。又根据政协关于整军协议之原则，由马歇尔协助于2月25日签订整军协定。但是蒋介石并无真正履行这些协定的诚意，而是以此为掩护，准备内战。因而军事冲突不断发生，和平谈判也就在无休止的争执中进行下去。国共和谈原由马歇尔居间调停，第三方面并未参加，因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打内战，马歇尔失去中共信任，又因当时第三方面为国共双方所争取，举足轻重，故自1946年4月下旬起，应马歇尔邀请，第三方面（包括民盟、青年党以及社会贤达）参加协助调停。梁漱溟先生作为民盟的秘书长，就成为调处工作的重要角色，他奔走国共之间，煞费苦心地向双方劝说，冀能完成和平使命，但终归失败。

他谈起这一段调停过程时说：中共方面顾全大局，再三让步，有时作了很大的让步。如宪法草案的12要点是政协五大协议之一，经政协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但国民党中央全会通不过，内部聚讼纷纭，大闹特闹，出席政协的国方代表不堪党内诟责之苦，再三向中共、民盟恳商修改，周恩来迫不得已，商得起草人张君勱同意，对国方要求的三点予以让步。按理说，大会决议任何人无权变更，这就是中共代表为照顾全局而作的让步。在和谈中，中共代表可以说委屈求全，再三忍让。如1946年9月间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张家

口，周恩来提出紧急备忘录，警告蒋军须立即停止进攻，否则即是和谈破裂。蒋介石不予理睬，于10月11日攻下张家口，并在胜利之余，片面宣布召开国大，这使人很难容忍。但周恩来在第三方面人士劝说下，仍忍耐到南京继续和谈。而蒋介石却避往台湾，只打不谈。可见中共是真正相忍为国。1946年上半年谈妥了几项问题，马歇尔主张解决一个问题即签订一项协议，一步一步地建立互信，巩固和谈成果，以逐步达到全面解决，而蒋介石却不准签字。到6月底第二次休战期满前夕，大部问题已谈妥，第三方面和马歇尔都主张把未谈妥的四个问题暂行保留，将已谈妥问题签订协议，以便明日停战，连国民党方面的王世杰等也赞成这样办，但蒋介石坚持不许，必须全部谈妥始能签字。7月间，蒋介石拖延谈判，避上庐山，马歇尔九上庐山往返奔走，深为蒋所苦，马是费了心力的。马后期受了美国政府压力，有些偏袒，但究与蒋介石不同。

在和谈后期，梁漱溟为第三方面主要调解人。1946年10月末，国民党片面召开之国大会期近，第三方面希望能在会前完成和谈任务，使各方都参加国大，以免大局分裂，乃就整个和谈中的问题，拟提出三项折衷方案，国共两方反应都不满意，但也无更好办法，只好退出和谈。

梁漱溟先生退出和谈后，由南京回重庆专心办学。声明今后三年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在思想见解上不能苟同于国内任何党派。有时发表文章宣扬他的“中国政治的根本问题在文化”的见解，也对当前时事发表评论，对蒋介石破坏和谈有所揭露。他特别痛心于青年、民社两小党投靠国民党，说：“第三方面不能合作应受责备，陷

大局于不可收拾。”1947年国民党要召开二次国大“行宪”，选举“总统”。是年9月，他在《观察》杂志上发表《预告选灾，追论宪政》一篇长文，说：“民国25年，全国举办国大代表选举。闹得举国骚然，鸡犬不宁，公私耗财之巨，社会风纪秩序破坏之烈，乡里友好结怨成仇，伤亡而继之以词讼，精神物质一切损失之无法计算，于水、旱、风、虫……任何一种灾，亦没有这‘选灾’普遍而深入，这确是古所未有的比什么都大的灾祸。然而不幸得很，今年我们在许多水、旱、兵灾之外，又将有一次重大选灾到来。”他认为中国的民主与宪政必须从固有文化中引申发挥，结合当前实际，不能袭用外国制度，中国人理性开发最早，贵谦、贵让而耻于争。唯理性与谦让得和合，唯和合得统一。“学外国自己出头竞选，颯然不以为耻，实大悖于固有之谦德……逞欲而亡耻，则其无所不至，自在意中，此其所以可怕也。”

到1948年下半年，国内形势急转直下。1949年元旦，蒋介石被迫下台，梁漱溟先生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过去的内战责任在谁？》一文，历述和谈经过，指出内战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而在蒋介石。同时希望中共“本其过去不好战之心，本其过去委屈求全之精神，与各方共同完成和平统一”。“因为谁的力量大，谁对国家的责任也大，谁不善用他们的力量，谁就负罪于国家。好战者今天既不存在，内战不应该再有，任何问题用政治方式解决，不要用武。以武力求统一，只有再迟延中国的统一。”

他的上述言论受到一些人的批评，被认为是企图阻止“将革命进行到底”。他在《答香港骂我的朋友》一文中说：“在国内除顽恶的×××（指蒋介石。因当时重庆尚未

解放，报纸发表时用×××），真正没法和他共事外，各方都应合作，……你们尽管排斥我，而我心中却无所谓敌人，我与任何方面不取敌对态度。”

梁漱溟先生于1946年11月，辞去民盟秘书长职务，实际上已退出民盟，1947年9月，国民党政府强迫解散民盟时，他声明脱离民盟；后来民盟在香港恢复组织，他再次声明正式脱离民盟。但他与青年党、民社党那些急于做官、慌不择路的政客不同，他保持自己独立的见解，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绝不同流合污，没有参加国民党的“国大”，没有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任何职务，也没有离开四川，直到四川解放。

尽管梁漱溟先生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在政治生活中也出现过波折，但他还是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解放后一直团结在党的周围，成为统一战线的重要成员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爱国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他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和尊重，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他90寿辰时，全国政协为他举行了祝寿宴会，期望他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和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做出贡献。

写于1986年

（原为万永光：《梁漱溟先生及其在山东从事乡村建设的活动》第八、九两节，现抽出独立成篇，题目是编者加的）

怀念梁漱溟先生

何砺锋

今年6月23日，是梁漱溟先生逝世一周年。

我认识梁先生，是在1944年秋。当时，桂柳大疏散后梁先生和陈此生先生住到贺县私立临江中学。陈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又是学校的训导主任，自然是以尊长之礼接待他们，很快也就和梁先生较熟了。

不久，我和几位进步教师到他们房里谈形势，梁先生开门见山诚恳地说，蒋的消极抗日，不是他们不懂得这些道理，他们比大家懂得多。但是，他们立意要这样做了。陈先生从旁插道，广西当局现在也不是抗战的材料了，梁先生接着说，我们疏散到这里来是从事抗日的活动，拥戴李济深先生出来领导。以后，我看到梁先生总是频繁地找富川、贺县、钟山等地的士绅谈话，如高雁秋等。有时，还步行到八步做专员李新俊的工作。

1944年12月下旬，李嘉人同志从广东东江纵队来到临中，和我谈了此行任务，是要找李济深、梁漱溟、陈此生等谈联合抗日问题。还谈到蒋派人要暗杀李济深，要告诉他提

防。当晚我约了梁、陈两先生到我房间和李嘉人同志密谈。翌日他们又到附近丛林里商谈，决定由陈和李嘉人一道到广东去和上面商量。陈在临行前对我说，此行要经过许多道封锁线，保不定不出风险。他将一点应急需的金器和港币交给我保存，有意外就给她夫人盛此君。梁用小小的烟纸写了意见，交给李带回去（这片小纸由苏健同志密缝在李的鞋底）。他们到了黄姚，因情况变化折回。李安排我加入民盟，搞统战，支持他们工作，并安排我和李梓高老师搞抗日武装。

1945年春，在梁漱溟主持下，在张铁生房间开会，校长李镇、教务主任刘彦忠和我正式加入民盟。当时民盟工作是公开的，而组织却是秘密的。

梁先生对临中师生作了“动员与民主”专题讲话，由学校印成小册子在八步一带散发。

梁先生一次在向八步各界人士演讲中曾说到，中国不存在什么阶级，中国社会以家庭为中心，没有阶级剥削和对抗，也没有小富和大富，只有小贫和大贫。陈此生和张铁生知道了曾针对这个问题和梁谈论。在下一讲演时，梁先生则说，中国虽有阶级存在，却是变动不居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证明。后来民盟同志也不在这个问题上多所纠缠了。只是在陈此生、张铁生、肖敏颂主讲讲座时结合论述这个问题，澄清一些思想。

陈先生曾有一段时间住在临中图书馆楼上，梁先生有时在晚上来聊天。我住在图书馆楼下，有时也参与聊聊。梁先生很健谈，从抗战形势到他所接触的知名人物，无所不谈。谈和李大钊结交，谈他到延安和毛主席长谈几个晚上，谈毛主

席的才干，谈延安生活的艰苦，他吃上小白菜已经是很难得的了；谈到蒋介石接见他，没有装上一副假牙，嘴巴窝的很难看；还谈一些战场的情况，他向我提一个问题：将来谁出兵东北呢？我说从世界战局形势和东北的地理位置，自然是苏联出兵了。他和陈先生都哈哈大笑起来。窗外月光如水，临江河水声哗啦地响着，我突然想到郭沫若的一句诗：宣室丛谈不厌多。

梁先生为临中同学题词：相交期久敬，志道毋远求。

梁先生为教务主任刘彦忠写了一条幅：寄语天下人，尊事毋欲速，导师慎指南，一误悔难复。我知道，这是有所指的：一些老师讲阶级斗争。

梁先生又写一条幅给我：昨夜月如水，君能持酒来。破除愁闷去，洗荡肺肠开。露气林间落，河声地底回。相知不须早，语合自无猜。这自然是勉励我的。

梁先生在临中住了一年多，还有他的续弦和前妻生的孩子培恕也在一起。抗战胜利后一些时间才回重庆去。此后，我和梁先生的交往就甚少了。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的时候他回来见了一次面。

1985年冬和1987年初因事赴京又拜见了梁先生。那时他已93高龄了。见一次面不容易，旧事重提，写成条幅模样送给他老先生一首诗：烽火焚漓水，先生结队来。民盟潜发展，绛帐早宏开。异客天涯至，惊雷地底回。诚坚同抗日，蒋桂费疑猜。

1989.6.26

梁漱溟先生在贺县

薛汉权

谈及梁漱溟先生的文章，从各方面为研究梁先生的思想提供了日见丰富的资料。令人不能不感到遗憾的，是叙说他1944—1945年在贺县的经历的却嫌太少。而这一年，梁先生不仅大有所为，且所为实属适时得宜，是他历史上闪亮的一页。正如梁先生在《忆与临中师生相处的岁月》上说的：“我于抗日战争胜利前最为艰难时期，曾寄寓临江，为抗日及民主事业贡献绵薄。”他“曾在临江为时一年，其间经历固有不能忘怀”者。

1943年起我在临中高一班读书，梁先生在临中，恰好住在我班教室西侧的平房，相隔仅10多公尺，有一段时间他还住在我班教室二楼（图书馆）西侧的一间小房。他爱好散步，在散步中与友人指点江山，畅谈古今，每天傍晚都结伴到学校东侧的恩平寨附近走走，我家近中学，我外膳时来回要经过恩平寨侧，因此，真是“断时不断日”地见到梁先生，有缘结识学者，他之为人，是真学者还是伪君子，我有所见，此其一；他在临中讲《动员与民主》作记录的是我，最先整

理成文的也是我，他标准京音，怀着一颗爱国忧民之心，说时不急不忙，娓娓而谈，低抑处或诚挚感人，或诲人不倦；高昂处却绝无畏惧，宁折不弯，真是文如其人，此其二；他和李嘉人商谈联合抗日问题，在临中何砺锋房间谈论犹未尽善，以后选在他当时散步常到的薛屋大松林里，意在避人耳目。我家住在大松林旁，菜园在松林边沿，我妈最熟悉“松山”，妈当年对梁先生等人两次在大松林的行止有所知觉，作为一个苦命人的她说及过这事，她的话时时在我的回忆中萦绕，此其三。有此三端，当时仅是一个初知人事的高中学生的我，虽然对梁先生所知不多，对梁先生所为不尽理解，但为了使梁先生在贺县有一个较清楚的交代，我检阅了尽可能找到的资料，综述梁先生在贺县的一年，也算是师生一场，谨表示不敢忘忽他对我的教诲，也表示对他深切的怀念。

一、梁先生来贺县

梁先生与陈此生先生同来贺县，以后一直同住在一起，至陈先生先离开临中而去。

陈此生为贵县人，中国人民救国会会员。1935年，他在广西师专任教务长，桃李满天下，与李任仁、陈劭先、杨东莼关系密切。梁先生原籍桂林，寄寓北京，当年与广西当局有交往。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1941年5月曾到香港办《光明报》（民盟机关报），9月18日开始出报。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进步人士撤离香港，他与陈先生到了桂林，以后两人都参加广西建设研究会（在抗日战争的桂林，此会起保护进步文化运动的积极作用）的各种活动。

1944年8月，日军攻陷衡阳，广西省政府机构全部迁宜

山。当时梁、陈都在号称文化城的桂林。9月中旬，桂林再一次紧急疏散（5月已疏散一次）。在桂林的进步人士，如果过去有谁曾对蒋介石抱着什么幻想，这回已彻底破灭了。

“退到哪一天？退到西康去？……”陈此生和其他爱国志士一样，坚决表示要抗日就不西撤。他们不愿随省府退去百色，也不愿去贵阳，更不愿去重庆投靠蒋介石。梁先生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桂林核心小组总负责人，他义无反顾地作出决定，带着其续弦陈树葵（原配夫人姓黄）及前妻之子培恕，与盟员陈此生相偕搭船沿漓江南下平乐，再到昭平。

这时，先后到昭平的有：何香凝、千家驹、陈劭先、万仲文、欧阳予倩、周匡人、张锡昌、胡仲持、莫乃群、高士其等（李任仁在蒙山被白崇禧拦住，去了凌云）。柳亚子、肖敏颂、邹灌芹（楼楼）、陈芦荻等到了八步。张铁生则去了广东连县，住在一个小书店里。昭平、八步，相距仅80公里，同属平乐专区。大批为祖国担忧、为抗战愿出一把力量的爱国志士集结于敌后的桂东。

八步，当时是平乐专署所在地，专员李新俊是一个较开明的国民党官员，“对进步人士较有优容”。梁漱溟看在眼里，认为有必要到八步开展民盟工作。当时交通条件很差，只有几部烂汽车（烧木炭）行走。梁已51岁，陈的年纪不相上下，两人决定爬山路，结伴到八步一行，看看情况。

当时，闻名遐迩的临江中学就设在八步近郊的芳林，爱国民主空气很浓厚。校长李镇、教务主任刘彦忠、训导主任何砺锋是临中的三大支柱，三人因曾同在邕宁国民中学教书而结识。何30年代就读广西师专，是陈此生的学生，对陈一向敬慕；梁漱溟曾到广西师专讲过《乡村建设与教育问

题》，何早知梁。何、刘于1939年都曾在当时被誉为“南方抗大”的广西建设干校做过教员（当时叫小组指导员），很合得来，他们把干校的做法移植于临中，得到了李的理解和支持。何听说陈此生来了八步，并有意在八步久住。闻悉之下，何、刘就商议把梁、陈一起接进临中住，一则稍尽学生之礼，二则把各学者请进临中，能鼓舞师生，对办好临中大有好处。何、刘把这一想法向李镇陈述，当即得到李镇支持。

于是，梁、陈被顺利地接进了临中。在朋友的帮助下，梁的家眷也住进了临中。陈树棻还上语文、地理课。梁、陈被安排住在一座清静的平房，和李镇住房仅10余尺之隔，时在1944年10月下旬。此时，陈的爱人盛此君远在贵县。梁、陈遂共炊。通过梁、陈，张铁生、肖敏颂等学者都被请进临中，张、肖及肖的夫人曹国智都在临中上课。

梁先生虽50有奇，清瘦却硬朗的身骨，显得很有精神。生活极为朴素，保持了学者的布衣本色。行为不拘不束，乐于抒发意见，健谈、乐观、豁达。穿著随和，一套灰布长衫蓝布裤，旧到褪尽颜色；穿一双旧布鞋，很少穿袜。常戴一顶瓜子帽，灰色布制，似乎曾外嵌一条黑边。需求简单，极易待承，吃素，却吃鸡蛋；行李不多两件，住房陈设极简，没有一个大件头。临中曾搬一套当时算得上品的樟木沙发到他房子去，他一再谦让，不愿接受，说：“这是阔人才用得上。我合适用桌凳。”从不摆阔气，要派头，不盛气凌人，与当年的穷教员并无二样。从他的房间的陈设，从他的衣著和外表，看不出梁先生是一个接触过当代不少名人，甚至和毛泽东、蒋介石都有过交往的大学者。

二、梁先生做了三件事

（一）抗日救亡最紧要。

当时的贺县，处于日本的四面包围之中。贺县虽大，但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摆在有良心的中国人面前的当务之急，已经别无选择，只能自卫图存，抗日救亡，保家救国。

梁先生于10月底住进临中后，屡次向师生们表达过他不满意蒋介石消极抗日的看法。他说蒋介石决定躲开日本人，有其不可告人的意图。他来到八步，目的是抗日，要拥戴李济深领导抗日，建立抗日根据地。梁先生“最注意的问题，莫过于发动群众支援抗战，而无政治民主则不能发动群众”。因此，11月份他除对临中师生讲《动员与民主》外，还忙于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频繁地找贺县士绅高雁秋等及富川钟山一带的士绅名流，并亲自到专署向李专员做说服工作。

他在桂林时，“正值李济深任军委会驻桂办公室主任，彼此在政治上立场意见十分相合，乃时相过从”（见梁《我所知道的重老二三事》）。1944年6月，李济深曾与吕集义等到过八步，受到李专员的欢迎；当年8月，梧州沦陷，李和蔡廷锴（罗定人）相约回家乡抗日，李回到苍梧戎圩大坡家乡，发动群众，也派人到八步联系民主人士，部分被请到大坡；为了反蒋，李与梁漱溟接触频繁。1945年春，梁曾专程到大坡请狄超白（中共派狄在李身边做统战工作）来八步指导民盟总支筹委会的成立工作；1945年夏，梁与陈此生又由李济深早年副官长李泽霖陪同，秘密去大坡见李，讨论华南局势。

1944年12月下旬，曾在广西建设干校任指导员的李嘉人，受中共广东省委之命从东江纵队来临中，住在台山同乡刘坚（也在干校任过指导员）、李梓高处。梁漱溟、陈此生曾到何砺锋房和李嘉人密谈联合抗日问题。次日，李嘉人又约梁、陈到临中附近薛屋大松林里商谈，决定由陈此生和李一道去广东找党的领导商谈，陈临行前，梁用小小烟纸写了意见，由李梓高爱人苏健密缝在李嘉人的鞋底带回去。到黄姚后因情况变化，陈此生折回贺县。李嘉人在贺县约一个半月，筹划武装抗日，后回广东；回前曾安排刘坚、李梓高、何砺锋等支持梁漱溟等工作，搞好抗日统一战线。以后李嘉人由狄超白陪同见李济深，表达了中共支持李济深的抗日民主主张，并商谈组建从东江经西江到桂东大块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问题。那时，我回家外膳，我妈曾问我在路上碰到了几个老师回校。她说：“三个老师在松林里大半天，用枯枝在地上划来划去，说要多搞点枪和子弹……年轻的那一个见到我，干咳了两声，大家就停口……。”过了几天，我妈又说：“那三个老师又到松林里，在地上摊开张纸，指指划划。年轻那个掏出張纸，低声念了好久……。”指的就是李嘉人找梁漱溟、陈此生密谈的情形。

1945年3月中旬，国民党杂牌军黄瑞华、罗志强围攻专署。19日，何砺锋曾请梁漱溟、陈此生转移到道石粟氏祠堂躲避了两三天，中共地下党员粟稔曾出来接应，动员村民放哨巡逻，保护梁等的安全。梁先生对粟稔很赞誉。

正因为梁在抗日救亡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何香凝于1953年9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上曾说：“当我和梁先生在广西昭平、八步做反蒋工作期间，我对他是敬重的。”

（二）组成民盟东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

1944年年底，梁漱溟以民盟中央常委的身份在贺县开始工作。

中国工业生产合作社桂林工合负责人之一狄超白于1945年春从重庆经昆明、百色，穿过日军封锁线到了昭平黄姚。狄是中共地下党员、民盟盟员，派在李济深身边做统战工作，他向地下党员张锡昌等传达：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已于1944年改组成民盟；中共南方局指示：周恩来同志很关心民盟工作，希望疏散到八步、昭平的文教界人士加入民盟，把民盟工作发展起来。也带来了民盟总部要梁先生在桂东筹建总支部，以推动两广、福建、江西、浙江等省的民盟工作的指示。

根据民盟总部指示的精神，梁、陈、张等研究了在桂东成立民盟组织的问题。他们开始在民主人士中积极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发展盟员。1945年春，由梁先生主持，在张铁生房间，张铁生、李镇、何砺锋、刘彦忠等加入了民盟，之后加入的尚有肖敏颂、楼棲、成庆生等，在临中成立了民盟八步支部；几乎同时，由张锡昌主持，欧阳予倩、莫乃群、周匡人、徐寅初、千家驹、朱敏、黄半文、陆联棠等加入民盟，在黄姚成立了黄姚支部；接着，以这两个支部为基础，梁、张在临中召开民盟会议，梁以民盟总部代表的身份宣告民盟东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工作范围包括两湖、两广、云贵、福建和海外等地方。

经筹委会讨论，选出了11个委员，分工如下：梁漱溟为总负责人；陈此生、徐寅初、周匡人为组织委员；欧阳予倩、张铁生、莫乃群、肖敏颂、千家驹为宣传委员；李镇为财经事务委员；张锡昌为委员。（《梁漱溟问答录》尚把狄

超白列入)

根据狄超白的传达精神,民盟工作的总则是:工作公开,组织秘密。即:公开开展民主宣传,民盟组织对外保密。

中共广西省工委非常重视和关心民盟东南总支部的成立。省工委书记钱兴曾在黄姚数次找张锡昌、周匡人、徐寅初等研讨国内外形势和开展桂东敌后民主运动等有关问题,也曾问及李嘉人与梁漱溟等商谈联合抗日之事。中共对桂东民盟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和鼓励。

民盟东南总支部筹委会团结各方面的民主人士,充分利用《广西日报》黄姚版地处敌后、新闻不需检查的特点,或写针对性的评论,或以路透社等字样刊登新华社电讯,宣传中共“三个坚持”的方针,鼓舞人民的抗日情绪。重庆民盟总部寄给梁先生一笔民盟活动费,陈此生鼓动梁用之于办《民宪》(桂东南版),先后由张铁生、肖敏颂任编辑,共出三期,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刊登了梁漱溟写的关于民主宪政的方针,张铁生写的国际论文,陈此生的杂感,及盟员在八步举办民主讲座的主要内容,由中共办的八步兄弟图书公司(曹建飞任经理)发行。

白盟员李镇主持,开办了不定期的民主讲座,以扩大抗日民主的宣传活动。如梁漱溟讲《到民主宪政之路》,陈此生讲《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张铁生讲《当前的国际形势》,肖敏颂讲《目前的抗战形势》……。还请何香凝、柳亚子讲话,何痛斥蒋介石独裁专政,其法西斯统治为倒行逆施;柳讲文化艺术为抗战服务。何、柳的讲话激动人心,不少听众为之挥泪。民主讲座针对时局,讲题都是群众关心的问题,故听众踊跃,效果良好,有自百多里外如钟

山、富川等处远道专程赶来听讲的，通常有500人左右。

抗日胜利以后，总支部筹委会盟员根据工作需要，陆续离开八步黄姚。如陈此生、张铁生、千家驹去了香港；张锡昌、欧阳予倩、莫乃群等回桂林；肖敏颂去湖南；梁漱溟回重庆参加民盟中央工作（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邵力子自重庆电邀梁赴渝与各党派共商国是；因交通工具不便，不克成行，至11月始经梧州而广州，转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桂东一带盟的活动暂告停止，1945年12月29日，民盟在香港成立南方总支部，宣布民盟东南总支部筹委会并入南方总支部，坚持在八步的盟员仍然积极活动。民盟东南总支部筹委会在桂东撒播了革命的火种。

（三）宣传抗日和民主。

梁先生在贺县，“原不遑顾及著述”。然因李镇校长之坚邀，于1944年11月在临中大礼堂对全体师生讲《动员与民主》，讲话中强调了发动群众支援抗战的重大意义，阐明了政治民主是发动群众抗日的先决条件。该讲话当时由高一班学生薛汉权记录整理成文，经梁先生定稿后铅印成小册子出版，当时，临中师生人手一册，部分向校外销售。至今时近50年，风风雨雨，再加上梁先生曾历受批判，收藏其著作自然列入“不宜”，故已难以找寻。近访得广西师大尚有人藏有此书，真算得是难能可贵。

梁先生曾应《广西日报》、《八步日报》之约，撰文讨论实行宪政问题。他又在八步民主讲座中，对各界人士讲《到民主宪政之路》。他说：中国要走的民主宪政之路，是英国样的，一党执政，一党在野，两党交替执政之路。他又说：中国国内不存在什么阶级，中国社会以家庭为中心，没

有阶级剥削和对抗，只有小贫和大贫，没有小富和大富。主持人李镇会将梁先生的观点告诉了陈此生、张铁生，三人对此很有意见，曾有针对性地和梁讨论过这个问题。梁在第二次讲座时说：“中国虽有阶级存在，但它是变动不居的。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明证。”李镇又将他这个观点向盟内反映，大家未与梁讨论，未在这个问题上多所纠缠，只是陈此生、张铁生、肖敏颂在主讲讲座时，曾结合这个问题有所论述，在广大听众中澄清了一些问题。梁先生为刘彦忠写的条幅：“寄语天下人，尊事毋欲速。导师慎指南，一误悔难复。”这里指的，是一些老师当时讲课时论及了阶级斗争。

据曾参加当年专区八步政工队的李民同志回忆，梁先生于1945年1月在政工队讲过《建国问题》，他指出近百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两条建国的道路，一条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建国道路，另一条是欧美的资本主义建国道路。中国人民将会选择自己的道路。李民为临中初一班毕业生，在听梁先生讲话时原作了较详细的记录，在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又作了纲要性的摘录。

梁先生还参加了八步《文苑草地会》的许多文人学者的活动，与文化人有过许多往来。他与部分盟员及临中老师，也有过往来，为何砺锋老师等写过条幅等。他为临中同学录的题词：相交期久敬，志道毋远求。所有条幅及题词等，总明指或暗说在“人各有志，人各有路”的探求中，他“吃喝玩乐之事，平生不去追求，十分淡泊”，而“信念目标不移”，“活到老，学到老，思考到老”。（均见《梁漱溟问答录》）

梁先生在贺县一年多，时值抗战最艰苦之时，他在艰难的条件下，毫不退避，肩负重任，发挥了力所能及的作用。他为民盟的发展；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人民民主；为坚持抗日救亡，反对投降逃跑，为抗日民主事业做出了不可抹煞的贡献。他在贺县的一年，正如他一生的其他岁月一样，与中共的统一战线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是在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

梁先生之业绩如何？他作古后，《人民日报》已为他作了中肯的总结；著名学者费孝通等也为他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他一生辨是非，重操守，以峻峭不可侮的风骨治学处事为人。他在贺县一年，所作所为，为当年的贺县文教界、社会人士及寄寓贺县的文化人所熟悉，也为广大文化人所尊重。梁先生不愧为一代宗师。

1988年1月26日，他在逝世前不够5个月时，曾为临中题词：“人生在世，贵乎有所创造贡献，以不负此生焉。”先生未辜负在贺县这一年，有所创造贡献。他曾说过：“学问技能真不真，全看是不是自己去求得的。一分自求，一分真得；十分真求，十分真得。”记下梁先生在贺县一年的“求得”，也许还有一些意义的。

梁漱溟先生对进步青年的 支持和帮助

唐 宦 存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和世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哲学家和教育家，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一生著作很多。一生抱着救国救民的宏愿，进行乡村建设和农村的改革，抗战爆发后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解放战争时期，积极奔走和平，到北碚办教育，写作《中国文化要义》。在北碚这段时间，梁先生关心青年的成长，支持青年的进步活动；对于反蒋的民主运动和学生运动，积极关心和支持，在学术讨论时，允许各种意见共存，发扬民主。北碚解放前夕，有相当一段时间，我在他身边学习和工作，受益很多，现就我接触的一些情况，作个回忆，以表对尊敬的梁先生的哀悼和深切的怀念。

一、关心青年的成长，支持青年的进步活动

1946年冬，国共和平谈判破裂后，梁先生来到北碚创办勉仁国学专科学校（1948年改为勉仁文学院），陆续招生数

百人。梁先生十分关心青年的成长，除正规招生入学外，又根据青年的特点和具体困难，个别吸收了一些学生入学，我就是梁先生个别吸收入学的。1947年初，我是准备去延安的，因国民党掀起了内战，封锁了青年去延安的道路，又强令中共在国统区工作的人员撤回延安，这时地下党介绍我到天府煤矿子弟学校工作。1947年夏，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国民党在城市大量捕杀共产党和进步人士，重庆发生了“六一”事件，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入狱。这时，有相当多的同志派去农村隐蔽和开展农村工作，在天府子弟学校的同志，大多转移走了。我受到了威胁，在这困难的时刻，我写信给梁先生，表示希望到勉仁国专读书，梁先生亲自热情给我写了回信。凭此信，我直接到梁先生家里，受到亲切的接见。我说，我是一个失学的青年，抗战时离了家，生活不能靠家庭负担。我读书不但交不起学费，而且自己的基本生活费用，还希望学校帮助解决。梁先生说，读书是可以的，教室里加张课桌就行了，也可以免交学费；至于生活，可以给学校抄写讲义等，吃饭可以解决。梁先生完全满足了我的要求，并留我吃了午饭。梁先生饭食很简单，一小碗饭，一个炒鸡蛋就行了，不吃肉食品。梁先生还要请陈亚三先生给我安排，有什么事可找陈老师。这样，我就到勉仁国专读书了。梁先生奔走国内和平，热心教育事业，他的著作我也看了一些，是我尊敬的，但我并不认识，仅就是那封信，就热情的接待我，安排了我读书，特别是勉仁国专是私立学校，靠学生缴纳学费来维持的，这却是难得的，想不到的。说明他是非常关心青年人成长的。

梁先生关心青年人成长，还有许多事例，我的同学、党

支部书记周述质也是如此。他原在合川金子乡小学教书，与陈伯纯（华蓥山武装斗争副司令）、刘石泉（烈士，华蓥山武装斗争七支队政委）一起搞农运工作，因工作暴露，通过关系找梁先生，经梁先生同意，转移到勉仁国专读书。又如答相舜同志，原在民生公司工作，也是对梁先生钦佩，写信给梁，经梁同意来校的。周述质、唐宦存、答相舜三位同志在中共川东临委第七工委的领导下，在梁先生的隐蔽下，在师生中进行学运工作。七工委副书记刘石泉同志数次到校，布置任务，指示要做好梁先生的工作，利用梁先生的政治地位和学校的有利条件，开展民主和学生运动。1948年9月还建立了以周述质为书记的勉仁文学院党支部。1948年夏，重庆地下党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大破坏，加上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冉益智的叛变，使党在组织上遭到重大损失。同年秋，成都地下党派了一部分党员到重庆工作，确定李惠春同志到北碚负责，她也是通过进步关系向梁先生写信，经梁先生同意，李惠春到勉仁文学院历史系读书为掩护。李因梁先生的关系，在北碚站稳了脚跟，在北碚各大中学校发展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开展学生运动和统战工作，做出了一定成绩。

梁先生不但热爱进步青年，解决进步青年的困难，对进步的教师也是支持的。1947年初，共产党员赵放卿在贵州赤水工作，在那里搞得“太红”了，准备换个环境，他写信给梁先生，希望到勉仁国专任教，很快得到梁先生的同意，到校担任现代中国史的课程，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讲授。赵放卿同志党的关系由北碚相辉学院任教的方敬同志领导。赵放卿同志非常尊重梁先生，梁也支持赵在校的活动。赵放

卿同志利用梁先生的关系，在校内外做了许多进步工作。

勉仁中学是梁先生创办于1939年，1940年迁到北碚，1946年底，梁先生回到北碚后，也加强了对勉仁中学的领导，聘请民主同盟成员，中央大学毕业的杨新德先生为校长。杨新德是一个爱国青年，思想开朗，与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好同志（可惜1957年划为右派，文革中去世），梁先生很器重他。校内许多重大问题，都听取杨的意见。杨对学校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由杨推荐，经梁先生同意，吸收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到校任教，如聘请王寒生（1939年入党，解放后曾任重庆沙磁区区长）、赖松（原重庆女子师范学院党支部书记）、袁铁羽（四川阆中县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刘芝楚（现河南大学教授）等到校任教，又从兼善中学等校转了一批学习成绩好，思想进步的学生到勉仁中学读书。从而学校办得很活跃很有生气。学校建立了以王寒生为书记的勉仁中学特支。梁先生是民主同盟发起人之一，在梁先生的支持下，勉仁中学建立了同盟小组，成员有杨新德、黄良庸、黎涤玄、李渊庭、何吏衡等。党的特支与民盟小组关系很好，杨新德曾数次要求加入共产党，但为了发挥民盟在学校中的作用，王寒生劝说杨新德暂时不要入党。

从1947年到1949年，勉仁中学和勉仁文学院在梁先生的影响下，中共党的组织建立起来，发展了不少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成员，民主同盟组织也建立和发展了，民主运动和学生运动蓬勃发展。

二、梁漱溟先生对民主运动和学生运动的支持

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灾难。这

些，梁先生原来是认识不足的，经过周恩来同志的帮助，梁先生认识到了。特别是经过许多事实的教育，梁先生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坚决反对美国援蒋反共。1946年12月，美国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的事件，全国掀起了抗暴运动，勉仁国专学生积极响应抗暴斗争，发表声明，进行反美反蒋的宣传。国民党特务在重庆逮捕各界抗暴民主战士，在北碚的乡村建设学院（晏阳初创办）就抓了师生31人，勉仁国专成立了后援会，办了“晓声读书会”，营救被捕志士。国民党在北碚的特务头子到勉仁国专行凶闹事，清查进步同学，殴打行政负责人。梁先生知道此事后，支持学校行政和学生的革命行动，在梁先生的支持下，学校行政负责人和学生会在北碚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了国民党特务的罪行。以后，国民党特务对梁漱溟在北碚的行动进行监视，对来往书信进行非法的检查。

1949年秋，勉仁文学院党支部根据地下党领导人刘石泉的意见，为了把勉仁文学院的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在勉仁文学院内办一所工农业余学校，支部确定我任校长，负责与学校领导交涉，招收工农学生等任务。我去找梁先生，梁先生说：办这样的学校很好，我支持，我给陈亚三先生讲一下，支持你们办好，你也可以去找陈先生，帮助解决办学的具体问题。我去找了陈亚三先生，他拿出了一间教室交工农业余学校用，在晚上讲课时，保证灯油的供给。我们从北温泉附近的工厂农村组织了四五十人入学，使工农业余文化学校比较顺利的办起来了，促进了北碚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发展。

1949年4月，重庆市掀起了“反饥饿、争温饱”的反蒋

学生运动，这个运动在北碚，在勉仁中学、勉仁文学院蓬勃的发展。但由于国民党特务钻到学生中进行破坏，虽然大部分学生要求罢课去重庆参加全市大游行，但有少数学生反对。勉仁中学和勉仁文学院内，这种争论很激烈，有时甚至形成斗殴。梁先生开始是怕学生参加游行出事故，劝学生不去参加游行，但大多数学生要求去，就表示支持，并由学校布告停课数天。在中学，梁先生同意高中学生全部去，初中学生中少数年纪大的可以自愿参加，并由校长杨新德亲自带队。从而去重庆参加“四·二一”大游行，得到很好的解决，去重庆市游行回校，梁先生又亲自接见，祝学生爱国游行成功，又安全回家。

“四·二一”学生运动后，国民党特务逮捕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分子，有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后关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最后牺牲了。这时，勉仁中学的七个地下党员在暑期前先后全部撤走了。校长杨新德因带领学生去游行，国民党特务要抓他，经梁先生同意辞去校长职务，去了成都。

梁先生非常关心“六一”事件、挺进报事件以及反饥饿争温饱运动中被捕人士的安全，有关方面找到他请他出面营救，他就亲自找重庆有关当局，如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的两名记者被捕关在渣滓洞监狱，经梁先生保释。有的进步学生，在校外危险，安排在勉仁文学院隐蔽，如重庆大学一个学生经梁安排，就住在学校宿舍。

“四·二一”学生运动在勉仁文学院中，我由于带队游行，是全校的“红人”。国民党特务很注意我了，经党支部研究，我暂时离校躲避一下，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是一个

外省人，四川话又说不好，生活来源也困难，在这个困难时刻，我又去到梁先生家里，请示梁先生怎么办好。我说：这次“反饥饿、争温饱”学生罢课游行，我出面做了一些事，最近风声很紧，国民党到各大中学校抓人，我在勉仁文学院不好再住下去了，但又没有适当的地方去，想问梁先生，怎么办好？我还问了一些中国形势发展的方向问题。梁先生想了想说：“国共谈判破裂后，国民党军队一直打败仗，现在长江之长，长江之险，也阻止不了解放军过江，四川很快就会解放。现在读书求张文凭也没有多大用处，应该安下心，认真读书，你可以住在中学这边，文学院有些课程也可以听。如何安排食宿，你可找云颂天老师。”杨新德校长去成都后，中学行政工作由云颂天先生负责。云先生是广东人，跟随梁先生多年，梁先生交给的任务，都是认真办的。云先生把我安排在图书馆楼上。这里非常安静，个人住一间寝室，还有梁先生的儿子梁培宽同志也住在楼上另一间。我在这里隐蔽了大半年，党支部给我的任务是负责做勉仁中学师生的工作，发展党的外围组织成员。有一位姓梁的同志，跟随梁先生多年，我发展他为新青社员，共同研究发展了近10名。原勉仁中学特支对梁培宽同志曾进行过工作，但很快特支同志撤走了，我对梁培宽同志进行过几次交谈，但谈得不深，党支部研究时，没有确定马上发展，作为考察和培养对象。

1949年10月，除我住在那里外，又来了一位同志。当时，我们两人生活困难，梁先生知道了，准备支援一担米给我们暂时维持生活。但是，我们考虑学校也有困难，没有去领取，但梁先生爱护学生、关心学生的一片心意，我们是领受了。

梁先生虽然不很清楚我是共产党员，但知道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是不满的。梁先生和陈亚三先生等一起，对勉仁文学院学生的政治态度，曾作研究分析，对进步学生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因此，对我俩很关心，并在经济上给予支持。

1949年解放军占领南京前，李宗仁先生到了重庆，准备会见梁先生，派程思远到北碚勉仁文学院看望梁先生。梁先生对程思远说，国民党大势已去，我会见李宗仁也没有用处。因此，梁先生就没有与李宗仁见面。当时，勉仁文学院和勉仁中学经费非常困难，逼得把中学的高中停办了，减了许多教师学生，他与梁师母结婚时的戒子等物也变卖了，以维持学校师生的生活费用，李宗仁曾赠送4000元，这笔经费却对梁先生办教育是一个很大的支持，从而度过了难关。

三、教授《中国文化要义》，继承中国文化传统

梁先生至1946年底回到勉仁中学，创办勉仁国专、勉仁文学院，专心写作《中国文化要义》（以下简称《要义》），给学生讲授《要义》，我到校后，就认真听梁先生讲课，为梁先生抄写和刻印《要义》的讲稿。对梁先生提倡的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我是认真做了的，如学习四书、楚辞、诗经、四史、文学等，认真领会中国文化的精华。为了把中国文化和当代革命理论结合起来，党支部还办了一个学术性团体松涛社，定期出壁报。对梁先生的《要义》作了研究，特别是梁先生有时召开部分教师学术讨论会，有时我参加旁听，有时杨新德校长参加后，与我互通信息。当时，我们对梁先生的《要义》，都是认真学习和研究的，对梁先生对印度哲学、西洋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研究和沟通，都表示崇敬、

钦佩。但是，在几个问题上讨论比较多，有时在课堂上、在小型学术讨论会上，都向梁先生提出过，有时还有争论，梁先生都发扬学术讨论的民主空气，允许发表各种意见。

第一关于阶级斗争问题。梁先生说，中国民族精神所在，是讲理性，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没有西洋那样的阶级对立。我们几个年青的学生，对此有不同的认识，我们认为在中国农村，存在着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严重对立。这种农村阶级对立，各个时期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理性作为中国社会的美好道德，维持社会的安宁是起了作用的，这是儒家思想重要部分，是需要继承和发扬的。但是一个阶级对待另一个阶级，如地主对待雇农、贫农，资本家对待工人，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在经济上剥削，政治上的压迫，就没有什么理性可言了，是没有慈善之心的。所以，我们对待梁先生这些观点，是有不同看法的，而梁先生也许可我们发表不同的意见。

第二是关于人的思想的根源问题，杨新德同志是北碚民盟的重要成员，很亲近梁先生，但对梁先生《要义》中某些观点，有不同的看法，我与杨新德原来不认识，到了勉仁国专后，经常往来，交谈一些理论学术问题，我们思想观点很相近。对梁先生关于人的思想来源问题，他向梁先生提出过，我也向梁先生提出过。我们认为理性、道德、宗教信仰，都是一定历史条件反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经济基础不同，人们的思想意识也不尽相同，永恒的思想、永恒的道德观点，不变的道德标准是不存在的。必须把当代的革命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和革命实践结

合起来，不能以过去的文化传统来代替新时代的革命思想，也不能抛弃中国文化传统。

第三是关于理论为现实服务问题。任何理论都要与现实联系起来，都是为了改变社会、推动社会前进。1946年到1949年正是中国大动荡、翻天覆地革命的时代，参与这个革命斗争，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中国革命人民的责任。《要义》没有反映和提及这个斗争，也没有作应有的表示。这也是我们讨论和有不同看法的。

梁先生抱着救国救民的宏愿，研究印度哲学，研究西洋文化，认识旧中国，建设新中国，从事乡村建设，是下了功夫的，是很有成就的，我跟随梁先生和当时的一辈师长，勤勤恳恳学习。

四、解放后与梁先生的接触

1947年12月2日，北碚解放了，梁先生在北碚迎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到来，主持了北碚的解放庆祝大会。不久我辞别了梁先生，到北碚党委机关工作。这里有一件事附带说明一下，即是关于罗镛先生，罗镛先生原在西南联大任教，闻一多被害后，梁先生去昆明处理，梁先生与罗镛相会，罗镛问梁先生，国内和平谈判破裂后，怎么办？梁先生说有意去北碚办教育，继续写作《中国文化要义》。罗镛先生表示，需要的时候，愿随梁先生到北碚教书。1949年夏，罗先生到勉仁文学院任文学系主任，但到北碚就病了，1950年1月病逝，我代表中共北碚区委参加了追悼会。

北碚解放后，梁先生即写信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很快得到周总理给中共北碚区委的电报，邀请梁先生去北京。

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梁先生到北京后，有一段时间受到批判，我由于有一段与梁先生的历史关系，也受到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消除了“左”的影响。我于1981年、1984年和1987年三次拜访梁先生。1984年6月曾经有六天的时间，每天上午8时半到11时，下午2时至5时，他给我谈了一生与共产党的主要关系。从谈话中，我深刻认识到梁先生是热爱党和拥护社会主义的，他对他的儿子和两个媳妇参加共产党，作为共产党员的父亲是光荣和骄傲的，是无愧的。他对毛主席和周总理是非常尊敬和钦佩，只是对毛主席晚年犯错误，表示惋惜。

梁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后，在《民国报》工作，对革命家孙炳文同志很赞扬，“漱溟”的名字就是孙根据笔名“瘦民”二字的谐音起的，梁先生一直用这个名字。在北大任教时，与李达的关系很好，李达遇害，是梁先生首先通知李的家属，并拿出50元积极安排后事。在山东和广州从事乡村建设时，有一批共产党员跟随梁先生工作。（这里附带提一笔，有人说，梁先生在山东办乡村建设研究院时，组织起来的民众武装，日本鬼子打来时，一部分被韩复榘带走，一部分投降了日军当了汉奸。这个说法是太绝对了，也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也有参加国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的）在抗日战争初期，梁先生在武汉参政会开会认识了周恩来同志，以后又去延安，见到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坚持抗战，取得抗战的胜利，树立了信心。以后在周恩来支持下梁先生等发起成立民主政团同盟，又去香港办《光明报》，因周恩来同志指示，香港党组织协助梁先生办好《光明报》，因此，在香港的廖承志等同志支持梁先生把

《光明报》办起来了。香港失守后，经广东地下党和范长江等同志的指引，转移到了桂林；桂林失守后，又在广西游击队保护下，去到八步。抗战胜利后，国共重庆谈判时受周恩来邀请，到了重庆，奔走国内和平。

梁先生还对我谈到建国时期的一些情况。他到北京后，毛主席接见时，问梁先生干什么工作好，梁先生提出想办中国文化书院，毛主席说，先到国内一些地方去参观，曾去东北等地，文化书院没有办成，1953年受批判。“文革”期间，梁师母受到冲击去世，梁先生曾在家里受到红卫兵的非礼，站板凳，收藏的字画、书籍等散失和烧毁，损失很大，梁先生谈到自己对批林不批孔的看法。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领导正确，生活安定，写的《人生与人心》出版了。接见我时梁先生很高兴，越谈兴趣越高，有时到了12时，保姆催吃午饭了，还要讲，说“把这个问题讲完”，“把问题讲清楚”。他讲到一些有名人物，我弄不清楚，他批评我知识太贫乏了。他还叫我提问题，以便把问题说得更清楚。

在接见我时，还数次为我题词写字，与我一起照相。1984年6月14日给我写的题词是：

好学近乎智 力行近乎仁 知耻近乎勇

1986年的题词是：

好问则裕 自用则小

梁先生不食肉，平时喜欢豆腐乳，饭后少量水果，如广柑数瓣。我曾寄一些给他，却批评我寄多了。今年7月，我的小孩出差北京，带去10来个广柑，但梁先生已重病住院了。

1986年重九，在四川的同事和学生，联合为梁先生祝寿，约定在梁先生百岁寿辰时，更隆重再次大庆，但梁先生95寿后就去世了。现在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比任何时候都好，并继续向前发展，梁先生死是瞑目的，我作为梁先生的学生，不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要更好的学习研究中国文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

1988年9月

梁漱溟与毛泽东

汪东林

34年前，即1953年9月间，毛泽东主席曾经十分严厉地批评了梁漱溟先生。关于这件事的始末，将留在本文的最后加以叙述。现在先要介绍的，是在1953年之前的30多年间，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的多次并不广为人知的重要交往，其中有1918年在北京地安门鼓楼大街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家的相遇，1938年初梁漱溟一赴延安与毛泽东的彻夜长谈，1946年初梁漱溟二赴延安与毛泽东等10位中共领袖坦率地讲叙自己对国内实现和平后的政见；1950年初梁漱溟由四川进北京后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毛泽东曾多次找他长谈……

习仲勋同志1986年8月在《相遇贵相知》第一辑《序》中曾说：“交朋友，还要交畏友、诤友。就是要同那些刚正不阿，直言无讳，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的人做朋友。特别是身居领导岗位的共产党员，要有大海一样的胸怀和宽宏民主的风度，虚心听取各种意见，尤其是不同的意见，使自己能够耳聪目明，辨别是非。”如果把这段话用在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交往上，或许是很相宜的。

在北京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寓所，常常给来访的梁漱溟开门的，是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

梁漱溟原名梁焕鼎，与毛泽东同生于1893年（光绪十九年），梁比毛早生70天。梁在“五四”运动之前，家居北京城内崇文门英子胡同。他自幼对哲学颇有兴趣，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常在他心中盘旋。辛亥年，他加入京津同盟会。民国后担任《民国报》记者，南北统一政府时与沈钧儒一道同任司法总长张耀曾的秘书，其间仍自学哲学，特别是佛学。这时候，他的本家兄长梁焕奎有一位知交，名叫杨怀中，湖南人，常来梁漱溟家中。一来二去，特别在交谈中，梁漱溟得知杨怀中是一位对哲学研究有素的专门家，且在北京大学任教，两人纵谈哲学问题，彼此逐渐相熟。杨先生对这位20多岁的哲学爱好者颇为注意和关切。民国6年（1917年），梁漱溟应蔡元培先生之聘，到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虽然年龄相差甚大，同杨竟成为北大哲学系的同事，又成为忘年之交，因此，他们的交往却更加密切。因为杨是长者，梁漱溟常主动到北京地安门鼓楼大街豆腐池胡同杨家登门拜访。有时在白天，有时在晚间。这以后，除了在北京大学有时见面，他们的见面便更多的在杨怀中家，而杨反而很少去梁家了。

时至民国7年（1918年）初，梁漱溟先生每每晚间到杨怀中先生家，常有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开大门，彼此相视点头，寒暄几句，并不互报姓名。梁漱溟进客厅自与杨怀中交谈，这青年却从不加入。梁漱溟心想，这青年准是杨怀中先生的湖南亲友或同乡，也从没有问过。后来，杨先生告

他，这位青年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有才有为，到北京找老师来的。经杨向蔡元培校长推荐，给这位青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到了月薪八块大洋的差事。他白天在北大上班兼学习，晚间回杨家住宿。杨先生曾将这位青年的名字告诉梁，但梁并没有记住。

不久杨怀中先生不幸病故。因为身后萧条，蔡校长便出面发动，希望大家资助办丧事，凡杨先生的好友都酌情出资，梁是其中之一。这位湖南青年，是具体承办丧事的人。丧事一完，他也就离开了北大。

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当梁漱溟先生1938年初只身赴延安，与毛泽东见面的时候，毛第一句话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7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毛泽东惊人的记忆力，唤起了梁漱溟深藏在脑海的20年前的往事。他只是吃惊地向毛泽东频频点头，连声说：“是的，好记性，有这事，有这事。”

1938年1月，在延安，屋外严寒逼人，屋内温暖如春，毛泽东与梁漱溟作彻夜长谈……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梁漱溟在山东进行了历时七年的乡村建设工作自然也维持不下去了。不久“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时局更紧张了。其时，梁漱溟在山东济宁接到老朋友张群先生转来的蒋介石邀梁去南京的电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答应了张学良、杨虎城和周

周恩来等人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由于日本人在卢沟桥扩大了战火，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抗日宣言，全国老百姓所盼望的国共合作，停止内战，全民抗日，已成为事实。为了抗日，实际上执掌大权的国民党政府，十分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于是就邀集了一些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到南京，在“最高国务会议”之内，成立了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叫“参议会”，其中亦有中共的代表，但大多数成员仍为国民党人。梁漱溟是作为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被邀请去参加“参议会”的。这个“参议会”，就是后来在武汉成立又迁至重庆的“国民参政会”的前身。

梁漱溟立即关闭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风尘仆仆赶到了南京，决心作为“国民参政会”的一员，为抗战出力。但事与愿违，国民党军队“八·一三”失利，日军长驱直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搬到武汉，梁漱溟作为特邀的“参议员”（后为“参政员”）也随即到了武汉。沿途所见，一幅流离失所、争相逃难的景象！特别是一些国民党大员，无信心抗日，有的舍弃大片国土，不战而逃，有的也只顾自己逃难，甚至有把资产、妻儿送往国外的。梁漱溟大失所望，自己对抗战的前途也很是悲观。但得知自日本侵华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一系列抗日主张深得人心。梁漱溟想，现在国民党方面令人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么样呢？梁漱溟早年曾读过一些共产主义学说经典著作，而李大钊先生等中共的先驱者还是他的好友，但他后来根据自己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因此不信奉共产主义学说。如今中共的领袖如毛泽东、周恩来等又搞了近20年，经过多少次失败，还在坚持

奋斗，其中心就在陕北的延安。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梁漱溟产生了去延安会见毛泽东的念头。由于国共两党已经合作，从武汉去延安也较方便。梁漱溟作为国民参政员，首先把自己的这个愿望和想法向蒋介石提出，蒋同意了。中共方面也表示欢迎。不几天，梁漱溟便登程北上了。

到达延安，接待他的是当时中共总书记张闻天。经张的介绍，梁才知道毛泽东是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张对梁来延安表示欢迎，并设宴洗尘。张说，毛的习惯是白天休息，夜间办公，谈话也安排在夜间。

头一天的谈话从下午6时至次日凌晨。时正冬天，延安气候严寒。6点钟天已擦黑，屋里掌了灯。谈话的地点不在窑洞，而在延安城内的一间瓦房里，很暖和。毛泽东对梁解释说，这是在屋外地下烧火，地面和墙都散热的缘故。在毛泽东首先提到1918年在北京杨怀中先生家中已多次见过梁先生之后，谈话转入正题。梁先生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梁说，他对目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个人心中亦十分悲观，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梁表示这次来延安，就是想就此向中共领袖讨教。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梁漱溟的叙述，露出笑容，斩钉截铁地答道：“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毛泽东一开头语气就这样肯定，神态这样坚决，很出乎梁漱溟的意外。接着，毛泽东十分详尽地、有声有色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

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等，最后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毛泽东讲得那样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眼儿里佩服。毛泽东话音刚落，梁漱溟即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过奖了，梁先生！”毛泽东连声说。梁漱溟心里不由地想起了蒋介石。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梁漱溟听过、看过，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从来没有象毛泽东这一次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梁漱溟怎能想到，毛泽东这天所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即是不久完卷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

时间已到后半夜，长谈告一段落。毛泽东很客气地说：“梁先生，您旅途劳累了。您我今天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谈吧。”“好的，好的。”梁漱溟起身说，“我送给您一本书，请您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随便，随便，朋友之间，无话不谈嘛！”毛泽东说着接过一本厚厚的书，那是梁漱溟新出版的数十万字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

第二天的谈话，也是从下午6点开始，但一直谈到次日天明，整整一个通宵，欲罢而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中国问题，即一旦抗战胜利，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梁漱溟和毛泽东分歧较大。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拿出梁漱溟昨日送的那本书，说：“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了。我还从

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的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确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其作用。而梁漱溟不同意的正是这一点。梁当即争辩。两人都反复申述自己的观点，相持不下，直至天明，谁也没有说服谁。

在48年后的1986年秋天，毛泽东已经辞世10年，93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在回顾这次争论时，还心绪激动地说：“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时而踱步，时而端坐，时而靠在床上，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这虚怀若谷的气度，如果能保留到建国以后，特别是他的晚年，那该有多好呢！”

在与毛泽东的两夜长谈之后，梁漱溟还到延安各处参观，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是很差的，但一派热气腾腾，其精神面貌与国民党地区有鲜明的差别。恰如他们的领袖毛泽东给梁漱溟的印象一样，是十分深刻的。

10余年后，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论有了结果。1950年春天，梁漱溟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召，由重庆来到北京。梁漱溟认真思索了他一赴延安时在第二个夜晚与毛泽东发生的那场争论，面对在战火中诞生了新中国的这一事实，他在作了一番考察之后，于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对自己作了一个总结。在这前后，他又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送给毛主席看。梁漱溟在文中毫无保留地说：“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梁漱溟的检讨和反省，虽然没有说清楚自己思想转变的来龙去脉，但却在事实的面前，承认了在看待中国前途的问题上，毛泽东是对的，而自己是错的。

1946年初，梁漱溟二赴延安，向毛泽东等十名中国共产党领袖陈述自己对国内和平后的政见……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在经历了八年战乱之后，人心思和、思治。毛泽东只身去重庆，国共和谈成功，签订了停战协定。紧接着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梁漱溟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之一，以民盟政协会议代表的资格，为实现国内和平而奔走，为和平实现之后中国的政治前途和经济建设而筹划。一时间，在各党各派的努力下，政协也达成了五项决议，全面涉及国家的政治、军事、立法、经济。不少人颇为乐观，特别是一部分人热望今后的中国，能如欧美国家一

样，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台上台下，你不行就我上台。

梁漱溟在年轻时也曾热衷于西方的宪政制度，包括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美国的总统议会制，特别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以法治国的做法。但后来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尤其是几十年来中国的现状的研究，使他对欧美式的政治，特别是两党制（一上一下），发生疑问，认为未必符合中国的国情。梁漱溟有自己的主张和想法，但在当时的重庆却无人可说，说了也未必有人听。于是他想到了共产党，想到了毛泽东，想到延安去向共产党的领袖们陈述一下自己的想法，即使没有什么结果吧，也可立此存照。况且自上次去延安，八年已经过去了。多么不寻常的八年，中国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恰如八年前毛泽东所说。现在再去延安看看，兴许是很有意思的。

主意已定，提出要求，二赴延安很快成行。梁漱溟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安排下，先搭飞机到北京，然后再由北京赴延安。同行的有美国驻延安的代表，还有画家尹瘦石等。梁漱溟到延安一见到毛泽东，寒暄后即提出，他希望能有一个机会，请毛泽东找多位中共领导人（包括毛在内），听他陈述自己对当前中国的一点意见，如能满足，感激之至。毛泽东当即同意了。梁漱溟这次赴延安，虽然也是一个人，但身份已与上次不同。1938年初赴延安，他是社会贤达，无党无派；此次却已是民盟总部的常务委员、秘书长，政协会议代表。

第二天，梁漱溟被请到一间不大的会议室，毛泽东首先迎上来同他握手，除早已认识的张闻天外，又分别见过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10位领导人。梁漱溟情绪颇为激动，他

说：“谢谢各位朋友给我这样一个好机会，我很高兴。”

他在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后，说：“现在重庆情势很好。国共领袖蒋介石先生和毛泽东先生亲自谈判签订的停战协定已经生效，政协会议顺利召开了，有了五项协议，各党各派的代表劲头很高，社会各界反响亦好。但中国今后将走什么路呢？我不知道共产党方面的朋友怎么想，但在重庆，似乎方方面面都在说中国也要实行欧美式的宪政，说者头头是道，听者也蛮有味道，不见有人提出疑问，更无人持反对态度，包括我所在的民盟诸同人。我本人从年轻时开始，也曾一度欣赏和赞同西方的宪政制度。但面对中国的现实，在大家谈得正热闹的时候，却发生疑问了。

“这疑问源于中国的现状，其特点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主要是经济建设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工业水准与西方国家相差甚远，农业也是数千年前的老样子，没有大的变革和发展。与生产落后联系在一起的是老百姓贫穷，文化落后。而这一经济、文化落后的局面，正是中国在现代世界上站不住脚的症结所在。因此中国当前最迫切的事是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现代工业，把旧农业也现代化了，使中国在经济上接近欧美先进国家，才能谈得上其他。但是，要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中国必须要一个强有力而专心致志搞建设的政府，确立一个统一的建设方针，一口气搞它几十年以至上百年的经济建设。而不是两党轮流执政，互相攻击，你上我下，各搞各的。那样，中国的政局势必不稳，不可避免要顾此失彼，统一的建设方针无从谈起，想一口气搞建设也就不可能办到。

“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就是不间断地军阀割据，你争我

夺，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实际上也在忙于打仗，内战没有打完，便来了日本人，在战火中又过去了八年，同样什么建设也没有搞。

“我本人是清末民初的同盟会会员和国民党党员，虽然后来脱离了，进大学教书，又搞乡村建设运动，但曾经对国民党执政后能认真而长期地进行经济建设寄予希望。但末后我失望了，他们没有这样做，相当不少的人做了官就只顾肥私，国家、民族的利益被丢在一边，腐败的现象一天比一天严重。政府部门和官员对经济建设没有长期的规划、方针，即使有也大都是一纸空文，不实行亦无人追究，占第一位的始终是为不断打仗而不断扩大的军队、武器和军需。对国民党执政近20年的状况，大失所望的不仅仅是我，所有真正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人都不满意，连国民党人士中的若干朋友也不讳言。

“现在，总算大家同舟共济，中华民族同御外侮，取得了胜利。日本投降了（这不算是靠中国一国之力），内战差一点打起来，全国上下，各党各派，都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而今才有了停战协定，有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大家又兴高采烈地高唱着在中国实行欧美式的宪政，大谈在轮流执政、你上我下的政局中实现民主，进行建设。但恰恰在这种时候，我心中不以为然。我以为，在中国照搬欧美式政治体制的一套，一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二不合中国的国情和现状的需要，其后果将不利于中国迅即进行长时间的经济建设，致使中国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状况，而无法以独立、富强之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但如果诸位反问我，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你的意见、设想如何实现呢？我却答不

上来。我有自己的理想，如上所述，但面对现实却又不知如何去实现。因此理想又如同梦想。我今天讲的这些话，在重庆变得无人听，无人感兴趣，我也不想说，不便说。我今天专门到延安来，在这样的场合，讲这篇话，把自己的希望、理想（或者称梦想）说出来，向各位求教。如果不便深谈亦无妨。我只是把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向各位通报一下，算是留下题目，彼此去做吧……”

毛泽东等10位中共领导人都很耐心地听了梁漱溟的长篇发言。毛泽东没有插话，其他人也没有说什么。只有任弼时插了几句话。当梁漱溟说到对中国现状无可奈何，对国民党很失望，而自己也不知道中国何年何月才能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时，任弼时笑着插话说：“梁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要蒋介石先生死了，国民党垮了台，中国才能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而现在蒋介石并没有死，国民党也没有垮台，因此一时没有答案？”梁漱溟报以微笑，没有正面答复。他深知自己力量微薄，没有往深处想。他只有失望，而希望则如同梦想，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如何去实现。

梁漱溟先生在40年后回顾自己二赴延安时，才十分深沉地说：“的确，那时的我，连做梦也未曾想到，在我返回重庆不多久，蒋介石就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全面打响了内战，更没有想到，在短短的三年之后，蒋介石国民党真的垮了台，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认真的经济建设，实现了我当初梦寐以求而不知道如何得以实现的梦想。”

梁漱溟先生正是在他的思想、希望与现实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由旧中国跨入新中国的。

1950年初，梁漱溟由四川进北京，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毛泽东曾多次找他长谈……

1950年1月，梁漱溟应毛泽东、周恩来之邀，离开重庆，经由武汉到达北京。其时毛泽东、周恩来皆在莫斯科。3月10日，毛主席和周总理由莫斯科返抵北京，许多人到火车站迎接。可能因为梁漱溟是新近才到北京的缘故吧，统战部把梁漱溟排在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迎候队伍的头一个。毛主席立刻发现了她，大声说：“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您身体可好？家眷都来了吗？改日来我家作客，长谈，再来一个通宵也成！”毛主席如对老朋友般的和蔼可亲的态度，使梁漱溟除了紧紧握手，竟答不上话来。11日晚公宴，梁漱溟应邀出席。席间，毛主席走到梁的座席，见梁吃素，又不饮酒，便笑着说：“梁先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长寿也！”并当场约梁漱溟于次日（12日）晚去中南海颐年堂毛主席居处作客，梁漱溟欣然允诺。

12日下午5点钟左右，毛主席派汽车来到梁漱溟当时居家的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接梁，10多分钟后便进了中南海。梁漱溟进了颐年堂的院门，毛主席已在院里了。同去的还有林伯渠，他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梁漱溟1938年初赴延安途经西安时即认识，后来又在重庆旧政协会上交往过多次。

在会客堂彼此一番寒暄之后，毛主席即询问梁漱溟对国事有何意见？梁随口说：“如今共产党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不容易呵。”毛主席摆摆手，笑着说：“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

呵！”毛主席抽了一口烟，又接着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共产党靠大家，大家为国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毛主席最后提出的问题，却难住了梁漱溟。说不同意吧，颇有清高之嫌；说同意吧，又违背梁漱溟当时的真实思想。梁漱溟认为，新中国成立了，但对全国的大局能不能从此稳定统一下去尚有怀疑。梁漱溟想到自己是曾经以第三方面的身份为国事奔走过的人，如今后大局一旦发生变化，仍需要他这样的人站出来为国效劳，若参加新政府，便失去了为各方说话的身份。这就是梁漱溟当时的真实思想，却又不便说出。迟疑片刻，他答复说：“主席，象我这样的人，如果先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

梁漱溟的答复显然出乎毛泽东的意外，他的脸上显露出一不悦之色。说话间已到了开晚饭的时候，毛主席传话开饭，梁漱溟忙说：“我是食素的，有一两样菜就成，但您们吃什么自便，不碍我的事。”毛主席接过话头大声说：“我们也统统吃素食，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开饭时除毛、梁、林三人外，还有江青。但梁漱溟只同她点点头，彼此没有说话。

晚饭以后，毛泽东和梁漱溟又继续谈话。毛主席说：“梁先生从前在山东、河南搞过乡村建设，你可以去看看那些地方解放后有何变化。旧地重游，会有益的。然后你再去东北老解放区看看，比较比较。梁先生如同意，具体行程由李维汉、徐冰安排，他们会通知地方政府接待您的。”

梁漱溟接受了毛主席的盛情，于1950年4月—9月间，带随员先后参观了河南、山东、平原三省农村及东北广大地

区的城市、农村。梁漱溟所到之处，受到很高的礼遇和盛情的接待。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谭启龙，东北的高岗、林枫等领导人都亲自出面会见，并征求他对城市、农村工作的意见。

9月中旬，梁漱溟返回北京。9月23日晚，毛主席约梁漱溟谈话。这一天梁另有约请，当毛主席派车来接时，梁已用过晚饭了。梁一进门，毛就让人上菜吃饭，并说已准备了素食。梁说已用过饭了，请主席先吃。于是，江青亲自给梁端出水果，是很大的水蜜桃。梁边吃边奇怪，这桃子何以保存到9月间？毛主席同江青边进餐边说话，并没避着梁漱溟。主席问江青，要求去南方参加土改的事情怎么样了？江青说总有人处处设障碍，摆出种种理由劝阻她不要下去。主席大声说，那就看你自己的决心有多大了，有志者事竟成，别人是挡不住的。晚饭后主席就转过来问梁漱溟在外地参观的情况，梁一一作了汇报。末后主席说：“梁先生，你看了新解放区，又看了老解放区，但都在北方，还没有看到南方，你还可以再到广东看看。趁热打铁，你的收获会更大的。”梁漱溟面有难色地说：“我今年外出的时间长了，想休息一下，挤时间写些参观华北、东北的见闻观感，访问广东就且暂缓吧。”毛主席说：“那也好。”毛主席又转问梁漱溟居住条件如何？梁答：“住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一本家亲戚处，不是独院。”毛主席即说：“为使您生活、写作更清静些，我已让人安排在颐和园里边暂住，您就在家等讯吧。”不久，中央统战部徐冰即派车接梁漱溟先生住进颐和园内石舫附近一座小巧而精致的四合院里，一直住了两年多，至后来搬到积水潭边的小铜井一号定居为止。

1951年春，梁漱溟省悟毛主席要他看南方新解放区，意即要他看土改也。正值中央有土改工作团赴西南之举，梁漱溟便自动向统战部报名参加，得到批准。梁所在的那个分团有20多人，由章乃器任团长，于5月上旬抵四川，8月30日返京，历时四个月。

9月3日晚，即梁漱溟返京后的第四天，毛主席即约梁谈话，派车从颐和园接梁到中南海，还是在颐年堂。梁进门时，正遇章乃器与主席告辞。章走后，毛主席即说：“土改团总的情况，刚才章乃器来讲过了，我们不用多谈，还是先开饭吧。”仍然是素食，只有毛、梁两个人共餐。饭后毛主席问：“对土改，对四川，你个人印象如何？随便聊聊。”梁漱溟略加考虑，便说：“我亲眼看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要求，土地改革是深得民心之举，很必要，也很及时。但毛病也不是没有。比如政策规定不许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受到体罚，一同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那都不好。”梁说到此，毛主席笑着插话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分田分财，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有活路，不会自杀，也不会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梁漱溟接着说：“说到对四川的印象，解放不过两年，四川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意

料。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下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军政大员。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如解决袍哥问题，这在四川历史甚久，范围很广，影响很大。邓小平掌握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这桩事办得稳妥。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也就慢慢散开了；相反，如果一一追究，正好促使他们聚拢起来与新政府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十分清楚。邓小平之才干，就表现在这些方面。”毛主席听着笑出声来，大声插话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在1953年9月之前，毛主席与梁漱溟的交往大体每一二个月即有一次，一年有若干次，谈话内容十分丰富，以上不过是较为重要的几次。正由于梁漱溟与毛主席有着这样久远（几十年）而频繁的交往，就梁漱溟这一方面论，才在1953年9月遇到毛主席的批评之后，忘乎所以，如对待老朋友争论般拍案而起，犯了荒唐的错误。

1953年9月，梁漱溟受到毛主席严厉批判这一公案 始末

1986年深秋，当笔者同梁漱溟先生长谈，刚开始提到1953年这桩公案时，这位时年94岁高龄的长者，首先意味深长地说了一段开场白。

梁漱溟先生说：“多年来，我一直不愿意细谈这桩事。为什么？并不是怕把自己的错误公之于众，因为自己是个平常人，是好是坏只与个人相关，无碍于国家民族，不足轻重，我所顾虑的是另一位当事人——毛主席，他是中国共产

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1953年9月，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威信，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也是有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的批判在后。平心静气而论，这些气头上的话，双方冲口而出，大都经不起推敲和检验。而毛主席又是一位对国家民族举足轻重的人物，不用说他在世时不宜多讲，即使在他去世后相当一个时期，有人来问我，我也是粗略说几句，而不愿细谈。这倒并不是怕自己再犯错误，主要还是顾虑将这些细末都公之于众，对国家民族之大局会不会有不妥之处，尽管这桩事并非是什么了不起的惊天动地之举。

“但现在已经具备回顾这桩公案的条件了，因为：第一，毛主席已故去10余年，中共中央已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是非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第二，今天的中共中央是名副其实的集体领导，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通观全局，的确是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对于若干历史遗留问题，都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方针，一个个得到了圆满解决。这两条就为探讨和研究1953年9月发生在我身上的这桩历史公案，搞清它的是非曲直提供了前提。最后说到我这个主要当事人，如今已行将就木，来日屈指可数，我有责任本着对历史、对后人严肃负责的精神，从我这方面回顾一下当时的事实经过。至于如何分析评论，那应当是旁人的事。”

这桩公案的全部过程发生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前后一共10天。开始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议，后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当时的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数都比较少，总共不过数十人，有时

因会议内容比较重要，常常扩大到一部分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列席，梁漱溟先生便是列席者之一。

9月8日，周恩来总理（他同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主席为毛泽东同志）给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9月9日上午分小组讨论，在小组召集人章伯钧发言之后，梁漱溟即在会上发言说：“这一总路线原是人人意中所有的，章伯钧先生更发挥了周总理所讲的话，我于此深表赞同，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可说。路线既无问题，那么就看怎样去做了。要把事情做好，全靠人人关心这一事业，发现不论大小问题，随时反映给负责方面，以求减少工作上的错误。例如《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时常有人把他所见到的问题写信提出来，而党报收到来信亦马上能注意检查或交给该管机关部门去检查纠正，这就是最好最好的。这样做，一面看出人民能关心公家的事情，一面看出党和政府能够随时听取老百姓的意见解决问题。这种精神，在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应该继续发扬。只有自始至终发扬民主，领导党又能认真听取意见，这建国运动才能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其效就能倍增。”

9日下午，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大会，由周恩来副主席主持。他安排大会发言以交流委员们在各小组发表的意见。梁漱溟提议，请各小组召集人把各组内讨论情形在大会上统一汇报，以代替每个人再重复自己说过的话。于是章伯钧先生就出来把梁漱溟所在的这个小组所发表的意见，讲了个大概，其中包括梁本人的发言。会后周副主席宣布，第二天继续由个人作大会发言。周恩来在离开会场时对梁漱溟说：“梁先生，明天的大会你也说一说，好不好？”梁回答

说：“好。”

梁漱溟做事认真，既已应承了第二天要说话，回家后便思索准备一番。他想，如果把小组会上的发言内容重复一遍，就没有意思了。而且那天小组会上几乎全是非共产党人士，他所说的话是就党外广大群众而说的。而现在是领导党的负责人要他在大会上说话，他就应该说一些对领导党有所贡献的话。梁漱溟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连夜作了发言准备。但到了第二天即10日下午，大会发言甚踊跃，而且许多是外地来的，如上海、天津等地的工商界人士，讲得很好，因此会议中间休息时，梁漱溟便写了一个条子给周副主席，说会议应该尽量让外地来的人发言，在北京的人说话机会多，况且会议今天就要结束，他准备的发言可改为书面提出。周恩来说，让大家都能充分发表意见，会期要延长一天，请梁明天到大会上发言。

在11日下午的大会上，梁漱溟根据自己准备的，作即席发言。他说：“连日听报告，知道国家进入计划建设阶段，大家无不兴奋。前后已有多位发言，一致拥护，不过各人或由于工作岗位不同，或由于历史背景不同而说话各有侧重罢了。我亦愿从我的岗位（政协一分子）和过去的背景说几句话。

“我曾经多年梦想在中国能展开一个伟大的建国运动。40多年前我曾追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那时只晓得政治改造，不晓得计划建国。然而我放弃旧民主主义革命已有30年了。几十年来我一直怀抱计划建国的理想，虽不晓得新民主主义之说，但其理想和目标却大体相合。由于建国的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相配合、相和合，我推想政府除了已经给我们讲过的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方面之外，象轻工业、

交通运输等等如何相应地发展，亦必有计划，希望亦讲给我们知道。此其一。又由于建国运动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完成我们的计划，就使我想到群众工作问题。在建设工业上，我推想有工会组织可依靠就可以了；在改造私营工商业上，亦有店员工会、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发展农业上，推想或者是要靠农会。然而农会虽在土改中起了主要作用，土改后似已作用渐微。那么，现在只有依靠乡村的党政干部了。但据我所闻，乡村干部的作风，很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其质其量上似乎都不够。依我的理想，对于乡村的群众，尤其必须多下教育工夫，单单传达政令是不行的。我多年曾有纳社会运动于教育制度之中的想法，这里不及细说，但希望政府注意有更好的安排，此其二。

“还有其三，是我想重点提出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想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上天，农民的生活在下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共产党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他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梁漱溟的这篇发言，是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的导火线。

梁漱溟作了这篇发言后的第二天，即9月12日，参加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的大多数人，又列席了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在彭德怀司令员作抗美援朝情况报告后，毛主席即席讲话。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毛主席这番话，并没有点出梁漱溟的名字。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梁漱溟不再站出来辩委屈，争是非，也许事态不会扩大到后来那种剑拔弩张、不可收拾的地步。无奈梁漱溟是一个不甘蒙屈和好强逞能之人。他听完毛主席的这番话，一方面甚感意外，一方面很不服气。他想，我何曾是反对国家的总路线呢？我实际是拥护总路线的一员，只不过是说了点心里话，想贡献给领导党，提醒注意某些问题，根本没有想到会有损总路线，有损工农联盟。梁漱溟一面想，一面就提笔给毛主席写信，但信未写完，就宣布散会了。

梁漱溟回到家，继续写这封信。信中说：你说的一些话，是说我。你说我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信里还特别指出，他发言时毛本人不在场，希望毛主席给个机会，由他当面复述一遍他原来发言的内容，以求指教，解除误会。

9月13日上午，梁漱溟将信在会场上当面交毛主席。毛主席约他当晚谈话，即在怀仁堂京剧晚会之前约20分钟，连复述梁原来的发言内容，时间都不充分。梁匆匆说完后要求毛主席解除对他的误会，而毛主席则坚谓梁是反对建设总路线之人，只是不得自明或不承认而已。梁漱溟十分失望，但态度坚决，言语间与主席频频冲突，不欢而散。梁漱溟并不作罢，他还想再寻觅机会在大会上复述自己的观点，让公众来评议。

9月14日、15日继续开会。15日会上李富春主任作建设重工业报告后，梁漱溟即请求发言，主席允许可于次日再讲。16日，梁漱溟登台发言，一是复述9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二是复述11日在大会上的发言，并以上述发言之内容，再三陈述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而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

在16日当天的会上，没有人批评梁漱溟。

到了9月17日的会上，有位中共领导人作了长篇发言，中心内容是联系历史上的一些事实，证明梁漱溟的反动是一贯的。其间毛主席作了若干分量很重的插话，主要有：

“你（指梁漱溟，下同）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

“大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

“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一届（指1954年）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

“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

梁漱溟在现场听到这些话，深感自己因出言不慎而造成

的误会已经很深很深了。怎么办？依然是倔强好胜的个性支配着他。梁漱溟在主席台上的中央领导人讲完后，要求当场发言作答。主席台嘱他作准备，明天再讲。

9月18日下午，继续开会。会场的人数超过以往，大多数是临时列席的。会议进行到中间，轮到梁漱溟发言。他拿着昨晚在家准备好的稿子，一上台就开门见山地说：“昨天会上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当局认为我在政协的发言是恶意的，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的。但是，单从这一次发言就判我是恶意，论据尚不充足，因此就追溯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动，因而现在的胸怀才存在很多恶意。但我却因此增加了交代历史的任务，也就是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而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之异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就需要给我比较充裕的时间……”

梁漱溟的答辩发言刚刚开了头，会场上便有一些人打断他，不让他再往下讲。而梁漱溟呢，正迫不及待地要往下讲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以解除落在自己身上的大误会。相持之下，梁漱溟离开讲稿，把话头指向主席台，特别是毛主席，以争取发言权。梁漱溟说：“现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我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说了我那么多，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毛主席这

时插话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漱溟紧接着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毛主席说：“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梁漱溟说这一点倒无关重要。毛主席生气地说：“无关重要？如果你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有关重要，等到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名你当政协委员。至于你的那些思想观点，那肯定是不对头的。”梁漱溟毫不放松地说：“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尊敬。”毛主席说：“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实行哪一条？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梁漱溟还坚持说：“我是说主席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

会场上发生这种前所未有的与毛主席顶撞，你一句、我一句的场面，会开不下去了。不少到会者呼喊：“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

但梁漱溟坚持不下讲台。他望着主席台，要听主席台的意见，特别是毛主席的意见。主席台无人表示要梁漱溟下台。毛主席口气缓和地说：“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给你10分钟，讲一讲要点好不好？”梁漱溟答：“我有很多事实要讲，10分钟怎么够？我希望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于是会场再一次哗然。许多人接连发言，对梁漱溟的态

度表示愤慨！

毛主席又说：“不给他充分的说话时间，他说是不公平；让他充分说吧，他就可以讲几个钟头，而他的问题又不是几个钟头，也不是几天，甚至不是几个月可以搞清楚的。而特别是在场的许多人都不愿意听他再讲下去。我也觉得，他的问题可移交给政协全国委员会辩论、处理。我想指出的是，梁漱溟的问题并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他这个人没有别的好处和功劳，就有这个作用。因此我主张他继续当政协委员，现在我又提议让他再讲10分钟，简单地讲一讲，好不好，梁先生？”

梁漱溟依然回答：“我有许多事实要讲，10分钟不够，希望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会场又出现高潮，僵局无法结束。

毛主席最后说：“你这个人啊，就是只听自己的，不听大家的。不让你讲长话，你说我没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让你讲，难道说大家都没有‘雅量’吗？你又说不给你充分的时间讲话是不公平的，可现在大家又都不赞成也不想听你讲话。那么什么是公平呢？在此时此地，公平就是不让你在今天这个政协委员会上讲话，而让你在另外的会上讲话。梁先生，你看怎么办？”

“听主席决定。”梁漱溟回答得很干脆。

但会场上再度一片喧闹、愤慨。

有位高明的人提出，请主席付诸表决，看让梁漱溟讲话的人多，还是不让他讲话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

表决时，毛主席等少数人是举手赞同梁漱溟讲话的，但

大多数举手反对。于是梁漱溟被轰下了台，一场僵局宣告结束。

梁漱溟在事过不久，便给主持全国政协工作的陈叔通副主席和李维汉秘书长写信，要求请长假，闭门思过。李维汉同志派人告他，今后需要出席的会议和活动，通知照发，不参加自便。但他自此居家读书学习，什么地方都没有去。大概过去一两个月的光景，金日成来访，设国宴招待，他接到请柬，也没有出席。

梁漱溟先生自1953年9月以后，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并没有受到任何正式的处分，以至连一顶在四年后（1957年）有几十万人被戴上的“右派”政治帽子，他也因为闭门思过，一言不发，而没有摊上。但是，他同毛泽东主席本人长达几十年的交往，却就此结束。

1988年

对梁漱溟受到毛主席 批判一事的补正

陈 鸣

关于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梁先生受到毛泽东主席批判的这桩公案，上海《文汇月刊》1988年第一期发表了戴晴、郑直淑的文章《梁漱溟与毛泽东》，有所记述。根据梁先生过去同我所谈和他提供的资料，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我愿在此作以下一些引述，作为对戴、郑文章的一个补正：

一、梁先生说，1953年9月9日上午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分小组讨论，“我参加的小组召集人为章伯钧、曾昭伦等三人，我首先发言表示：过渡时期总路线全本于开国时的共同纲领而来，当然拥护，不成问题。但为要广大人民参预推行，我看到《人民日报》读者通讯栏常有读者来信，指出某处某事有某些问题，即由报社转给该主管部门或单位，注意检查、解决、处理，这样办，增进人民和政府部门之间气脉相通，非常之好，宜于大力推广。

“午后续前开会，由周恩来总理主持，他询问各小组讨论情况如何，请大家发言。这时，我同张治中、侯德榜同坐在一条长沙发上，离主席台甚近。我即立起发言：‘不如由各组召集人报告各小组讨论情况，无须每个人都来说，当然个人也可有所补充。’会议主席点头说好。于是，章伯钧即立起报告，其中提到我的发言。到散会时，周公下主席台经过我面前，向我说：明天还是请你说一说，好吗？我表示接受嘱咐。

“9月10日午后续前开会，发言者踊跃，我想改用书面发言。散会时，总理走经我面前说：会期将延长一天，明天你可有时间发言。回家后，我就简略起草一底稿备用。”

二、梁先生说，“9月11日下午续开前会，我首先发言，大意是：为总路线很好地见诸实施，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工矿企业有工会组织，就可由工会来发动；工商业者有工商联的组织，就可由工商联来发动。独农民方面，似乎还缺乏组织领导。因为土地改革后，农民各家拥有土地，单干者居多，成立互助组者较少。再则城市工人工资高，例如建筑工程的徒手小工，每天1元或1.2元，大为农民所垂涎，纷纷拥向城市。在北京市，现时就天天见到农民跑进城来，而当局又把他们推送出去的情况。上海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上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

三、梁先生说，9月12日午后在中南海怀仁堂大会场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议，政协委员列席。会上由彭德怀司令员作抗美援朝的总结报告。“当日议程只列这一项，报告虽长，但散会又嫌早，于是有人起立请毛主席讲几句话。他似

乎原无准备，即席讲话其中说到有人反对我们的总路线，替农民叫苦，这大概是个孔孟之徒吧！孔孟要行仁政，但须知有大仁政，有小仁政。过去在延安，也曾有人为农民说话，希望减轻农民负担。那时节，抗日是大仁政，恤农是小仁政；今天抗美是大仁政，恤农是小仁政。不要因小失大，云云。还说，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是工农联盟，工人农民在根本上利益是一致的，这个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毛主席讲话中没有点出我名，却显然对我而发。”梁先生说，“散会回家，我闷闷不乐，不能成寐。于是中夜起床写信给毛主席，申明我拥护总路线而非反对总路线，希望给个机会，容我当面复述我的发言经过，即可明白。”

四、梁先生说，9月13日是星期天，不开会而有娱乐晚会，在怀仁堂演剧。“当晚有车来接我，直送到怀仁堂东厅，见毛主席、周总理同在，我开口就说：

‘我没有反对总路线！’

毛主席颜色不悦，说：

‘你是反对总路线！’

‘我绝没有反对总路线！’我再申说一句。

‘你是反对我们的总路线！’毛主席也再说一句。

正彼此相持而难以申辩时，梅兰芳的《抗金兵》即将上演，专候主席入座，左右促请，我只好不说下去了。我随同入座而无心看戏，一会儿就退出回家，寻思另找陈白机会。”

五、梁先生说，9月16日午后继续开会，“我即上台发

言，内容分三部分，一是复述我在9日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大意；二是复述我在11日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大意；三是提出，在农民普遍缺少组织领导的情况下，我的旧作《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可作为一个参考方案，希望另有机会，容我陈述。”

六、梁先生说，9月17日午后续开大会，“我一入席，看见面前陈列的文件中，有我在1944年春发表于重庆《大公报》的对两大党和谈问题的两篇文章中的一篇（对中共阻止再用兵），而我对国民党要求交出政权的一篇则付之缺如。我当下明白今天的会，是批判我的会了。先由×××发言批判我，继由×××追述旧事说我一贯反动，长篇大论，内容不免牵强。我起立请求发言，主席台上宣布许我明天发言，会期延长一天。”

“会后回家，自觉我没有反对总路线的事实具在，怎能加我反对总路线的罪名？用高压手段对付我，岂能甘服！我必须顶回去。于是，我闭门谢客，起草明天发言底稿备用。”

七、梁先生说，9月18日午后开会，“我登台发言，首先说：我自始没有反对当前的总路线，而毛主席却诬说我反对，我今天要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把他的的话收回去。当下毛主席厉声说：

‘告诉你，我就是没有这个雅量！’会场众人震动。

“我发言不数语，不少到会者哄然起立，阻止我再说下去，其势汹汹，我只好下台，中止发言。

“归座后，自己忽然清醒，平静从容。”

梁先生说：当时陈铭枢先生上台，问毛主席：梁漱溟的

问题，是思想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毛主席回答说：现在看是思想问题。陈铭枢说：是思想问题，我就准备说说；如果是政治问题，我就不说了。于是，陈铭枢、××、×××、×××、×××等六人相继发言，对我批评。这期间，毛主席有时插话。一次说：人家说你是好人，我看你是伪君子。一次说：你虽不是以刀杀人，然而你能以笔杀人。末一次说：对于你，非但不开除你这次的政协委员，而且下届政协仍然要有你，为什么，因为你能迷惑一部分人，还有少数群众盲信你。”

“在毛主席末一次说话之前，对我的问题曾进行群众举手表决，把我的问题交付政协全国委员会讨论处理，然后散会。”

以上，是梁先生1976年根据旧年日记和记忆所及而整理的一个补述，他向我口述时在1980年8月。其内容与上述戴、郑文章有同有异，却更能真实反映他当年受批判时的思想和态度。当然，事隔30多年后，他对此事的认识比之当年更为冷静和超脱，并以宽容豁达的风度来追叙往事，这就是上引各节与戴、郑文章的异同并互为补充的所在了。

（摘自陈鸣《关于梁漱溟先生》一文，题目是编者加的）

梁漱溟与毛泽东1953年历史公案补遗

汪东林

拙作《梁漱溟与毛泽东》在1988年第一期《文汇月刊》发表后，反响热烈。有读者来信询问，从文中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实际场合里，似乎是一边倒地批判梁漱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梁漱溟说一句公道话或对毛泽东的做法提出疑问，难道在一二百之众的高层人物中硬是没有一个头脑清醒者？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这个问题提得好，这正是《梁漱溟与毛泽东》一文的不足之处。笔者在这里根据事实，略作补遗。

在当时的情况下，鉴于毛泽东的威望和权位，是很难有人公开站在梁一边，或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说公道话的。不过，即使在这场历史公案的进程中充满浓烈的火药味，一直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头脑清醒者仍不乏其人。大致上可分两类：一类是以批判的形式给梁漱溟指“出路”或以提问题的形式为梁同时也为毛摆脱困境；一类是在批判大会上沉默不语，而在会后给毛泽东上书，为梁漱溟的行为作解释，以求取得毛的谅解。第一类的代表者是何香凝和陈铭枢，第二

类的代表者是李济深和张澜。这四位先生的特点一是在民主人士中德高望重，二是他们都是梁漱溟多年的朋友，对梁的思想、为人有较多的了解，并且都在一定程度上敢于直言。

在批判梁漱溟十分激烈，已经把梁说得一无是处的时候，何香凝先生在会上说，今天听了关于梁漱溟先生那么多的问题，我觉得很诧异。10年前，当我同梁先生在广西昭平、八步做抗日、反蒋工作期间，我对他是敬重的。但自1949年初我在香港看过他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我就开始失去对他的敬重。梁先生，你也知道，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祸国。当时你在报上公开发表那种言论（按：指梁漱溟发表在《大公报》的《敬告共产党》、《敬告国民党》等文），是有不良影响的。这一次你的问题也十分严重。我认为你今后要闭门改过，来补救你的前途。不然你的前途就会十分暗淡。

就在何香凝讲话之前，毛泽东已经在气头上说过，梁漱溟这个人，一生对国家、民族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其他人在会上的即席批判发言，都已把梁漱溟归入“反动分子”一类。因此尽管何香凝的发言也在批判梁的错误，但口气之缓和，特别是发言中肯定了梁曾对国家民族做过好事，这是与当时的会议气氛很不协调的。

梁漱溟先生几十年后在回顾这段历史公案时曾经这样说：“何香凝先生的发言在当时和事后，有三点引起我的注意。第一，在那种场合，她是唯一在发言中明确肯定了我过去是反蒋抗日的。也就是说，我并不是一生中对国家民族没有做过一件好事的人。何先生说的是事实。那时候，因日寇进攻广西，桂林失守，我们退到贺县八步，我在那里主持民主同盟的发展工作，有许多反蒋抗日的朋友在那里，何先生

是大家所敬重的一位。我同她时常见面，对时局的看法亦很相近。第二，她语气缓和，发言中左一个梁先生，右一个梁先生。这在当时，发言者除毛主席等少数人还时有对我这样称呼外，大多数人都对我直呼其名。第三，她提醒我要闭门改过，补救前途。这是使我醒悟自己不该与毛泽东顶撞的最早的规劝之言。”

另一位是陈铭枢。他在国民党时代担任过军政要职，长时期反蒋，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他因为笃信儒学，在20年代就慕名与梁漱溟结识，深知梁的思想和为人。他面对疾风暴雨般批判梁漱溟的现实，不知从何说起。在气氛十分紧张的时刻，他站立起来向毛泽东主席请教。他说：“现在看来，梁漱溟的问题是很严重了。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不明确，要请示主席。那就是：梁漱溟的错误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如果是政治问题，那就是革命与反革命之分，应该用别的办法解决，而不必在此多费唇舌；如果是思想问题，那就可以另当别论，采取耐心的教育、批判的办法，使他逐渐醒悟，而不必操之过急。如何？请主席指示。”陈铭枢的发问，使热闹非凡的会场刹那间一片寂静。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主席台，目视着毛泽东主席。毛泽东略加沉思后从容地说：“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公开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和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因此我仍提出保留他当政协委员的资格。对于他的反动思想，不充分揭露不行，不严厉批判也不行。”

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前后10天的批判梁漱溟的活动

中，李济深和张澜两位先生一直坐在主席台上，始终保持沉默。应该指出的有两点：第一，李、张两先生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时一位是民革中央主席，一位是民盟中央主席，地位和影响超过何香凝和陈铭枢；第二，张澜先生是从头到尾没有说话，但李济深先生在会议没有转入批梁之前，即9月11日梁漱溟在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上发言时，曾简单表示过梁漱溟提出的农民问题值得注意，实际上已表示了态度。后来会议转入批梁，李不再说话。

至于李济深、张澜二先生与梁漱溟在历史上的交往，也有必要作简要的补述。

李济深与梁漱溟相交在青年时代。1922年梁漱溟29岁时，决定抛弃出世思想，即由挚友伍庸伯（观淇）介绍其妻妹黄靖贤与梁漱溟婚配。在这之前好几年，伍先生常在北京西什库冯竹贤家讲授《大学》，梁是经常听讲者之一，并由伍先生引见同另一位听讲者李济深（任潮）相识，自此后李、梁交往甚密。1920年底，经伍庸伯推荐，李任潮离开任职的北洋政府陆军部，到广州任粤军第一师副师长，后追随孙中山先生，逐渐在广东发迹。1927年李济深成为广东省的铁腕人物后，把梁漱溟请到广东省办“乡治”讲习所，这是梁漱溟后来在河南、山东搞“乡村建设”运动的开端。李、梁由此的交往和友情进了一步。20年后，他们又各自走过曲折道路，相聚于北京。

张澜和梁漱溟都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的创始人之一。张澜一直是民盟中央主席，梁漱溟是中央常务委员，并在1947年兼任民盟中央秘书长。张澜对梁漱溟的思想和为人，深有所了解。

在1953年9月下旬毛泽东严厉批判梁漱溟之后，李任潮为老友의困境和前途忧心忡忡。他既不能在那种气氛白热化的场合说话，也不能事后去劝说梁漱溟几句而解决这个难题。他深知张澜先生与梁漱溟的关系，又见着张也同他一样始终在会上一言不发。他决意登门找张表老（张澜字表方）面商，共议良策，帮老友梁漱溟一把。

心有灵犀一点通。李任潮刚刚在张表方的会客厅落座，张表老就捋着美须迎上前笑着说：“任潮兄是为梁先生的事而来的吧。”李赶忙起身握住张的手，连声说：“对，对，我们想到一块去了。”

两位老人都认为，梁漱溟个性太硬，顶撞得毛泽东主席下不了台，铸成大错，因而招来了这场灾祸。怎么办？自然要劝说梁漱溟作检讨，但他们又担心梁很难作象样的自我批评，而梁的问题又确实不是一般检讨能奏效的。他们认为里边有误会的成份，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对梁漱溟的个性和为人，了解有限。因而他们商定，联合给毛泽东写信，首先批评梁漱溟的傲慢，然后以老友的身份介绍梁漱溟的性格和为人，希望毛主席能看到梁这个人独特的坦率、耿直的一面，宽容梁漱溟的过错。李、张当场写出这封短信，并提出如果主席有闲，还可以约他们面谈、细说。两位老人三言两语完成这桩事，彼此都松了一口气，了却了一件心事。

但李任潮与张表方始终没有接到毛泽东的回音。不久他们曾几次因别的事见到毛泽东主席，但毛没有向他们提及此事。几个月后，二者看见梁漱溟恢复参加各种活动，也没有听说梁漱溟受到什么处分，便逐渐放心，而没有再向毛泽东主席提这件事。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的 梁漱溟先生

汪东林

梁漱溟先生在1953年受到毛主席的批判之后，一直在家闭门思过，潜心读书，很少参加会议和活动。他虽然受到极为严厉的批判，但并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既没有正式戴什么政治帽子，还继续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参加政协活动，其结果出于他的意外，也使他感到欣慰。

但是，更使他意外和欣慰的，是自1953年之后，国家大局稳定统一，经济发展十分迅速，新鲜事物不断涌现。他深感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之得法，中国老百姓潜在多年而始终未得到发挥的力量被充分发挥出来了。相比之下，个人的得失是非又算得了什么。

梁漱溟特别赞赏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

特别使梁漱溟先生惊喜的是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他认真阅读和学习了中共八大的重要讲话和文件。最使他感兴趣的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的两段话。由于梁漱溟先生在1964、1965年再度受到批判的事情，其实质与这两段话关系密切，请允许笔者将它摘抄如下，供读者参阅。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

“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基本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就使我国出现了一种完全新的社会面貌。在旧中国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的矛盾，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而解决了。在解决了这种矛盾以后，我国除了对外还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外，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

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

梁漱溟先生何以特别赞赏中共这两段结论性的政治断语呢？这在他自己，是有着很长久的历史背景和很深刻的思想原因的。

梁漱溟在解放后两年来的思想转变

梁漱溟先生自早年参加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而后进北京大学任教，潜心研究儒学，进而走出书斋，搞乡村建设，直至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奔走和平出力，始终从强烈的爱国思想出发，渴望有朝一日中国能实现稳定、统一，发展经济建设，摆脱大大落后于世界先进行列的局面，走上繁荣昌盛的道路。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这一梦寐以求的最终目标始终落了空。另一方面，从哲学思想到现实政治，由于他自身走过的历史道路和独特的个性，他又是多年来一直只承认中国存在阶级分化现象，但根本否认阶级斗争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因此他在旧中国时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愧为爱国爱民的好汉子，但要在中国走阶级斗争的路子解决中国的前途问题却行不通。因为这，在1938年初，梁漱溟先生只身赴延安，与毛泽东主席作连续的彻夜长谈时，尽管彼此间关于抗日问题谈得投机，他十分钦佩毛泽东在抗日前途方面的远见卓识，但一谈到中国的前途与阶级斗争问题时，他们

便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在天已大亮而争论仍然相持不下时，毛泽东坦然而风趣地对梁漱溟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以先不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梁漱溟对毛泽东的这种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半个世纪后依然记忆犹新。

1949年10月，新中国在人民革命隆隆的炮声中诞生。铁一般的事实为10余年前梁漱溟与毛泽东关于中国前途的争论，作出了结论。

1950年春天，梁漱溟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召，由重庆来到北京。他面对在战火中诞生了新中国的事实，细细回顾一赴延安时与毛泽东的那次争论，在毛泽东主席多次找他到中南海长谈，并安排他去各地作了一番考察之后，梁漱溟于1951年写了一篇题为《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的长文发表于报端。

梁漱溟先生在文章中说：

“所谓三年来（自1949年始）的事实给我教训最大者，即是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三年来整个中国有了很大转变，不但是面貌一新，气象不同，而且几乎每个角落的人，彼此互相影响着，从内心亦都起了变化。就我个人来说，亦许旁人看来变化不大，其实在我自己是‘打破纪录’了。因我平素比较肯用心，对于什么问题自有见解主张，而我的行事必本于自己之所知所信，不苟同于人，积几十年如此。所以说到思想转变这句话，在我谈何容易！更简捷地来说，我过去虽对于共产党的朋友有好感，乃至在政治上行动有配

合；但在思想见解上却一直有很大距离。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我还是自信我的对。等到最近亲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夙昔我的见解多已站不住，乃始生极大惭愧心，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然中共之所以对。现在那个距离实大大缩短了，且尚在缩短中。”

这就是说，梁漱溟先生在全国解放之初，已经开始认识自己多年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但对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在解放后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运用发展，梁先生当然是认识模糊，甚至是茫然无知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三大改造等等，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似乎一个也少不得，当仍属于阶级斗争学说的范围之列。但往后呢，是不是还要一个阶级斗争接着一个阶级斗争地搞下去？梁漱溟先生搞不清楚。不过在他的思想愿望上，是但愿不要一个接着一个，与其多，不如少；与其有，不如无。他自己早年曾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有所涉猎，还撰写过一本《社会主义粹言》的小册子，但后来不信仰了。解放后，他认真补读了不少经典著作和文章，据他自己一知半解的推论，搞建设，搞科研，发展生产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最繁重的任务，而发展生产总不会也归属阶级斗争之列吧？他还有一种模糊的认识，觉得由社会主义一步步向共产主义前进，阶级斗争的学说怕不一定适用，它应该是一步步减弱，而不是一天比一天激烈。但梁漱溟的这些认识，自然没有实践的基础，也缺乏理论依据，因此只是在他头脑里时隐时现而已，从来没有公开讲过，他个人没有能力说清楚这样的大问题。

所以梁漱溟先生读了中共八大这个《决议》，如茅塞顿开，由衷地佩服领导党的高明和远见。他甚至拍手叫好，

说：“这个结论实在太妙了，简直好得不能再好了！”

1957年大鸣大放时梁漱溟一言未发

梁漱溟先生自然也欣赏中共八大召开这一年掀起的向科学进军和经济建设高潮。使他感到意外的是，1957年伊始，接踵而来的却是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大鸣大放大字报，热闹非凡，提什么意见，说什么话的都有。

但是，大多数的意见，是批评领导党的作风和政府的弊病，直接关系到发展经济建设的建议却不多。梁漱溟注意到这一情况，加之1953年的事记忆犹新，他决定自己不参加鸣放会，不发表意见。有的老朋友上门了，劝他也不妨说几句话；好几位新闻记者找他采访，要求他谈谈感想，一吐为快。他统统婉言谢绝，他决心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和局外人。

但是，梁漱溟在大鸣大放中一言不发，并不是预料到后头还跟着一个反右派运动，他没有这么高明。当反右派的雷声一响，许多人遭到批判，诸如他的老朋友陈铭枢、章伯钧等竟成了大右派时，梁漱溟也是十分震惊的。当然，他本人一句现行的言论也没有，“右派”的帽子便没有他的份。

使梁漱溟疑惑不解的是这场“反右派”斗争，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场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那么，不到一年前中共在自己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的那个《决议》，还算不算数呢？作为一个政党，要改变自己的如此重大的有着历史转折意义的决策，还要不要通过自己同一职权的代表大会？梁漱溟想着这些，百思不得其解，却又不便向人讨教，只好闷在肚子里。

梁漱溟先生带着这个大问号，细细学习毛泽东主席反右派斗争后重新整理发表的重要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作中有一段结论性的话，就是：

“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斗争——向自然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写《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一文招来了批判

梁漱溟先生端坐在书斋里，拿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这段结论与中共八大《决议》的结论细细比较、分析，认为“变化”是有的，但似乎还看不出有根本性的变化。不是有“基本结束”这个词吗？不是还有“向自然开战”吗？这就是说，虽然反右派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但毕竟是局部的，暂时的；而向自然开战——发展经济和文化，则是持久的，主要的。梁漱溟在茫然失措中得到了某些慰藉。

鉴于此，当1958年秋掀起大跃进、人民公社热潮的时候，尽管梁漱溟先生同许多人一样在思想上、行动上处处跟不上，但一开始都认为，这正是建设高潮到来的一种表现。因此在1959年建国10周年之际，他着手写作题为《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副题为《试说明建国10年一切建设

突飞猛进之由来》)的长文,于1961年完成,全文约7万字。他写这篇文章的理论依据,一是中共八大的《决议》,二是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矛盾论》、《实践论》。梁漱溟在这篇长文中一再发挥的论点,在1964年底的一次重要会议上申述时,招来了一场批判。

1962年毛泽东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长期存在的一系列论断传达之后,特别是城市的“新三反”和农村的“四清”运动真的搞起来以后,梁漱溟愕然了。难道中共真的要放弃八大《决议》作出的那个结论了吗?这可是事关国家、民族和历史发展进程的大事呵!

多年来,梁漱溟先生一直是不轻易赞同别人而一旦赞同又不肯轻易改变的人。他的固执已见在旁人看来常常近乎顽固,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

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有个直属学习组,由建国初期的学习座谈会演变而来。到了60年代初,分东城、西城两个分组。委员们自愿报名参加学习,每周都有一二次学习会,要来就来,不来亦可告假,颇有“神仙会”的味道。梁漱溟先生是早就报了名,但很少到会,因他正埋头于写作那篇7万字的大文章。他听说马寅初先生在东城学习组高谈阔论,洋洋万言,内容引人关注,也没有时间去聆听,时为1961年前后。到了1962年底、1963年初,由于北戴河会议劲风猛吹,梁漱溟决定去参加学习会,主要任务是多听少说,尽量搞清发生突变的根本原因和来龙去脉。其间还组织去山西、河北农村参观“四清”,察看现实生活中的阶级斗争。但梁漱溟收效甚微,他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他保持沉默,很少说话。

梁漱溟不赞同用阶级斗争一个大道理来说明一切的立论

1964年底，梁漱溟出席政协四届一次会议，列席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周恩来在人大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若干年来政府工作的成绩和经验。在政协会议的分组讨论会上，许多人的发言都十分肯定地说，政府工作报告从头至尾贯穿着一条阶级斗争的红线，所以报告才好得很，并推而广之地立论，认为建国15年来各项成就之取得，主要原因也是由于抓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等。梁漱溟心里不赞同这种用阶级斗争一个大道理来说明一切的立论。他想起了中共八大的《决议》，也想起自己那篇为建国10周年而写的长文。但他觉得，在人大、政协这样庄重的会议上，与别人发生冲突，进行争论是不适宜的。而且，他也没有把握否认阶级斗争至今还发生作用的事实。他因此决定，正面阐述自己的心得体会，各抒己见，总不妨吧。

于是，他在分组讨论会上作了一篇不长的发言，整理成文字不过四五千字。其要点有：

“周总理的长篇报告论述到国内国外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据我领会，则自首至尾贯穿着两个大道理。

第一个大道理是：我们要认识必然以争取主动的道理。所谓必然何所指？即一切客观规律是也！认识此必然性的客观规律，我们就能因之用之以制胜于客观事物，这便能取得主动权了。人原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但不循由乎必然规律盲目而动，便要碰钉子，要失败，落于被动而没有主动可言，亦没有自由而言。反之，果能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地总结经验，认识其客观规律而掌握之，行动之，则工作成就可观，今后亦

能顺利前进。我认为周总理报告第3页、20页、22页、23页都说到这个意思。回顾建国15年来走过的路，事实也是这样。

第二个大道理是：要信赖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完成任何艰巨任务。

这前后两个大道理是彼此配合，不可分割的。前者重在客观事物规律的认识与掌握；后者重在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表现。前者可以说是科学之事，后者不妨说为道德之事。两者缺一不可，而且在事实上也往往结合在一起的，请看大庆油田的惊人成功，不是眼前最好的具体事例吗？

“周总理的报告还引用了毛主席的话：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我上面所举事例还是奇迹之小者，奇迹之大者就是建国15年来以从未有过的统一、稳定、繁荣震动了世界的中国。大奇迹也好，小奇迹也好，寻其所以出现，总不外乎‘科学之事’、‘道德之事’这两个道理。我们运用这两个道理就可以说明它、解释它。两个道理都要紧，但后者尤其重要，因为人是最主要的，一切都依靠人。这一点要往深处说，那就是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往往是潜在的，有待于领导去启发、培养和运用。在中国现代史上，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从来没有象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样得到大发挥、大表现。显然中国六七亿人如果没有共产党毛主席，恐怕今天也还是一盘散沙、瘫痪无力的，出现不了什么奇迹。为什么唯独共产党毛主席能领导，而旁人不行？为什么我说的这两个道理独被共产党所掌握发挥？这无疑共产党毛主席所本的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因此

这两个道理又是同无产阶级的思想、精神分不开的。我试申言其理（略）。

“归结起来一句话：共产党、毛主席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致力于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民族之前途，自然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其力量无可争议是当然的。与此同时，在革命进程中，中共从建党、建军而建国，40多年间不断总结经验，掌握了种种客观规律，时时操有主动权在手，其势如破竹也是当然的。伟大奇迹之出现，我以为以此两大道理解释之，说明之，似乎更切题，更有说服力。个人体会是否得当，请指正。”

对毫不切题的批判，梁漱溟不予理睬

梁漱溟先生的这篇发言，立即引起旁人的指责。有的问，为什么大家都肯定阶级斗争的作用，而梁某人对阶级斗争只字不提，却侈谈什么两个大道理，是何居心？更有的进一步上纲，说梁某人一贯否定阶级斗争，什么两个大道理，不过是以自己那一套反动唯心论来曲解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样做的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由于这只是一个人数不多的分组范围的讨论，梁漱溟觉着旁人所责与自己所讲的毫不切题，便听之任之，不予理睬。

不料在事隔几天后临近政协大会闭幕的那一天，梁漱溟在大会会场的座位上发现有一篇专门指责他小组发言的大会书面发言。这篇书面发言重复分组会上的指责，并进一步发挥，说梁某人不仅否定阶级斗争，而且曲解群众运动，否定党的阶级路线，而且推断“从梁漱溟的反动立场、观点，可以看出反映在旧知识分子当中的阶级斗争的尖锐性、严重

性”，等等。梁漱溟感到不满意的不是这篇书面发言批判他的调子有多高，而是大会并没有同时印发他在分组会上的发言。这样，实际上出席大会的近千名政协委员，就只能听这篇书面发言的一面之辞。梁漱溟想起而抗争，但没有立即发作。更不料在这次会议进行期间，大会执行主席竟在讲话中专门指出这篇书面发言值得一看，而只字未提梁在分组会上实际都讲了些什么。梁漱溟至此已忍耐不住，便立即给大会主席团写了一封信，申辩此大会书面发言对他的小组发言断章取义，胡加歪曲，而大会执行主席又偏听一面之辞，乱加肯定，实不足以服人。他因此要求大会给他答辩的机会，以正视听。梁漱溟把这封短信直接交给了并非是大会执行主席的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

无奈交信时已临近大会散会，而第二天便是大会的闭幕式。梁漱溟深知，不能也不应该因为他一个人的事而延迟大会的闭幕。因此他在给大会主席团的短信中同时提出，如时间来不及，要求今后提供辩论的机会。

在政协大会闭幕会上，周恩来主席说，这次大会是一个团结、民主、革命的大会。他在谈到民主大会时，提到有一位委员来信要求给辩论的机会，可以在大会闭幕后安排，意在充分发扬民主。果然在大会后不久，政协学习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通知梁，说大会主席团已将信件转给学委会，经研究可以在学习会上进行辩论，要梁先作准备。

在政协学习委员会上，梁漱溟做了长达八千字的答辩

从1965年5月至10月间，前后举行辩论几十次，范围是政协直属组全体成员，邀请作大会书面发言的一位代表列

席。但辩论并无结果。使梁漱溟深感失望的是，所有在会上发言的人，都没有针对他的两个大道理本身进行辩论，而是一味离题引申，上纲上线。诸如：批他的所谓“科学之事”，其反动实质是梁指责党没有掌握科学，讥讽三面红旗和各种群众运动都是非“科学之事”；而所谓“道德之事”，是梁妄图以封建道德观代替党的群众路线，其实质是根本否定党的阶级路线。最后上纲到是梁某人挖空心思否定阶级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所有这些，都是梁所讲的两个大道理发言中所不曾有的。当然许多发言中都讲到了“大好形势”如何如何，而“大好形势”的由来，一切成就的取得，大都离不开大抓阶级斗争，甚至还有人说到，在科学实验中也充满着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绝没有离开阶级斗争的“纯科学”云云。梁漱溟对这些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发言，一直洗耳恭听。

不过这次的大辩论，虽然批判的火药味很浓，很使梁漱溟难以接受，但亦有颇使他满意之处，即上级指示，允许他答辩，允许他保留不同意见。梁漱溟因此在1965年8月3日在学习会上作了一篇长达8000字的答辩发言，重申他的基本观点和要求辩论的本意。

笔者在这里摘录梁漱溟答辩发言中几个颇有特色的段落，读者细细读来，即便是在23年后的今天，也会感到颇有发人深思之处。梁漱溟说：

“某某指我‘否定阶级斗争’，指我为‘超阶级的人性论’和‘封建主义的道德观’，指我的‘科学之事’、‘道德之事’，两个道理不对，只有他的‘阶级斗争’一个道理对，最后归结于我的立场、观点反动，历史上如此，至今没

有变。

“某某讲这些所根据的是什么呢？我把自己的发言稿翻了又翻，脑子里想了又想，他诬指我这一切，并不针对我的整篇发言，或者是发言的某一章节、段落，唯一的根据是：我的发言中通篇不提‘阶级斗争’这四个字，说我是有意不提，不提就是否定，就是反对。

“某某不但在政协大会分组会上首先向我发难，而且与另一人联合向大会提出了书面发言，大会执行主席还在大会上指出让大家看看这个发言。某某这样说，某某执行主席这样信，大会群众自然就这样听，我就受到不白之冤。

“我从来没有说过否定阶级斗争，包括解放前，那时我也只是说阶级斗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当然这样认识是错误的，应该批判，但就是这个，也并不否定阶级斗争。至于解放以后，我更有转变，有改造。10多年来，事实很多，先有《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而后有《关于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问题》，《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等文章，有的发表在报端，有的呈毛主席和有关领导审看，都是我思想发生转变的表现。请问，某某一口诬我否定阶级斗争，有何根据？

“说到我在政协会发言的本题，虽然主要部分是论述‘科学之事’与‘道德之事’这两个大道理，没有标出阶级斗争这四字，但其结论是何以这两个道理独被共产党毛主席所掌握、所发挥，而旁人不行？答曰这两个道理是与无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精神分不开的，难道这不就包括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彼此的分歧是：我认为某某的一个道理不够，阶级斗争不足以尽述周总理报告之全文，而我的两个道理才对，才

全，虽然不见阶级斗争四字而实际四字自在其中，说我的发言否定阶级斗争那是曲解了我的本意。

“下面我着重说一说思想认识上的唯心论和政治上（即立场）的反动问题。一共是三句话：一是我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可以肯定没有落于唯心窠臼；二是我不敢保证自己能免于唯心，即思想问题没有解决；三是我有充分的证据说明我在政治上不反动。

“为什么？先说第一点，我的发言只是根据周总理报告的理论阐述（含报告中引用毛主席的话）和所列举的大量事实，谨慎地说出我的体会如是如是，并没有发挥我自己的思想，这唯心主义何来之有？第二点，我何以不敢保证自己能免于唯心？那是因为，一个人觉悟了唯心论不对，机械唯物论亦不对，只有辩证唯物论才是对的，这不难。但要掌握唯物论来判断事物，解决问题，却很难很难。这一次用对了，下一次不一定对，昨天对了，今天不一定对；今天对了，明天不一定准对。假如只会说会讲不会用，那就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是主观主义，也就是唯心了。经验主义亦是唯心。主观上要走辩证唯物论路的人，大抵落于机械唯物者较少，而落于唯心的时候很多。尽管你不想走唯心的路，仍然往往难免于唯心。这就是我不敢保证自己一定免于唯心的缘故，何况我的思想比别人更容易落于唯心呢？落于唯心非我愿；是否果能免于唯心，却无把握，不敢保证。第三点，既然思想上难免于唯心，会不会政治上就落于反动呢？回答是否定的。

“一个人反对唯心主义，而遇事不自觉地落于唯心，那只是一时的认识不清，是思想问题。一个人政治上基本上不

反动而有时不自觉地落于反动，仍然是认识不清的思想范围的问题。只有政治上自觉地反动，才是真反动。据此，我虽不敢保证自己不唯心，却可以保证自己不反动。换句话说，就是我的思想问题可能还没有解决好，但我的政治问题却基本上解决了。我在新中国成立16年后讲这番话，对自己作这个结论，绝非是自我标榜，而是有十分把握的。真不知某某对我左一个反动，右一个反动，甚至是反动透顶，所凭所据何在？如果指的是我的过去，特别是解放以前的某一个阶段，此话还可以说得过去；如果是指我已经觉悟、改造后的今天，却不能不令人怀疑某某是否也是‘难免于唯心’，才这样不看事实，任意捕风捉影，甚至无中生有？”

“决不随声附和，更不见风使舵”

梁漱溟的这一段发言，自以为言之成理。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招来的自然只能是再升一级的批判热潮。梁漱溟凭多年来的经验教训，深知最好的办法还是沉默不语，洗耳静听。无奈“树欲静而风不止”，吹来刮去，老问题又引出了新问题，迫使他不得不开口，而一开口就又增加了新的批判材料。笔者在这里择其最主要之点，记述两件事，供读者一阅。

第一件事，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倾轧和共同向自然开战的问题。

1964年政协曾组织部分委员到山西农村参观“社教”（即“四清”）运动，在座谈观感时，梁漱溟曾在发言中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话，意思是只要人与人之间还存在相互斗争，而没有联合起来共同向自然作斗争时，人类就还没有进

入自由的王国。但并没有联系“社教”运动作更多的发挥。到了转年辩论梁漱溟在政协会上的发言时，有人揭发说，梁某人在山西参观时就讲过阶级斗争是人与人之间的倾轧，要梁漱溟回答，其用心是不是妄图否定和反对阶级斗争。梁漱溟当场答复时重新引用和解释了恩格斯的话，并详细复述了他多年来对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在认识上的演变过程。他在这篇发言的最后，出人意料地端出自己的真实思想。梁漱溟说：

“结合恩格斯的论断，联系中共八大的《决议》，我原以为在我国完成所有制的三大改造、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阶段之后，就不应该把人的力量用在彼此间的斗争上，而应该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调整，同心协力，把矛盾指向大自然，向大自然开战，这才能使人类做大自然的主人，一步步进入自由王国。因此对这几年忽然又大抓阶级斗争的做法，思想认识上就转不过弯来。但我申明，我并非是否定阶级斗争，反对阶级斗争，我只是思想认识上的不理解……”

梁漱溟的这段话，使在座的甚感惊讶，因为时至今日，竟真有如此不识时务而顽固到底的人。同时也使会议的主持人感到满足，因为经过多日的批判、帮助之后，梁漱溟终于吐露了心里话，他实际上承认了自己对大抓阶级斗争是不赞同的。

第二件事，关于惩罚是不是进入共产主义的一项主要办法的问题。

因为当时的“社教”运动，涉及到犯错误（包括犯罪）的干部是以教育为主，还是以惩罚为主的问题，讨论得很热烈。梁漱溟这次是自愿发言的，他把话题扯得很远，还引出

了40多年前的往事。梁漱溟在会上说：

“惩罚是从奴隶社会以来就有、延续了数千年的老办法，现在还要采用，还不能取消，但毕竟是个人得失的东西，一定要超过这个，走教育的路子，把人的思想境界提高一步，才能由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我想把话题扯得远一点，大约在民国9年或10年（1920年或1921年），陈独秀、李大钊在北大提倡社会主义学说。同在北京大学任教，李与我交往颇深，陈也与我较熟。当时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学说兴趣甚浓。讨论中，有人问陈独秀：比如收拾厕所这类又脏又苦的活，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让谁去做？陈回答说，给受罚的人去做。我耳闻此事后不几天，当面向陈询问此事，他亦如是回答。我即对陈说，这不对，惩罚是现在人的观念，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收拾厕所未必就是受罚的工作。我们谁也不能说服谁，实际上那时候谁也说不清楚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今天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现在提倡人人做服务员，干部、学生也要去参加掏粪劳动，这个路子是对的，是以教育为主，而不是以惩罚为主。如此发展下去，应该是人人做自觉的劳动者，而不是单纯的为谋生而工作。人类进入自由王国之日，便是惩罚的手段消亡之时，这又可以归结到恩格斯的那个科学论断上。”

梁漱溟的话万变不离其“宗”，在当时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调门越唱越高的形势下，自然是不合时宜的。其结果只能是引火烧身，没完没了……

20多年的历史弹指间过去。当笔者两年前向梁老先生重提发生在60年代前期这一段“热闹非凡”的经历时，他并不激动，只是缓缓地说：

“都过去了，过去了。这几年曾有人对我说，好像我那时候看问题看得准，经得起时间考验。其实不然。我之学习马列著作和各种文件，并以此改造自己的思想，是大大落后于许多人的。至今我对若干问题，仍然一知半解。如果说我在那时把有的问题看对了，那也决不是因为我的水平高，而只是我自己身上的那股牛劲，即：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决不随声附和，更不见风使舵。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笔者作为梁漱溟先生这段历史的亲眼目睹者，听着这段话，心中的滋味是苦是甜，是酸是辣，一时间难以搞清。

梁漱溟“文革”自述

汪东林

编者按：作者汪东林同志自1962年至1982年期间曾担任梁漱溟先生所在全国政协直属学习小组的秘书，直接保存并搜集了梁漱溟先生的大量言论和史料，并经过多次采访和谈话，写成《梁漱溟问答录》一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梁漱溟“文革”自述》一文系根据该书和作者掌握的其他第一手材料写成，为读来亲切可信，作者采用了“自述”的形式。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比较特殊。除去红卫兵抄家，其他若干次风雨雷电，都是因为我这个人秉性独立思考好讲真话，自己在公开场合（主要是学习会）主动直言而招来的。

1953年我在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上遭到毛泽东主席的极为严厉的批判之后，曾以中国科学院的名义组织若干知名人士对我的思想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批判，这些批判发言还专门印成小册子出版。这之后，我本人怀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感，长时期潜心读书，闭门思过。但我这人真可以说是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吧，对于自己长期以来所索求的人生问题，并没有因为强大的批判压力而丢掉了“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原则，在自己未真正搞通之前，任何问题都不轻易放弃己见，随波逐流。我在客观上应该感谢的是毛泽东主席虽然以言责我重罪，但在生活上却依旧照顾我，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使我能有条件继续自己的研究和探求。使我更加日益高兴的是亲眼看到新中国的稳定统一，经济建设突飞猛进，为百余年来的旧中国所远不可及。尤其是1956年中共“八大”的召开，正式宣布在三大改造完成后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总目标是向大自然开战，发展生产力，这使我越发惊喜，深感百余年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实现世界强国的目标有望。但我怎能想到，一年后就发生了一场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反右派斗争，特别在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即北戴河会议）之后，更加明确地提出了阶级斗争还需要进行几百年的理论，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使我惊诧不已！难道中共自己不经过另一次代表大会就这样轻易地扭转方向，丢弃中共“八大”所确立的路线、方针吗？随着60年代初期逐步开展城乡“四清”运动，我的疑惑日益增加。更由于自己多年来好用心思进行分析、观察，且坚持讲真话，我抑制不住自己，便在1963年至1965年之间，在我每周两次参加的政协直属学习组会议上，特别是在我出席的与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同时召开的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上，我就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是否仍然主宰一切的问题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招来了由上而下的批判，诛我“一贯否定阶级斗争”，“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本性难改”，“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历时一年有余。

时间进入1966年，对我的批判告一段落。我个人依旧每周两次参加政协直属组的学习活动，关注着国家的命运和时局的发展。使我吃惊和困惑的是阶级斗争越演越烈，似乎有一种将会更加大动荡的预感在时时震袭着我的心。时至这一年6月1日报载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我的这种莫名其妙的预感终于突发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一、我在“文革”爆发时的困惑

在6月1日北大聂元梓大字报发表前后，我所在的政协直属学习组，一直在学习讨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和报刊上的大文章。大家都得作表态性的发言，口头上都说拥护、紧跟，无奈这次运动来势很猛，发展迅速，波及面很宽，使得人人心里打鼓，不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会不会危及自身。北京市“三家村”的三个人，大家都认得，有的还是相熟的朋友，何以突然向“三家村”开火，其背景又是什么，谁都处于说不清、道不明的境况。我当时面对这些，其心境是困惑、难过，常常是事前茫然，事来震惊，事后仍百思而不得其解。

大家都表态了，我是一拖再拖，最终也得表态，但我仍拿定主意讲自己的心里话。我在6月7日的政协直属组学习会上发了言，我心情颇为沉重地说：

“我一直是这样的心情，不希望有这种事情（指“三家村”等等）发生，看到这种事，心里很难受。好像是人身上长了毒瘤，早发现，早动手术，固然是好，但究竟是毒瘤，如果没有，岂不更好？如今有了，揪出来了，无论如何是国家的不幸。过去许多事情，我们这些人不接触、不知道。聂

元梓身居其中，与对立面斗争，她当然会对揭发、撤换陆平等感到高兴。而我们事前茫然，听到这种事还来不及拍手称快，心里有的是不好过、困惑。”

我又接着说：

“现在看，不仅仅是邓拓、吴晗、廖沫沙，北京市委的主要负责人（指彭真）都不行，撤换了，还有一些其他重要人物，都在其中。问题的严重性远不是当初或现在我们这些人所能预料。问题的关键是，搞了多年的革命，受到党和人民很高的信任，已经进入党的领导核心的人，还出这种大问题，如何理解？不能不纳闷，想不通。说他们早就是混进来的反革命，还是变质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都不大好自圆其说。报纸上大文章中的一些分析、批判，亦不足以使人释疑。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而不得圆满的回答。昨天看《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中，有几句话似乎还多少解答了我的这个问题。文章说：‘在一般同志身上，都存在着共产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的斗争。放松了斗争，个人主义就会发展起来，就会由小个人主义发展到大个人主义。’我的理解，这个大个人主义，亦可称之为大个人英雄主义。有了个人英雄主义之膨胀、扩展，那就尽管他在很多地方走的是无产阶级道路，在国家、在党政军诸方面，他可能做了许多事，走了好长一段走得对的道路，所以党才信任他，委以重任，但他终究没有免掉个人主义，还发展为大个人主义，于是就自以为是，争强好胜，目中无人，一步步走上了反党的道路。因此即使他有九十九个功，因为有了反党这一过，便不行了。以反党这一大过，抹掉了过去长年来九十九个功。我以为，眼前发生的难以相信的一些人与事，

以此来解释，倒是一个较能自我解脱‘不理解’、‘想不通’的好方法。”

那时候，像我这样对“文革”不理解的实在大有人在。不过当时在政协直属组，多数人仍然不公开讲，处处小心谨慎，多学习，少发言；要说也是照本宣科，免得引出是非。由于我这个人好反思自问，说了这篇与众不同的话，听起来自然大不顺耳。当场学习组里就有人指责我，说什么九十九个功劳；一个大过，完全颠倒了是非！诸如邓拓、陆平等入，已烂了，只有九十九个过，没有功，即使有一点点，也是做些表面的好事欺骗人的。梁某人说这番话，居心何在，为谁张目？这不正是什麼阶级说什麼话，一丘之貉嘛！

然而这一次学习组并没有对我掀起批判热潮。那是因为“文革”的烈火蔓延神速，出人意料，人人都自顾不暇，如履薄冰之感。不久，全国政协机关内部也闹开“革命”了。我们这个学习组很快无人过问，最后红卫兵杀向社会“造反”，把政协的大门都封了，我们学习组的学习也宣告停止。大家各自回家，心惊胆战地等待着这场“文革”风暴降临到自己头上。

二、发生在我家的红卫兵抄家一幕

1966年8月24日那天，忽然有人敲门，问是谁，只敲不答，来势汹汹。这之前，刚听说近日外边风声很紧，红卫兵杀向社会打破“四旧”，触目惊心的事处处有发生。我推开家人，亲自打开大门，一看是许多10多岁的中学红卫兵。我立即说，你们是用来检查“四旧”的，请吧。领头的一脸怨气，大声训斥：什么检查，我们是来造反的！我便在院中站

住，回答说：既然是造反，那就各自为之吧，翻抄什么都行。我心中已认定，这是一帮热情有余而不通情理的小孩子，又手执“上方宝剑”，如果同他们多说，那准是秀才碰上兵——有理说不清。

接着红卫兵们便翻箱倒柜，搜遍院内每个角落。他们把所有书籍，除了几本毛泽东的书和马列经典著作外，其他的书便撕的撕，烧的烧。由于太多，来不及翻看，便又查抄运走。他们还呼口号，罚跪，打人。我的内人比我受的皮肉之苦要大得多。

我家住在北京西城积水潭边上小铜井一号，是一个单独的院落。他们又见我家中有电话，一位领头的立即宣布：

“我们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整个院子我们都占领了！”于是他们便把我家中的日常用具从北房、厢房扔出，同时一伙人把我拉出去游街、批斗。待游毕回来，把我关进南房的一间小屋，在这里我一共住了20多天，前前后后被折腾无数次。

一开始，红卫兵时时对我诟骂，监督我劳动。所谓劳动，不过是打扫卫生，洗厕所，我虽年逾古稀，但身体很好，尚能担任。他们又命令我减低工资！这本是我早在政协学习会上就提出的，自然一口应承，要他们与政协财务科联系，以配合他们的行动。头一个月的工资真的扣了，是发几十元生活费。反正我终年食素，钱少了也不致于饿死。但后来政协财务科又不扣发了。问何以不扣除？答：接上级通知。那么这“上级”又是谁呢？我不便打听，只是心里琢磨，政协、统战部，都已闹得乱哄哄的，负责干部一个个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顾得了我们吗？好在这时的红卫兵早到大江南北去进行“革命大串连”去了，家中已无人监督我

们，于是照常领取工资的全数。一直到1970年政协学习组恢复学习，才听说当时是周总理办公室通知，对诸如我以及杜聿明、宋希濂等人，在生活上不要剋扣他们，不应扣发工资。细想起来，那时候除了周恩来总理，还有谁能来照顾我们呢？

红卫兵们的抄家最使我痛心的是烧了我家三代的藏书、手稿和字画！

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买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从戊戌维新到东西文化论战的各家手札以及其他书籍，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在当时，我心中自然是反对这些作法的。但我却自嘲自解：许多珍本书籍，本来用处不大，一般在国家图书馆都有保存；至于名人古画，我历来反对附庸风雅，不感兴趣，多年都不曾挂出。因此，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我都没有吭声。我甚至还想到，如果真的是这场不可理解的“革命”的需要，把这些古董玩艺儿烧掉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当红卫兵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本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瞪了我一眼，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训斥说，“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用不着这些封建老古董。因为这两部书是布面精装，又很厚，一时烧不着，便挑出来一页页撕着烧……我被罚站在一旁，心中十分难过，心想造我的反，造我祖宗三代的反，我都忍受下来了，为什么这两部普遍的工具书也不放过，使我无法物归原主，铸成终生的遗憾呢？

若干天后，红卫兵们忙别的“造反”任务去了，只命令我不准随便出门，要老老实实在北京交代“罪行”——一生的“罪行”，但写了与否，他们却并不过问。我面对一叠白纸，思潮起伏。该砸的都砸了，该烧的都烧了，该斗的也斗了，只有人还在。我自信墨写的纸可以烧掉，但人的思想是烧不掉的。那么我成天面壁而坐，为什么不能重新提笔呢？于是从1966年9月21日开始，在没有参考书的情况下，凭着记忆，我动手写作《儒佛异同论》，每天写1000多字，全文4万字完成后，又接着写《东方学术概观》……

十分“感谢”红卫兵们这时已心不在此，让我能在这段非常的岁月中在精神上有所依托，而这正是一个知识分子活着的重要支柱。

三、我在1970年讨论“宪法草案”时议论林彪

“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1968年下半年，全国政协机关开始军管，军代表是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派来的，主要任务是领导政协机关的“文革”斗、批、改，兼管全国政协直接发工资的政协委员。第二年，政协机关的干部和职工绝大部分下放到湖北沙洋的“五七”干校去了。当时由政协开工工资的政协委员大致分三种情况：一是蒙冤进了监狱，党内党外的都有；二是年纪较轻、身体较好的随机关干部去了“五七”干校；三是像我这类的，如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溥仪、溥杰等人，身体好的在机关从事体力劳动，有的（如我）则主要在家呆着。

到了1970年下半年，政协的军代表决定恢复政协直属组的学习，人数比“文革”前少了许多，只有10人左右，除上

边提到的外，还有于树德、王芸生、赵朴初、王克俊、程思远等人，他们也不是一开始而是先后参加这小组的，并先后担任了小组的召集人。学习恢复不久，军代表说，中央正准备召开四届全国人大，上边提出一个“宪法草案”，让大家内部学习、讨论，还可以提出修改意见。

但那时林彪、江青肆虐正盛，所谓听取意见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主持的军代表没有当回事，出席会议的诸公本已是惊弓之鸟，谁还敢去惹新的麻烦？因此大家都说：“宪草”好，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红旗，人人都应该认真学习，提不出什么意见。我心里也十分清楚，中国原有的宪法，已被“文革”撕成碎片。这新的“宪草”又有多少意义？只是我这人的老毛病不改，既然征求意见，为什么不能略说一二？

“文革”进行了四年多，又无说话的机会。现在有了，却又不敢说。我决意冒险进言。在阅读了发下来的“宪草”之后，我提出两点意见。

第一点，我说宪法最早产生于欧洲，其最初的出发点之一是为了限制王权。换句话说，宪法的产生就是为了限制个人太大的权力。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无例外地遵守，而不能把任何一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因此，现在这个“宪法草案”序言中，写上三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都上了宪法，我认为不甚妥当。接班人之说，是中国的特殊情况，而宪法的意义是带有普遍性的。不能把特殊性的东西硬往普遍性的东西里边塞。凡我看过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都没有把个人的名字写进去的。但我声明，我不赞同把个人的名字（包括接班人）写进宪法，但并不反对选择某个人当接班人。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别人

没有，我们也可以有。

第二点，新宪法的条文比老宪法少了许多，条文少，不见得就不好，但有的重要内容少了却不甚妥当。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是一回事。国家主席不可不设，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则可以经过法定手续来选。现在的“宪草”没有国家主席这一条，不知为何？

这两条现在看来十分平常的意见，在当时却大有震惊四座的劲头。因为林彪之确定为接班人是一年前中共“九大”写进党纲的，那么现在写进宪法似乎顺理成章。而不同意这样做，则明显有影射攻击之嫌。在我讲完两点意见之后，好一会儿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才好。随后便有人提出，在小组学习中出现这种现行的反动言论，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对此应当场消毒，不准扩散。还有人忧心忡忡地说，这种话要是在外边讲，当场就会被批倒斗臭，砸个稀巴烂的。小组召集人最后说，情况向上反映，听候处理；同时宣布，谁都不许向外扩散，谁扩散责任自负。

这一闹腾，我也深感自己的失言。但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又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呢？我甚至想到，眼下的情势可不比1957年，更不同于1953年，因失言而饱受皮肉之苦，甚至进监狱，是不乏其人的。

不料几天之后，小组召集人在会上宣布了上级的意见，说因为是征求意见，则提什么意见都是可以的；有的人因为思想一贯反动，借机放毒也不足为怪，可不必纠缠。于是我就平平安安地过了这一关。

第二年，林彪叛党叛国，摔死在温都尔汗。四届全国人

大当然没有开成，“宪法”自然也流产了。直至1975年初，才召开四届人大，这已经是五年以后的事情了。

四、我在“文革”结束之初论述“人治法治”涉及毛泽东功过和“文革”是非又招来一场批判

1974年底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我进行将近一年的批判斗争结束之后，我又进入对什么都保持沉默冷观的时期。

1976年的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1月9日早晨，电台广播这一噩耗。这一天上午，正是政协直属小组学习的时间。大家心情都十分沉重。这期间的学习内容，按上边布置，是批判“以三项指示为纲”，虽没有明确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实际运动已经开始。矛头所指，邓小平之上，即周恩来是也。但又不明白点出，大家未经言传又都可意会，此乃“文革”中经常运用的绝妙战法之一。但政协直属组的全体学友们，对此不仅不热衷，且满腹狐疑，忧心忡忡。正传说周总理病重，突然一声霹雳，能不使人震惊吗？而且偏偏发生在这种严重的关头。

经政协直属组召集人于树德、赵朴初、王芸生、王克俊商定，并征求全体组员一致同意，先把规定的学习（即运动）任务放在一边，转入对周总理的悼念。1月9日这天的学习会一开始，大家首先起立默哀，即有不少人失声痛哭。老学友们几乎都是年逾花甲或古稀之人，一生中都无法例外地饱受忧患和磨练，这眼泪怎能轻弹？全因为突然失去多年来的所敬重的周恩来总理之故。头一个发言的是申伯纯，他未曾开言即泣不成声，半个小时的叙述中，竟泪流数次。申老是政协副秘书长，中共老党员，也是当时政协直属组唯一的一名中共人

士。除他之外，都是无党派人士，其中多数人在旧中国属国民党方面，都曾身居要位。申老早年也是国民党西北军杨虎城手下的一员，曾在1936年著名的“西安事变”中出过力。他与周总理的相识交往，即从“西安事变”开始，他断断续续、如诉如泣地回述着往事……

政协直属组对周总理的缅怀活动延续了一两个月的时间，要把全组20余人的发言都写起来，当是一篇颇有史料价值的好文章，只是篇幅恐怕太长了一点。在这里我只介绍两点，以此概括全貌。

第一点，是全组人员都同周总理有过多次数交往和接触，友情、教诲，都非一般。我只是点一点该组主要成员的名字和履历，便可以知道个大概了。如王芸生，国共和谈时他就是《大公报》的总编辑，那时就同周总理有交往；于树德，老同盟会会员，20年代初是国民党中央的执行委员，又是共产党员，“五四”运动之前就在天津与周恩来相熟了；杜聿明、宋希濂，在黄埔时期就是周恩来的学生；程思远，跟随李宗仁先生多年，他最清楚李宗仁先生从海外归来，周总理花了多少心血；还有赵朴初（佛教界知名人士）、王克俊（傅作义行辕的秘书长）、范汉杰（国民党高级将领）、赵君迈（国民党长春市市长，赵恒惕之弟）、董竹君（上海锦江饭店创办人）、郭有守（国民党四川省教育厅厅长、外交官）、杨公庶（杨度之子），等等。他们每个人的发言，都是追思周总理的丰功伟绩的一篇好文章。

第二点，是史良的丈夫、国际法专家陆殿栋先生，他缅怀周总理的发言安排在最后。陆不到70岁，但有高血压。在别人发言的时候，他就常常激动，难过得流泪。轮到他自己

了，刚刚讲了解放之初他到外交部工作，周总理是如何同他亲切谈话时，便突然言语不清，靠在沙发上。医院的救护车很快赶到会场。医生说是情绪过于激动，脑血管破裂。等史良本人闻讯赶到现场时，他已不省人事了。学习会当然只好中止，大家一直在会场里守着他，看着医生进行各种办法的抢救，但始终无效，终于停止了呼吸。

政协直属组缅怀周总理的活动，竟是以另一位悼者的去世而告一段落的。大家的心情更沉重了，谁都觉得事已至此，除了长歌当哭还有什么可说呢？

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病逝。10月，“四人帮”被粉碎，历时10年而的确“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宣告结束。

毛泽东主席是新中国的缔造者，近代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位伟大人物之一。他的去世，人民举国同哀是情理之中。但他晚年的错误，即使在当时，也已十分明显，只是大家不愿说、不敢说而已。林彪、江青之流能如此得志猖狂、肆虐达10年之久，毛泽东自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意愿，采取果断的措施，彻底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乃天理昭昭、四海归心之举！人民载歌载舞，普天同庆，许多七八十岁的老人也如同小孩子一般，兴高采烈地走出家门，加入了群众狂欢的行列。这可是多少年来不曾有过的场面，人们称之为“第二次解放”，当是最确切的比喻了。

我也是这种欢欣鼓舞的心境！但兴许是老于世故吧，脑子里考虑得更多的是中共的路线政策将会发生什么变化？比方说，我最关心的阶级斗争这个老问题，无论是理论，还是实

践，究竟是如同“文革”那样，长期斗争下去呢，还是改变旧道，另谋新路？慢慢儿，我注意到了，“四人帮”抓起来了，新的主席兼总理华国锋上台了，这当然是可庆幸的事。但遗憾的是路线、方针、政策似乎并没有大的变化，在理论上，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实践上，对“文革”没有丝毫的否定，甚至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也照样出现在报刊和街头巷尾的大标语牌上。特别是华国锋上任后所作的大事之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使我更加深了自己的观察，对现实不可过于乐观，中国今后前进的道路依然存在着种种阻力。

《毛选》第五卷的《出版说明》就开门见山地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在反对什么什么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其中包括所谓“反对彭德怀、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说明》还指出，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最伟大的贡献，是“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创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正是在这个指导思想指导下，才编选了诸如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风、批判刘少奇、批判“右派”进攻等一系列的文章。《毛选》第五卷出版的时间是1977年上半年。这桩事告诉我：“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但人们对许多问题的错误认识却不可能很快得到澄清，真所谓积重难返呵！由于我是一个多年来都肯用心思进行独立思考的人，面对这一实际状况，便开始寻求一些重大问题的正确答案了。

1978年2月间，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同时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10多年来不曾开过的盛

会。出席会议的人，大多在会上回顾了“文革”中的遭遇，欢庆迎来了“第二次解放”，但偏偏对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制定新宪法，讨论得不多，研究、推敲得不够。我对此很不以为然，便以实际行动在大会期间的小组会上，提出建国30年来主要是人治和今后则不得不走向法治这一十分严肃的问题。要论述这个问题，自然要涉及到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和毛主席的功过，而在当时，这正是只允许说赞同话，而不允许持不同意见的敏感问题。我的发言立刻在会上遭到批判，而且在大会结束之后，继续组织以政协直属组为中心的原班人马，与我名为辩论，实为批判。批判进行的规模、情况与方法同1965年、1974年那两次相仿，只是时间短，火力弱，犹如强弩之末。因为接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批判会中途草草收场。

我这回发言，一共有四次，第一次在大会期间的小组会上，后三次在政协直属组我所作的答辩及补充，内容有重复，也涉及其他问题，但中心是人治和法治。

1978年2月15日，在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期间，我在小组会上说：“现在我们又有机会讨论宪法，参与制定宪法了，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在旧中国，从民国元年开始，便有过各种临时的、正式的宪法；新中国成立后，有过1954年制定的新宪法。这些历史，我都经历过了。我的经验是，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靠法治。

“回溯宪法的产生，最早起于英国，其来头是为着限制王权。因为王权无限大，一个人主宰一切，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使更多的人治理国家，便有了立宪之举。有了宪法，王

权就受到限制，大家都要共同遵守的是宪法，宪法是最高的权威。

“新中国成立30年，有了自己的宪法，但宪法是否成了最高的权威，人人都遵守呢？从30年中的几个主要时期看，我的话是有根据的。就说最近10年吧，毛主席为了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如果按党章，刘少奇是中共第二把手，必须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才能解决问题；如果按宪法，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必须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解决。毛主席没有这样做，内在的原因据说是刘少奇不是孤家寡人，他在中共党内的上层有不少有力的支持者；他在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中也很有威信。毛主席考虑到首先在党内高层开会就会遇到麻烦，弄不好就会搞成僵局。因此，采取了非常手段，绕了个大弯子，直接从下边开始，把热情有余的娃娃们鼓动起来，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天翻地覆，国无宁日。结果被冲击的就不单是刘少奇，还有许多其他人，中共的、非中共的都有，倒的倒了，死的死了，好大一摊子，而不是常说的‘一小撮’！”

“毛主席的这种搞法，自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宪法也限制不了他的所作所为。我还想过，为什么毛主席能这么做，而且畅通无阻，一呼百应，反对者甚少呢？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毛主席本人是一位功高如山的人物，可以说他缔造了党，缔造了国家，他的权威太大了。毛主席不加限制地发挥了自己的这种权威，于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毛主席也就从人变成了神，成了偶像。第二是中国的历史，上个世纪前自不用说，本世纪以来虽曾有过各种纸上的宪法，但从总体看都没有真正施行过。法统、法制、法治，种种法

的观念从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淡薄。而对于人治，却是多年来所习惯的。

“但我想认真而严肃地指出的是，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恐怕已经走到了尽头。像毛主席这样具有崇高威望的领导人现在没有了，今后也不会很快就有，即使有人想搞人治，困难将会更大；再说经过种种实践，特别是‘文革’10年血的教训，对人治之害有着切身的体验，人们对法治的愿望要求更迫切了。所以今天我们讨论宪法，很必要，很重要，要十二分的认真和细心对待这个大问题。中国由人治渐入了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前途的所在，是任何人所阻挡不了的。”

我的这篇发言，在当时使人震动，立即遭到反对，并在政协大会结束后组织对我进行批判，我奉命每次都出席，由这年3月开到六七月。

这一次对我批判的方式方法依然同过去几次差不多，大家的批判发言并不针对我所讲的事实说话，而是引申我的话头，概括提炼几个问题，十分勉强地上纲上线，狠批我的“态度”和“用心”以及立场如何如何！

比如，说我恶毒攻击毛主席，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对毛主席的功过是非作出评价；说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因为当时上边还是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说我攻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我一贯反对阶级斗争学说，骨子里仇恨“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我诬蔑以“英明领袖华主席”（当时语）为首的党中央，是因为我说了一些当时还没有人说或不许说的话。诸如此类，我对这些，一般

不作答复。

我5月间又补充讲了一些内容相似有关“人治与法治”的话，6月间又开了几次批判会，但他们要说的话还是那些，大家都有点乏味，批判的火力一次比一次减弱。后来天热了，放暑假，大家在家休息。这年秋后恢复学习，没有再提我的事。不多久，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我所肤浅地思考过、议论过的几个问题，这次会议上正式提出讨论，并有了趋向于一致的看法。对我的批判，自然也就不再存在了。

如是，我常常说，真正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而宣告中国历史新时期开始的是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胜利召开！

梁漱溟先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

汪东林

1986年《群言》月刊第二、三期，连载了梁漱溟老先生的一篇长文，题目是《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梁漱溟作为一名对儒家学说研究有素的学者，对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其言其行其人，自有独到的看法。本文只是想从梁漱溟长文篇末的撰写时间说起，援引笔者亲身经历而掌握的资料，将梁漱溟在哄闹一时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的言行，作一简略的回顾。

梁漱溟长文篇末注明：“1974年6月25日改写稿，1974年11月8日立冬撰写完成不发表。”留心的读者会注意到，梁漱溟写作这篇长文的时间，正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别有用心地在中国的土地上掀起“批林批孔”运动的狂风恶浪之时。但读者并不清楚，梁文是出于对当时“批林批孔”运动的不满而悄悄写于书斋，藏于密室，还是在会上公开发表其基本观点，遭到长时间的“批驳”而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并写下这篇长文为证呢？本文将用事实对此作出答复。但由于这桩公案历时一年（1973年11月至1974年11月），所谓“批林批孔

又批梁”的批判会每周三四次，小则一二十人，大则一二百人，梁先生本人的言论也由孔子而林彪，还旁及刘少奇、彭德怀等人，这就使我这篇文章不得不写得稍长一些，请读者们细心阅读，其中不乏发人深省之处。

一、梁漱溟发表长篇讲话之前

1973年10月底，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策划的“批林批孔”的闹剧开场。经历了八年动乱的中国老百姓，再一次被卷进了不明真相的政治闹剧之中。当时刚刚恢复“学习”权利的在京的全国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成员不足二百人，他们也不得不“表态”“拥护”，发各种违心之言，狠批“孔老二”，还生硬地把孔孟之道往林彪的战车上绑。梁漱溟先生是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所在的学习组也就成了重点组。为什么？第一，梁是谁都知道的对孔子和儒家哲学素有研究的学者，用当时的话说，是“一贯尊孔”派。第二，梁这人颇有与众不同，向来是有话便直言无隐而不顾及其他。从当时某些居领导地位的人看，有种估计：一是梁表态支持“批孔”，话不在多，从一个老“尊孔”派变为新“批孔”派，是有“宣传”价值的；二是反对“批孔”，那就拿梁这个老“反面教员”作靶子，也无碍大局。从当时与梁一样参加“批林批孔”学习运动的多数人看，违心之言说多了不是滋味，听多了也感到腻味，便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注视着梁漱溟，但愿他能一如既往地直言而“唱唱反调”，给某些有权势的人增加一点麻烦。这时候忽然传来消息，说江青在首都体育馆鼓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时，还捎带批判梁漱溟，怒斥“梁漱溟何许人也”云云。不几天听录音，贴大字

报，立刻证实了这个消息。于是梁漱溟的举动就更加引人注目了。

但梁漱溟一直保持沉默。他所在的学习组有20余人“表态”了，都表示“拥护”这个运动，唯他始终一言不发，持续了一个多月。但沉默也是一种态度，同样是不允许的。粉碎“四人帮”后，梁先生曾对人说：“那时候，江青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目的另有所图，却又点了我的名，我脑子被弄得稀里糊涂，搞不清是咋回事？我只是认真地读报，听文件，都是同一个调门，同一个‘立论’——那就是对孔子的百分之一百否定，并把林彪的所作所为归罪于孔孟之道。我对这一高超的‘立论’不能苟同，心里一直在摇头。但我认识到这是一场政治运动，既弄不清来龙去脉，还是静观为好。不料保持沉默也不成，逼得我非开口不可，而后引出了一段周折。”在当时的学习会上，当许多人都“表”了“态”而梁漱溟依旧保持沉默的时候，便有人发出警告说：“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里边有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有人在会上指名道姓地说：“前几天北京大学某教授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由一贯尊孔而转变为支持批孔，影响全国，群众欢迎。据悉，某教授‘五四’时代在北大还是一名学生，而梁先生那时已经在北大讲坛上讲授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了。时至今日，如果梁先生也向某教授学习，公开表态支持批孔，影响将会更大，大家都会欢迎你的转变。”梁漱溟听罢直摇头，不禁脱口而出：“×教授的文章我拜读过了。我与他相熟，前不久还碰见他呢。我怀疑他文章所说的是否是他内心要说的真话。”会上马上有人反击，严厉地说：“你有什么根据怀疑

别人？就凭这句话，你对当前的运动持什么态度，已经暴露无遗了。如何端正态度，在你自己。我奉劝梁先生不要再一次作运动的对立面了。”梁漱溟只是笑了一笑，当场没有再说什么。又过了几天，即1973年12月14日，梁漱溟才在学习会上说：

“此时此地我没有好多话可说。这里是政协学习会。‘政’是政治，必须以当前政治为重。‘协’是协商、协调，必须把一些不尽相同的思想、意见求得其协调若一。因为我们都是从四面八方来的人，原不是一回事。怎样求得协和、协调呢？那就是要求同存异。毛主席多次说过，允许保留不同意见。我对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我有话要说，我准备专门写篇文章。但我的文章不能公开，怕有碍于当前的运动。我的苦衷是，我很不同意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而我的亲属、友人都力劝我不要说话，文章不发表，不公开，我无奈答应了他们。眼下我能说的就是这些。”会上马上有人说话：“有话就摆到桌上来说嘛，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怕什么？”梁漱溟退了一步，说：“我的文章太长，要在会上讲，会上占各位许多宝贵时间，还是写完后交给领导参阅更好，不必公开。”主持会的人立即答复：“讲与不讲，由你自己定。但时间长没关系，听听你的高见，我们愿意奉陪。”

退路没有了，梁漱溟答应作准备。

1974年2月22日，梁漱溟先生登台开讲。为什么叫“登台开讲”？有这样一个细节：梁漱溟发言的那天，衣冠整洁，皮包装得鼓鼓，里面是讲稿、参考书、笔记本，一件件摆在会议室的茶几上，站起来发言。由于他已是81岁高龄的

老人，是学习组最年长者之一，主持会的请他坐下讲，他摆摆手，就象在大学课堂里正式开课一样，慢条斯理，有声有色地讲了起来。第二天，消息传开，其他学习组就有人悄悄地说：“梁漱溟开讲了，半天没有讲完。”2月25日，梁漱溟又继续讲了一个半天。

二、梁漱溟长篇发言要点补遗

梁漱溟先生长达两个半天的讲话，总题目是《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由于是即席讲演，许多话乃讲稿提纲上所没有；即使1985年《群言》杂志连载的文章，也未能全部包括。笔者根据当时的纪录本和梁漱溟的手稿，就其结论性的要点作些补充。

梁漱溟在学习会上说：

“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我们，是指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评价孔子，就是今天回过头去看过去，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是好是坏，是大是小，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评量，就是一分为二。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都是不对的，这是毛主席的哲学观点。孔子本人已不会说话，不会申诉，大权操在我们手里，由我们来判断！我们写文章，下判断，就要负责，要多考虑，而不要不负责，考虑太少，因而抬高了他，贬低了他。这与孔子倒无损，与我们则不好，没有尽到责任。

“我现在认识到的孔子，有功和过两个方面。在没有新的认识之前，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表里如一。我的文章，我的观点，确实是对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不同意的。那么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占有着什么样的位置呢？我的看法是，

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他生活在前2500年和后2500年的中间，他本人是承前启后的。中国社会之发展，民族之扩大，历史之悠久，与中国的文化是不可分的。中国的民族是受着自己的文化陶冶、培养着的！中国文化有种种优长之处，这正是中国民族勤劳、善良、智慧、有着强大的凝聚力，以至发展到今天这么大的多民族国家，所不可短缺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世界独有，致使外来的种种文化思想，都要经过消化熔炼，变成中国自己的东西，才能得到发挥，这是世界上若干国家所不及的。我正是先阐述中国的文化，然后点出孔子的位置。这就够了，不必去纠缠枝节问题。

“有人说毛主席一直是批孔反孔的，但我认真读毛主席的著作，他不止一次地说过，要大家加强学习，一方面学习马列主义，一方面要学习中国自己的历史，特别提到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要加以研究和总结，批判地总结，要继承这份遗产。我理解这些话，好像不是片面地批判孔子。毛主席著作中诸如此类的论述不少，所以说不是那么单纯的，我看不能说毛主席一贯批孔反孔，应该说毛主席反孔只是一个方面，还有肯定孔子的一面，就是说孔子的学说，有糟粕，也有精华。

“而今从儒家书籍（主要是“四书”）中引出许多话，看它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影响，特别是不好的影响，如缓和了阶级斗争，耽误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在今天则妨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等。这种分析、批判不无道理，但亦不能简单化，把学术研究和政治问题搅在一起。例如‘民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学术上怎么讲是另外一回事，但从政治影响看总是不好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这话当然与今天不合，要唾弃的。又如中庸之道，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要深入加以研究，这是学问很深的学术问题。现在我们不作学术上的分析研究，只作普通的政治角度的分析，则把中庸之道看成折中、调和，它缓和了阶级斗争，使中国社会迟迟不进步，因此说中庸之道不合适。我理解今天的批判，就是从政治上说话，而并非是学术上的分析、研究。要作学术上的分析、研究，就麻烦了，这也不是今天搞运动的意思。”

正当江青一手制造的“批林批孔”运动闹剧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梁漱溟在学习会上发表了上述针锋相对的观点，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梁漱溟是孔孟之道的卫道士！”“梁漱溟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梁漱溟对抗‘批林批孔’运动罪责难逃！”这是批判梁漱溟大字报的标题，也是大小批判会常用的口号。当然，还得老帐新帐一块算，梁漱溟是长期负债户，他的老帐是算不清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大小批判会形式的“文攻”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这在梁漱溟自己，是早已有思想准备的。至于当时参加批判会的多数人呢？大家心照不宣，这本是一场有领导的“运动”，不免又是人人在小组会上“表态”，并推举代表上大会去作批判发言，大家热闹一番。听的，说的，大家都无可奈何地在这场闹剧中扮演着角色，一会儿是演员，一会儿是观众。相比之下，当观众在台下一坐，当然较安稳些，上台演戏就困难得多，起码总得读一遍满纸违心话的发言吧。正因为这样，所以有些民主党派学习组曾发生你推我、我推你，

谁都不愿意上大会读批梁发言稿，最后只得由领导做工作，指定了发言人。当时所谓批判会的实际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三、梁漱溟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

梁漱溟在作了上述长篇发言之后，得到的第一步反应是由他所在的学习组集中火力对他进行批判。由于“批林批孔”是连在一起的，自然就涉及对待“批林”的态度问题。众口追问，不表态是不成的。一开始，梁漱溟也只是露个头，他说：

“‘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这从字面上我理解。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不过我之批林，有些不同于众人之说，讲出来怕会产生新的麻烦，能暂且容我不说更好。”

用当时的话说，梁漱溟的这段话是“故伎重演”。已经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把话倒出来是难过关的。梁漱溟随后终于在众人追问之下吐出真言，把要说的话断断续续公之于众。主要论点为：一是林彪没有路线，批林就是批他不是人，是个鬼！二是刘少奇、彭德怀有路线，他们有自己的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公开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现将梁漱溟当时的发言要点摘录于后，这是《群言》的长文中所没有的。

梁漱溟说：

“我的批林，与众说不大一样。我认为林彪没有路线，谈不上路线，无路线可言。所谓政治路线，应该有公开拿得出来的主张，如刘少奇的主张就很多，不管怎么错误，但他敢于说出来，公开提出，并自信是对的，这才够得上路线。而林彪的路线又是什么呢？不但我看不出回答不上，恐怕连他自己也说

不上来，因为他公开说的全部是假话，用假话骗取信任，是说假话的第一能手！谁能找出林彪的公开主张呢？我认真找过，没有发现。有是有一点，比如设国家主席、天才论，是他拿出来的，但仍然是个幌子，是假话。他自己想做主席，故意说必须让毛主席当主席。这还是不敢见人、不能见人的黑话。就是‘五七一’工程纪要，也是藏着的事，不敢见人，见不得人，这算什么路线？无路线可言！如果林彪直接对毛主席讲要设国家主席，你不当，我来当，才像一个光明男子！那也还算是一种主张，一种路线。现在这样算什么，能算什么路线？林彪的一套都不是关于中国前途的公开主张，他的一些‘理论’、方法、手段，都不是他的真意所在。他的真意是想自己当主席，而自己又不公开说。林彪是个阴谋家，他没有人格。所以事发后毛主席告诫大家：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在林彪破坏毛主席正确路线这个意义上，我也可以承认在中共党内发生了一场第十次路线斗争。但林彪本身我认为不存在什么路线，够不上路线。一个政治家为国家、民族之前途设想而提出的公开主张，才称得上是路线。路线是公开的，可以见人的！不敢见人的，不是路线！从做人的角度说，光明正大是人，不光明是鬼！林彪就是一个鬼，他够不上做一个人，没有人格，这就是我对林彪最严厉的批判！而刘少奇、彭德怀不是这样。刘少奇的主张很多，都是公开的。彭德怀也有公开信给毛主席，他对党的路线、政策有怀疑，公开提出自己的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但他们都有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而提出的公开主张，是明明白白有路线，够得上路线的。说林彪有什么路

线，那是抬高了。

“我不能说屈心的话，不能象林彪那样，说的一套，做的一套。耍两面派，没有比林彪装得更像。《语录》是他编的，在没有败露之前，似乎马列主义没有人比他学得更好。林彪欺骗了毛主席，毛主席错认了林彪，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林彪叛党叛国，要谋害毛主席，自取灭亡。至于林彪是不是走孔子的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受害于孔子！”

“多年来，我是一直与中共领导党求大同，存小异的。我的思想恐怕要比林彪复杂，不那么简单，但我是公开的、光明的，而林彪则是利欲熏心，专搞阴谋诡计的。我堂堂正正是个人，但林彪身败名裂，不够做人的资格！”

由于上述一系列的言论，对梁漱溟的批判，由一二十人的小组会上升为一二百人的大会，时间持续到1974年底。

四、梁漱溟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自1974年2月20日梁漱溟在小组会上作长篇发言之后，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小组会对他批判的火力十分猛烈。梁漱溟希望这次批判不要拖得太久，于是不几日便检查自己。无奈他思想实际并未搞通，又不想说假话应付过关，结果是越说毛病越多，批判会反而增加了更多的新内容，特别是对待“批林批孔”运动的态度问题，一直闹到白热化的程度。

我仍然采用摘录梁漱溟当时言论的办法，用事实作出答复。

3月8日，即在梁漱溟长篇发言10余天之后，梁漱溟便在会上说：

“最近我竟大胆狂妄地放言高论起来，我原说文章写出后亦不公开拿出来。‘仍不公开’的话说了多次，就怕公开出来不合适。第一怕文章内容上的学术分析研究，远离了当前的政治运动。没料到不拿出来的东西，竟然拿出了其中一部分，很有碍的一部分。自己违背了初心，忘记了自己的政治任务。这错误不怪自己怪谁？又犯了老毛病，个人英雄主义，好胜，逞强。错误是我的错误，罪过是我的罪过，一切我应担当。……”

梁漱溟继续说：“……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会上同人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委员说，不要再称我什么‘梁老’、‘梁先生’……快人快语，痛快人说痛快话。有声有色，会上的气氛才像个样儿。所以上次临散会，他话没讲完，主持会的于老（树德）说下次接着讲，我也即站起来应声说‘下次再讲吧！’我心里此时没有我，只有共同的政治立场和任务，可惜我不能经常这样无我——如果我那样高明，也就不会有今天的错误了。”

3月11日，梁漱溟又在会上说：

“我的长篇发言远离了当前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有碍于当前群众的批孔，错误是严重的。本学习组同人对我的一切斗争都是理所当然；我不应再申说什么。再说话，便是错上加错，我只有静听就是了。”

从三月以后，梁漱溟真的不申说了，但坚持每会必到，洗耳恭听。只是其间在众人追问对待批判林彪的态度时，梁漱溟才讲了本文在第三段摘录的那些话。

不料在9月23日，当这场历时半年多的批判会告一段落时，主持人征问梁漱溟对大家批判他的感想，梁漱溟却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这句话使在座的人哑然，转而是群情激愤，不可抑制。11月18日，梁漱溟曾手书《批孔运动以来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及其经过的事情述略》，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从3月而4月，而5月、6月、7月，大抵均在学习批孔，实际上无非对我的批判斗争，此不细述。先则每周4次会，后减为3次。8月份因天热，又减了一次。在此时期，本小组而外，各学习组均对我进行背靠背批判。预先宣布9月将召开五个学习小组联席批林批孔大会。此会于9月19日、20日、21日连续开会，先后发言者14人，均从批林批孔入手，集中批判我。最后一次大会宣布，月内各组可就大会批判发言自行座谈两次。在本组9月23日会上，召集人曾征问我对几次大会有何感想，我答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梁漱溟的最后答复，震惊了各组同人。当时的主持者勒令梁漱溟作出解释。

梁漱溟解释说：

“我认为，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信仰他，他只是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我只是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什么。别的人可能对我有启发，但也还只是启发我的理性。归根结底，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因为一定要我说话，再三问我，我才说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老话。吐露出来，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在得势的人说的话。‘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

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梁漱溟的这段解释，更使在座的同人哑然、木然。我想，即使在今天也不必多作解释，还是留着原话，作为一段历史的见证吧！

梁漱溟——中国最后的儒家

秦 时 月

被美国学者艾恺誉为“中国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先生逝世距今已有三年。在这位年高德劭的老人漫长生命的最后几年，我曾以记者和晚辈的身份，数次去木樨地22号楼拜访梁先生，获益良多。

初次与梁老接触，年轻人往往会被他那不苟言笑的表情、尤其是威严的双目所震慑，产生一种敬畏之情。然而话匣子一打开，气氛就显得轻松多了。

梁老似乎永远戴着一顶黑色小帽，有时穿中式布褂，有时穿一身藏青色的中山服，左边衣袋里插着两支钢笔，对于客人，无论是老友还是晚辈，他都请对方在沙发上就坐，自己执意坐在木椅上交谈。梁老操一口纯正的京白，讲起话来慢条斯理，不慌不忙，由于记忆力强，许多地名、人名、时间都无需搜寻，加上措词严谨，缓缓道来，几乎不用做什么整理即形成文章。

对于梁先生的学术思想，我未曾研究过，因而话题较少在学术问题上，只是在谈其他人物时有所涉及，我所感兴趣

的是他的经历，他在重压之下的心理，他的长寿之道，等等，这些问题，在数次拜访中，老人都坦率作答。

“毁誉不动真气”，记得梁老有一次在回答我的提问时，这样讲道：“在学术上发生争执，总是难免的，有不同观点可以争鸣，但不能动气，生气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会伤害身体，于健康不利，至于其它什么事情，都应该尽量保持平静，心胸开阔一些。”

这段话，随便一个什么人说起来都是轻松的，但出自梁先生之口，则不同寻常。他的一生历经坎坷，能在惊涛骇浪之中闯过来，而精神和身体都不垮，需要何等的勇气与修养！梁先生的“不动真气”该给人们多少启示。

梁先生平时作为赠友或自箴的警句，就我所知，大致有如下数条：“无我为大，有本不穷”；“独立思考，表里如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再就是：“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

这后一条是梁先生自撰的，言简意赅，道尽了修身养性的哲理。“气贵和”一句，与“毁誉不动真气”有相似之处，不再赘述，而“情贵淡”一句，似有必要多写几笔。就我理解，此处的“情”，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喜、怒、哀、乐之类的“性情”，另一层意思，则是指癖好、闲情逸致。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梁先生这位名家，书房中竟无一幅名人字画，也没听说有什么金石收藏，壁上悬挂的，只是普通的挂历，藏书也不如我所想象的那么多（也许是未看到）；书桌上的文稿、信函却不少。我想，梁先生一生，致力于为社会作贡献，终日沉湎于学术研究之中，自得其乐，

已无暇顾及收藏之类的“雅兴”了。后来拜读梁先生《我的努力与反省》，方知梁先生原来也有过一些珍贵的收藏品，诸如古玩、藏书、字画、信札，其中有明清名家法绘，从戊戌维新到东西文化论战的各家手札等，不过这些文物古籍并非梁先生费心搜罗，而是其曾祖、祖父和父亲当了三代京官而陆续购买的。遗憾的是，这些珍贵文物都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撕毁、烧毁或抄走了。

然而，遭此劫难，他却能保持平静，他说：“我向来反对附庸风雅，对名人书画也不感兴趣。”因而未受太大刺激，只是当时有两册大部头洋装书《辞源》、《辞海》也被烧掉，令他“心里很不愉快”，因为两部书是他向一位四川的学生借阅的，如此一来，无法物归原主了。

尽管如此，梁先生仍能保持正常的情志，潜心思索学术问题。在被抄家、烧书、游街批斗之后，他以73岁的高龄，排除一切干扰，在简陋的小南屋，在无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写完《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或许，这正是“情贵淡”的使然吧？

清人张岱说：“人无瑕不可与交，其无真也；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然而梁先生却是有瑕有癖之人，“真气”是邪毒难侵的浩然正气，其“深情”是执著学术的痴迷之情。

或许较少有人知道，“文革”中，作家老舍先生不堪凌辱，在北京太平湖投水自杀之后，第一个来此凭吊的，正是梁漱溟先生。当时京城正处于“文革”的“红色恐怖”之中，但古稀之年的梁先生却独自一人从所住的积水潭小铜井胡同赶往太平湖，在湖边徘徊许久，凭吊逝者。当时，有位

年轻人见老先生在湖边走来走去，担心他会寻短见，便在一旁观察，继而上前打招呼，梁先生明白对方的担心，直言相告（大意）：你以为我会投湖自杀吗？年轻人，当年我父亲就是投湖自杀的（笔者注：梁先生之父亲梁巨川先生辛亥革命后殉清自沉），可是我不会，我今天来这里，是要悼念一位朋友，如此而已。

梁先生身上，体现出一种自信精神，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傲气”，他在自我反省时，也并不讳言有“傲气”的一面。但笔者以为，自信与“傲气”虽在表象上有某种相似之处，但不可混为一谈。作为一个学者，具备自信精神是极其可贵的。梁先生逝世前几个月，我曾再度请教：“在风云变幻面前，如何保持平静安宁的心态？”当时先生答道：“我的人生态度一向如此：毁誉不动真气，因为自身充满自信。”

我甚至以为，自信精神不仅鼓励着他去探求真理、坚持真理，而且也是其健康长寿的重要因素，且不说梁先生晚年所经历的众所周知的厄运，在中年时代，他在华北敌后历尽艰险，在香港的炮火和海面的惊涛骇浪中，数次历险，但他却有一种“天不亡我”的自信，“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朋友称之为“若无其事”。

在《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文中，梁先生写道：“……其实我原是心强而身并不强的人。不过由心理上安然，生理上自然如常耳。你若是忧愁，或是恼怒，或是害怕，或有什么困难辛苦在心，则由心理马上影响生理（如呼吸、循环、消化等各系统机能）而起变化，而形见于体貌，乃至一切疾病亦最易招来。所以心中坦然安定，是第一要事。”我以

为，这段话是符合科学的，值得深长思之。

在与笔者谈及长寿之道时，梁先生用“少吃、多动、平淡”六字作了概括。所谓“平淡”，主要指心理方面，前文已有论及，另两项则有必要略作介绍于下。

他说，“少吃，指的是饭量小，不可暴饮暴食，饮食过量，牛食鲸吞，对健康有害无益。吃八成饱就可以了。”梁先生20多岁时，曾有出家念头，后考虑到父母伤心，未能如愿，但却从此开始食素，坚持70余年，据先生自己说，他喜欢吃豆类制品、鸡蛋、牛奶，尤其爱吃青菜与水果，经常吃些粗粮，但食量均较小。此外，盐和糖，均少量摄取，平时也喝些淡茶，偶尔还饮点低度啤酒和葡萄酒。

“多动”，指经常活动筋骨。梁先生认为，“老年人不爱动，最易招病。经常活动，有利于增强血液循环，延缓衰老过程。”

谈及自己的锻炼方式时，梁先生说：“其实我的做法也没有什么难度，关键是要坚持下来，时间越长，越见效果。”

记得最后一次见到梁先生，是先生逝世前几月，此时他已届95岁高龄，那一次我未敢打扰梁老，虽是就有关问题请教其长子梁培宽先生。培宽先生六十有三，诚恳平易，朴实的举止中，含有一般儒雅的风度，在其父亲晚年的著述活动中，他起了较大协助作用。那一天，临近黄昏，我与培宽先生坐在饭厅的餐桌边低声交谈，梁先生在书房桌前，取掉眼镜，吃力地读着一本什么书。他眼睛离书页很近地读着，每隔几分钟，总要习惯地动一下脚，因此不时传来“嚓”地轻微响声，他读得那么专注，仿佛外界的一切都不复存在。

后来，蒙培宽先生表示我可与老先生交谈片刻。梁先生

坐在沙发上，培宽先生恭恭敬敬地递上一瓶“生脉饮”，老人接过仔细地啜吸着。待梁先生吸完，我问道：“梁老，您对自己这一生作何评价？”

老先生缓缓答道：“我自己不能评价。我不过做了一个文化人该做的事而已。”

数月之后，亦即1988年6月23日上午，这位当代大儒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我当晚闻讯后，赶到木樨地梁宅表示悼念之情，培宽先生介绍说：“直到临终之际，家父依然神智清醒，当医生抢救，量血压时，他仍平静地说：‘我需要安静，需要休息。’几分钟后就过世了。”

培宽先生还介绍说，梁老是两个月前住院的，病情还算平静，病因是肾动脉硬化引起慢性肾功能衰竭，造成尿毒症而导致内脏衰竭，本来第二天就要动手术的，却不料……

“家父一向把生死看得很淡，”培宽先生说，“前些天他还在病榻上对我说：‘人寿有限，我虽算长寿，但自觉寿数已经到此，因此不要花费太多人力财力，勉强维持生命……’”

这就是一位哲人，一位智者的超然态度。

此后不久，北京举行了梁漱溟先生追悼会。当治丧办公室将通知寄到我所在的出版社时，其时我正在南国海滨，未能参加追悼会。而今一晃已是三年，在梁先生逝世三周年之际，就让这篇文章遥寄我的悼念之情吧。

（原载1991年8月《爱我中华》创刊号）

漱溟先生的峻峭风骨

曾敏之

梁漱溟在北碚的日子

在去年8月号的《良友》上读到《梁漱溟先生访问记》，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从1947年至1949年，他躲在虚幻的桃花源——北碚，讲述和写完了《中国文化要义》。许多朋友北上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他有点置身事外，不问不闻……”

读到这里，不禁引起了强烈的怀旧感情，于是回顾我到北碚会见梁老的一段往事。

北碚位于嘉陵江畔，北碚公园里树木葱笼，有四时不谢之花，小楼掩映于绿树丛中，可说是一个十分幽静的环境。梁老看到当时国共的和平谈判已经破裂，内战已不可避免，他辞了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的职务，应聘到能仁书院讲学，于是就寄寓到北碚公园的一座小楼上了。

我是在调离重庆，准备南归广州的前夕去探望梁老的。在重庆几年，我参加过国共谈判的新闻采访活动，参加过旧

政治协商会议的新闻采访活动，与梁老可说是很相熟的了。我对他以师辈尊之，常常向他请益，他也循循善诱，是无活不谈的。其实，我与他相识应该从1943年算起，我们同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桂林，他一度因与后来成为他的夫人相恋，打破他终身不娶的清规，他自认是“不设防城市”而陷落，所以传为轰动一时的佳话。我写过一篇特稿记述了这一段轶闻，因此梁老在北碚虽然息交绝游，潜心于著述，但对我的拜访欣然接见，他二老还以素食款待了我。

在梁老的小楼中盘桓了半日，他向我叙述写《中国文化要义》的动机。当时他已判断内战前途是国民党垮台，中共可取得天下。中国的历史将进入崭新的阶段了。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民族的出路如何？他静居于北碚就是思考这些问题。他是结合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来观察今后形势发展的，所以他把自己的思想认识寄托在著述上。

1947年，梁老约50岁，精神矍铄，清癯得有一点仙风道骨的样子，可是他以标准京音娓娓而谈，历时虽长而毫无倦意。当我向他告别的时候，他挥笔写了一幅书法赠我，大意是勉励要勤于学习，阅历人生，使自己“日进于健举高翔之域”。

自北碚与梁老叙别之后，已快40年了，这漫长的岁月，我们不再会面，只是在风风雨雨中知道他的信息。如今传来他的噩耗，令我有未能再见一面的哀伤。但是他以峻峭的风骨，成了知识分子所共仰的典型。北望京华，我深深祝他安息。

梁漱溟的“义不苟合”

“文革”已过20多年了。

检点史料，得见梁漱溟先生在当年“四人帮”策划“批林批孔”实际是批周公（恩来）的运动中，他以大无畏的精神，顶着逆风，对批孔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他认为：

“孔子的学说，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把学术研究和政治问题搞在一起。

“今天我们若轻率地贬低孔子、抬高孔子，皆于孔子无所增损，只是荒唐妄为。”

梁老与批孔对立的观点、态度，使他挨了历时半年的批判，却没有办法把他批倒。最后，他严肃地向批判他的人说出了心里的话：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批梁时是1974年。刘少奇、彭德怀已先后被“打倒”了，揪斗了，已是无法无天的世界了。可是梁漱溟却在批判会上陈辞，说“刘少奇、彭德怀有路线，他们有自己的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公开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他认为刘少奇、彭德怀是光明正大的。

梁老十分幽默而带有蔑视的味道向批判他的人提出：

“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

“义不苟合”，“独立特行”，梁漱溟在“文革”的表现，可说当之无愧也。

学人本色

在一本刊物上看到一张照片，是李大钊、张申府、雷国能、梁漱溟四人合照的，距今已67年了。

梁漱溟追忆拍照的往事，说他们是同在北京大学时代时相过从的朋友。梁漱溟当年受蔡元培之聘，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李大钊则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他们工作之余，常结伴出游，因而于1919年在中山公园有合影之举。

李大钊是中共创始人，1927年春被捕从容就义。据梁漱溟说他当时曾赶到二龙坑朝阳里旧居慰问在哀泣中的李大钊夫人，并与章士钊的夫人吴弱男共商殓殮事。梁老追忆说：“回顾当年，守常（即李大钊）他们都是共产党人，而我根本是党外之人，我本人无过问政治意向，他们也从未有人提出过我入党的事。但这并不妨碍我同他们之间的好朋友关系。”

梁老因而认为中共建党之初，就具有统一战线之想，“始于微细，末于光大”，初无统一战线之名，但却给梁老留下难忘的一段往事。

梁漱溟的经历有如一部现代史。他的平生也与中共的统一战线结不解缘，从乡建派、民主大同盟而民盟，都是在风风雨雨中过来的。但他能辨是非，重操守，颇有一点傲骨，虽曾遭过辱骂，却不以荣辱为怀，终于为世所重。值得称道的还有他的谦虚。他认为李大钊为国捐躯，他虽与李友好相熟，却不敢相比，“也不敢冒昧地自居于交谊深挚之列了”。

谦虚来自自知之明，所以梁漱溟不失学人本色。

1988年

铮铮风骨 表里如一

——悼梁漱溟先生

牟小东

6月23日晚，电视新闻联播传来了梁漱溟先生逝世的消息，我当即沉浸在哀思之中。

我以前对梁先生久闻其名，而对他的为人与学术思想却知不甚详。从1953到1973年，20年的时间里，听到有关梁先生的评论，总是一片贬责之声，影响到我，也盲目地对他产生了偏颇之见。

这几年我思想有了转变。由于一些如实公正地介绍梁先生的文章相继问世，特别是读了汪东林的《访梁漱溟问答录》（《人物》1986年第1—6期，1987年第1、2、5期），戴晴、郑直淑的《梁漱溟与毛泽东》（《文汇月刊》1988年第1期），我开始对梁先生的为人有所了解。他平生力行的“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治学方法和做人品德，每每思之，钦佩、敬重之心便油然而生。

今年初，美国加州大学社会学家杨午晴教授偕其夫人来京访问。在一个小雪初晴的早上，我陪同他们夫妇到木樨地

22号楼看望了梁先生。初次见面，他那清癯面貌，矍铄精神以及有条理的谈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衰老终归是人生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年逾90高龄而又思维敏捷、步履尚健如梁先生者，真是凤毛麟角，当代稀有。

杨教授代表海外的一些朋友祝梁先生福寿绵长，并说大家都很关心梁先生的健康，现在看到老人家如此硬朗，回去告诉他们一定很高兴。梁先生还把自己的著作赠给杨教授和我。他送给我的是最近出版的《我的努力与反省》。他从沙发上站起来，拿起送给我们的书要在扉页上题字盖章。我们惟恐他太劳累了，就建议让他孙子替他盖个图章就行了。而老人家执意不肯，他工工整整一笔一划写了“某某先生指正”，下面署上名并盖上章。这细微处体现了梁先生做事一丝不苟的精神。

梁先生拿出专记来访者姓名的笔记本，叫我们三人分别写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我高高兴兴地照做了。我满心以为结识了这位刚直不阿、学问高深的学者，以后有机会可以前来拜谒请教，谁料想事隔仅半年，梁先生竟溘然长逝，每念及此，不觉惘然若失。

归来后，拜读了梁先生的《我的努力与反省》，我体会到梁先生是一位对民族有深挚情感的爱国主义思想家，他提倡学术救国、教育救国，虽带有知识分子空想主义的色彩，但他热爱民族、热爱祖国的感情是真切的。从梁先生的著作可以看出，他从不唯上、唯书、唯经地思考、论述问题，他的思想是活的，从不僵化。他是一位一生从事思考人类问题的学者。我为我们失去了这样一位风骨铮铮、表里如一的学者而深感悲痛。

1988年7月

梁漱溟先生的高风亮节

吴小如

梁漱溟以95高龄遽尔与世长辞，的确是国家民族的重大损失。他光明磊落的一生应当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遗憾的是，就在梁老逝世后不久，竟有人在某报刊上借悼念梁老为名，把老人比作堂·吉珂德。意思是说梁老毕竟是时代的落伍者，是儒家学派的殉道人。在西方，在世界文坛上，堂·吉珂德当然还不是反面人物形象，但这个艺术形象却包涵着贬义的内容，如落伍、愚昧等。用这个形象来比喻梁漱溟，是非常荒唐而不恰当的。

事实上，说这类话的人并不止一个。在梁老生前，他们之中有的人曾到处向人吹嘘他是梁老的学生，倚师名以自重；而在梁老身后，却比拟不伦地来评价梁老，意在否定梁老的治学与为人。我以为，这样的人比孟轲所鄙薄的“师死而遂背之”的陈相还不如。他缺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起码的人格。

我对梁漱溟了解得不多。但40年来，至少有三件事足以

体现梁老的高风亮节。一是50年代梁老受到了暴风骤雨式的批判，还有《毛选》第五卷为证。这只是美其名曰“批判”，其实比打不许还手、骂不许还口还厉害，即只许别人上纲上线扣帽子，而自己连一点申辩的余地都没有。然而梁老顶住了，走过来了，梁老依然是梁老。二是70年代所谓“批林批孔”阶段，梁老始终不屈服于江青之流的淫威，在处境更为艰难的条件又一次顶住了，而且更加从容不迫地走过来了。人们这时才逐渐认清梁老的为人和他忠于信仰，忠于学术的高贵品质。三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近10年，梁老的爱国言行表现在积极参政议政，尽量参加学术活动，整理自己的各种著作，直到弥留之际还劝远道来访者应当“顺应时代潮流”。这充分说明梁老是一位具有明确是非感和正义感的学者、哲人。如果让那位把梁老比作堂·吉珂德的先生来经受一下梁老一生所经历的遭遇，天晓得他会表现得怎么样！

我认识梁老是由袁虹叟先生介绍的，同老人谈话的次数并不多。梁老对晚学后进的态度是：从不以长者身分骄人，相反，始终以平等关系待人，以理服人，以道义感人，“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不像有些人自命为老作家、大学者，随时随地自我吹嘘，不把别人看在眼里。这里我只想举两件小事：其一，一位知名度不高的画家虚心向梁老求教，梁老竟不辞辛苦，坐着轮椅亲自参加这位画家的画展开幕式；其二，袁虹叟先生比梁老小15岁，我比袁老小13岁，我的学生诸天寅又比我小十六七岁。对梁老来说，我们都是他的后辈。但我们每次或分别或联袂去拜访梁老，老人必定要亲自把我们送到大门口。送客是常情，也可以算是小节，但从而可以看出主人

的真诚坦率或虚伪敷衍。梁老的送客是一丝不苟的，其待人以礼完全出于极为可贵的诚挚友情。记得我曾去拜访过一位知名度较高的人物，他也送出门，但在我向他躬身致意时，他已掉头入内，等我抬起头来，他早把脊背朝着我，随即砰地关了大门。我想这样送客的方式无异于逐客。

我以为，我们应该向梁老学习的，不仅是他的忍辱负重和处逆境时能顶住的涵养，而且是他对人的博大宽容，对己的坚定自信。

1988年9月

廓然大公 物来顺应

——纪念梁漱溟伯伯

张 小 曼

梁漱溟老伯伯不幸逝世的消息传来，使我黯然神伤。我眼前又闪现出几个月前我到梁老家拜访时的情景，又仿佛看到他那蕴含着刚毅和顽强的微驼的身躯，又仿佛见到梁老那双炯炯有神、似乎洞察万物的眼睛。

梁老一生致力研究儒家学说和传统文化，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他一生刚直不阿，敢于仗义执言。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他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无论地位多高之人，梁老也决不轻易苟同；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他也不放弃自己为国为民的一片初衷。

我十几年前在近代史研究所参加编辑《中华民国史大事记》时，就常常在报端见到梁老的大名，但直到去年在全国政协礼堂参加罗隆基先生纪念会时，才有幸第一次见到了梁老。梁老告诉我，他与我的父亲张西曼是很熟悉的老朋友，

并高兴地为我留下了地址电话。今年4月10日，为搜集父亲生前史料，我专程到梁老家拜访。梁老兴致勃勃地与我畅谈近两个小时。临走前，因为我酷爱书法，就斗胆请梁老为我题字留念。梁老问我想要什么字，我说：“梁老，就题您一生中最喜欢的一句话吧！”这时，梁老家的阿姨悄声告诉我，梁老是不肯轻易为别人题字的。啊，原来是这样。这时，只见梁老在一张圆桌上铺开纸砚，饱蘸墨汁，欣然挥笔，一气呵成，顿时在我眼前出现了“廓然大公 物来顺应”这八个苍劲的大字，根本不像出自95岁垂暮之年老人的手笔。惊诧之余，我才发现梁老已笔走龙蛇，很快地在旁边题上“小曼同志留念”，并签上了他老人家自己的名字，接着，梁老又在纸的左下方端端正正地印上了一方篆刻着“九十以后作”的图章，望着这幅珍贵的墨宝，我真是打心眼里高兴。

梁老坦坦荡荡地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他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和崇高的道德风范，值得我们后辈继承、研究和发扬。今天我写下这篇小小的文章，权当一朵小白花奉献于梁漱溟伯伯的灵前。

1988年

梁漱溟勸勉台湾青年

吕 光 光

最近，梁漱溟老人以95岁寿考与世长辞。我从青年时代拜识梁老，深知他关怀青年的成长，强调躬身修己，强调肩危任重，他不愧为青年的师表。

世人或以为梁老在青年时期就显得稳健持重，即所谓“少年老成”，一定与当世的青年有所隔膜，或如西方所称的“代沟”是也。然而，以我的亲身经历而言，梁老是英年有为而锋芒不露，老年有守而童心不改，始终与朋辈推诚相交，与青年开诚相待，从而使人们如坐春风，如沾化雨。表面看来，他的学生并不很多，可通过他的著作和接触承其教泽而许为私淑弟子的人，实繁有徒。

解放前，梁老在重庆北碚办了一所勉仁中学。顾名思义：仁考人也，旨在勉励青年成为祖国的有用之人。及至近年他所著的《人心与人生》一书，“旨在有助于人类认识自己”（《人心与人生·绪论上》）。鉴于青年时期是人们的人生观奠定之期，如何教育青年了解人生的社会意义和时代使命，成为他毕生研究的课题。其中虽不免存在某些“书生

之见”，适足见他对青年循循善诱、玉汝于成的苦心。

今年5月16日我接到一个电话：台湾《远见》杂志的记者尹萍女士来京采访，决计趋访她久已倾慕的梁老，托我代为联系。当时，我已知梁老病重住于协和医院，便介绍她与随侍在侧的梁老长子梁培宽同志联系。由于尹女士情词恳切，声称她在台湾上大学时即已敬重梁老的道德文章，请求见梁老一面，拍两张照片，以作纪念，借慰渴慕。向来平易近人的梁老，便于5月17日在病榻上接见了尹女士，并同意摄影留念。梁老提到在台湾的郑彦棻、胡秋原、李朴生（广东人，曾为梁老编辑过《村治》杂志）三位故旧，尹女士就其所知，作了回答。临别，尹女士叩询梁老：“您对台湾青年有什么希望？”梁老谓：“注意中国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尹女士连连点头，依依惜别。

尹女士有幸：成为梁老最后接见的记者，获得梁老最后的遗言。台湾的青年有幸：受到梁老的教诲，增强祖国观念，明确前进的方向。我们也有幸：三味梁老的遗言，当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统一祖国的纽带，当以时代潮流作为改革大业的准绳。

（原载1988年7月8日《人民政协报》）

病中未敢忘忧国

梁 钦 东

4月下旬祖父因肾动脉硬化影响肺部功能，自觉呼吸困难而住进协和医院，经过将近两月治疗仍无好转。6月20日医院忽然决定改变治疗方案，采用人工肾透析治疗，手术日期确定在24日。不料就在6月23日清晨，祖父因肠胃受到尿毒刺激而吐血。得知祖父病情加重，我们在北京的家人都匆忙赶往医院。当时祖父呼吸更加困难，心跳加剧，已达每分钟172次。11时零5分，祖父示意要小便，我急忙赶到床前侍候，谁知我手中的便壶还没有放下，身旁的一位护士忽然看到心率监视器上显示的心跳次数急剧下降，惊呼一声，我的心也随之一沉，预感到情况不好。病房里几位医生护士紧急做人工呼吸抢救。但这一切都太晚了，祖父终于没有能够再睁开他的眼睛。

在祖父住院期间，家里人轮流前去陪伴看望，我们多么盼望祖父能够平安的回家，想不到他竟这样匆匆地离开我们而去了，大家禁不住失声恸哭。

祖父一生做人做事认真，不肯丝毫苟且，却从不计较个人身家性命。住院期间他曾经这样说：“一个人的寿命总是

有限的。岳美中^①大夫说过，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这个话很要紧。我的寿数大概就到此为止了，不要勉强做很多事来延长寿命。吃点药、吃点可口的东西就可以了。”语调平静而安详，毫无伤感的意味。联想到40多年前祖父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自香港撤回内地后，曾写有家信“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其中谈到身处险境自己的心理时曾有这样的话：

“《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这话说得何等的自信！祖父一向把“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看作自己一生的使命，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我把我的安危一付之于天，不可过分的计虑（自力所不及，而偏偏斤斤计虑即为过分）。我尽我分（例如尽力设法离险），其余则尽他去，心中自尔坦然。”因此当他觉得自己的使命未完，正当努力奋斗时便绝不轻生；在他认为自己已经衰老，不能再为世人做更多贡献时也绝不贪生。

通常老年人总想在临终对家人做些嘱咐。祖父在住院期间头脑仍十分清醒，但他对于个人和家庭却绝无丝毫牵挂。如果说他对自己身后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那大概就是中华民族的前途。住院期间台湾《远见》杂志社记者尹萍女士曾前往看望，她谈到自己在大学里就读过祖父的著作，同时问祖父对台湾的年青人有什么希望请祖父说几句话。祖父以缓慢而庄重的语调答道：“注意中国传统文化，”喘息一下，又说道“顺应时代潮流。”我想这两点不仅是对于台湾

^① 岳美中是当代中国著名中医。

青年的希望，也是对国家民族的关心与忧虑。而这正是他老人家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回到家中，站在祖父空荡的卧室里，我又一次地想起祖父平时对于我们的教诲。他常常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发自内心，要有真心大愿，志向既定，便要努力去做，定能有所成就。记得1979年我初入大学，因为专业分配问题而烦恼，祖父得知后马上写信要我不必为此而懊丧，“得失利害之念愈少愈好，应当有一切平等观。要超然物外，高瞻远瞩，莫堕入得失成败窟中。心思堕入得失成败窟中，胸怀不能高爽（高超爽朗），更易错置多乖，更容易失败了。——以上的这些话宜细加研味，切勿弃置，负我之望。”近年来我陆续读了一些祖父的著作，在那充满真情实感的字里行间更感到他人格力量的伟大。祖父教诲，钦东没齿不敢忘。

祖父去逝了，他老人家为中华文化的发扬，为中华民族的富强操劳了一生，他太累了。临终前他几次轻声地说：“我要休息！”

“我要休息！”这就是祖父留在人世间最后的遗言。

1988年

侍疾日记^①

梁培宽

4月24日 清晨6时闻铃声，去父亲卧室察看，说呼吸不畅，觉胸闷。起床推迟至8时，后略有好转，但仍较昨日为重。1985年初即确诊父亲肾动脉硬化，引起慢性肾功能不全。三年来注意控制含氮饮食，并长期坚持服用有助于改善肾功能药物，病势发展较慢，但近几个月父亲不适情况加重，说明病情趋于恶化。

4月25日 上午医生来家中巡视，建议去协和医院检查。午后陪父亲去协和门诊部。医生诊视后说须留院作进一步检查。医生语气肯定，似不容提出异议，看来病情严重。随即转住院部，并电话告知恕弟等。当晚陪父亲住于病房。

随父亲早就寝，但念父亲病势严重，迟迟难入睡，只觉寂静无声的病房愈加冷清。

4月26日 上午医生查房，说肺部有杂音。晚6时医生来告知尿素氮化验值达100，几近仪器显示极限，问题仍

^① 此为1988年先父住院至病逝时的日记摘抄。——作者

为肾功能衰竭，气喘系血液中积累大量尿毒素，刺激肺部所致。父亲整日沉默不语，有时双眼紧闭，有时小睡，想是尿毒随血液至大脑，受刺激所致。

4月27日 上午打点滴（青霉素），并用药液灌肠（药液含大黄，以促使肠道多排出尿毒）。午后输血，血液中尿毒浓度随之降低，父亲精神好转，饮食情况亦好于昨日。

在病房代笔写好发言稿，供恕弟以父亲名义在卢作孚先生95周年诞辰纪念会上宣读用，因父亲已不能亲自出席。卢先生是父亲最敬重最相知的朋友。他尝说，卢先生这样品格的人，社会上找不到。发言稿即本此意写成。

4月28日 应院方要求，午后我与恕弟听取医生全面介绍父亲病情，并商议治疗方案。政协联络处也有人来。医生明确说，父亲肾功能衰竭已至晚期，只有用血透析法，但因病人年迈，不能施行动脉静脉搭桥手术，故无法采用。如改用腹腔透析法，极易感染，且病人痛苦。因此医生认为今后只能用“对症治疗”的办法，实际是消极应付的办法，只能一时的遏止病情恶化，以拖延时间而已。面对如此严酷的事实，我们只有同意院方意见。

父亲或将辞别人世这一阴影，自入院以来即时刻笼罩我的心头。今日医生的情况介绍似使人感到这一不幸时刻更加迫近，于是不由得想起入院前10天父亲去良乡的事。那天他冒着五六级大风，在我们儿孙陪同下带病去看祖父的墓地。父亲曾说，是由于祖父人格的感召，使自己心灵隐然萌露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是祖父成就了他。或许他预感将不久于人世，而特地去良乡墓地向培育自己的父亲作最后一次的告别？

5月1日 晚邀北大一谙气功青年教师来为父亲发功治病。事后他说，注意饮食与睡眠有无变化。

5月3日 父亲今晨醒来精神较好，要自己下床洗漱，后为医生劝阻。午前李、阎先生同来探望。阎先生说，望先生早日康复。父亲答：我命已尽，康复不了了。语气平静，神情坦然。午后大表哥和四姐来。大表哥怕影响父亲休息，离去前问是否少来些好。父亲说，还是多来好。显然他还想多见亲人几面。

5月4日 今日北大校庆，返校见由父亲署名我整理成文的《感念的岁月》已刊载在校庆纪念文集上。

5月5日 父亲今日食欲甚好。医生昨日以为不久可出院，在家中用药物灌肠法维持。但今日又改变主意，因尿素氮化验为110以上。

5月9日 灌肠停，改服泻药（其中也含大黄）。今日腹泻甚烈，一日多次，病人痛苦。向医生反映后，同意明日暂停。李健生女士（章伯钧夫人）由张燕妮（张申府先生之女）陪同来探视。

5月11日 父亲近日拒服泻药，又不同意药物灌肠，而目前唯有通过肠道多排除些尿毒，病情方可稍有缓解。如果二者同时停用，病情只会急速加重。

午后4时去医院值班，陪父亲默默地呆在病房里。晚8时许，父亲呼我至床侧，示意有话要向我说。我急忙取来纸笔，作记录如下：

“人的寿命有限度。岳美中大夫说，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这话要紧。我的命已经完了，寿数就是这样了。有时候吃点药，吃点合口味的东西，最多了，不必延长寿命。

话就是如此。”

因病情严重，父亲将不久于人世，这我们心里明白，只是不愿说出口，好似晚一天谈出来，就可以推迟一天。今晚父亲自己首先提出来了。他说的时候，毫无伤感悲戚之意，语调自然，神情泰然，就好似说旁人的事。当然，这也可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早在他50岁时，自香港脱险后给我与恕弟的长信中就吐露了他心中惦念的只有自己应尽而未能完成的历史任务，至于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1976年他83岁时，在写成《人心与人生》一书后，在致友人信中又写道：

“我要做的事，大体将完功。虽精神身体俱佳，随年寿之自然，亦或将去矣。”“我一任其自然，无意求速，亦不作推迟之想。”“任其自然”，这就是今日父亲的态度。

5月15日 住院已有三周，父亲多双眼紧闭，沉默不语，也不呻吟，却无一丝好转迹象。

5月17日 为接待台湾来访记者，下午提前赶往医院。当我伏在父亲耳边告诉他，《远见》杂志记者尹萍女士来自台湾时，他说起在台湾的一些熟识的人，如张群，郑彦棻、胡秋原、李朴生等。随后尹萍问：“你对台湾青年有何希望？”父亲不假思索立刻答道：“注意中国传统文化。”并补充说可以看他的《中国文化要义》。尹又问还有什么要向台湾青年说的。父又说出了这样一句话：“顺应时代潮流。”

民族自救，国家振兴，这是他终生为之探索、为之奔走的事，在他不久将离开人世之时，他心中挂念的也唯有此事！“注意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这两句话岂只是对台湾青年而说？

5月21日 再次劝父亲服药，勉强同意。上午叶笃义先生方到不久，台湾大学韦政通教授又来。父亲用微弱的声音向我说，他已无力与客人谈话，要我转告客人，并向他们致歉意。中国文化书院来人为访问者录相录音。韦先生立于父亲床头合影后离去。

5月23日 田园再次来信，力劝采用血透析法。统战部有局长等三人来探望。

5月24日 父亲食欲仍极差，吃西瓜尚较多。北大张岱年先生来探望。

5月28日 住院并无有效治疗，而父亲又一向视住院为畏途，每住院即心情不好。下午向院方提出回家调养治疗要求。

5月31日 《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一书校样寄到，要求周内校毕退回。今既见校样，书出之时指日可待。晚饭后去医院值班，将收到校样事告知父亲。父亲为此书所写合印叙中说：严立三先生的《礼记大学篇考释》，“苟不重印，其必绝而不传”。伍庸伯先生“一生谈学而不著书”，“苟不为之记录其词，……则其湮没可以立待”。他自己“又为综述一文加以阐发”，“凡此皆须付印问世”。“然而究在何时付印，不敢知也，窃望及身见之耳。脱不及见，当以属之愚子若孙。”而今此书付印有期，想父亲当感到欣慰，只是印成出书，父亲仍恐难“及身见之”。这又是一憾事！

6月1日 上午医生来告知化验结果尚好。因父亲一度拒不取血，无化验结果已有一周。

6月3日 夜间值班后回家，继续看校样。

6月6日 继昨日低烧，因此医生命暂缓出院。继续看校样。

6月9日 往复兴医院家庭病床科，联系自协和返家后治疗事。

6月10日 《解说》一书校样阅完，退巴蜀书社。父亲在此书合印叙中写道：“顾儒学则由清季之奖西学，‘五四’之摭孔学，与夫今日之反封建，迄未见有否极泰来之象。然则儒学其从此遂为过时的一种学术资料而已乎？世有通人，宜不存此浅见。”前不久他对台湾记者说：“注意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再次表示他病危之时仍念念不忘儒学能有昌明之日。

6月12日 近日为准备出院事，与协和、复兴医院及政协联系交涉，占去时间甚多。父亲家中卧室也另加布置，加折叠床，备夜间有人陪住用。连日为代写复信也耗去时间不少。

6月15日 午后因无力排痰，呼吸受阻，一度紧急。经护士协助除痰后始好转。

6月16日 输血，精神稍好。

6月18日 今日医生忽提出配用小型人工肾采用血透析法建议，据说是与院内肾病专家共同研究的结果。住院之初医生曾明确认定此法不可行，而今在拖延了三周之后，又转而认为此法可行。前后变化180度，殊费解。但目前病人情况紧急，似别无选择。

6月19日 田先生自上海来电话，再次询问病情，并表示愿来京参与服侍工作。

6月20日 与家人、大表哥及李先生等商议后，决定

同意医院治疗方案。因父亲身体甚虚弱，无精力听人谈话，故未能向他详细讲明，只能简单的一说。上午即持协和医生介绍信，往远在西北郊的309医院，约定24日下午派医生来协和，为父亲作动脉静脉搭桥手术。

6月23日 早饭后去政协，落实明日派车接309医院医生来协和作手术事。当我步入联络处办公室，未及我开口，即告知医院来电话称父亲病危，促速往。10时许我赶至协和，入病房后只见病床已移放于室中央，床两侧均有医护人员，周围还放有各种器械和装满药品的手推车。大家神色严肃，分别忙于注射或输氧等。此时监护仪显示心跳最高达每分钟170次以上。为采取种种救治措施，医护人员须不时挪动父亲的躯体或四肢，因他已无力自由举手抬足，而不断地挪动似又使他痛苦。他以微弱的声音说：我累了！我要休息！我要休息！不久一位护士惊叫一声，我们心头随之紧张。原来这时（11时零5分）仪器显示父亲心跳次数突然急剧下降。于是床两侧的医护人员同时很快的动作起来，而随着情况愈紧急，他们动作就愈忙乱，有的在注射，有的作胸部按摩，以促使心脏重新起跳。而此时我们家属在本不宽敞的病房里不免显得碍手碍脚，于是医生要我们有些人暂时退出病房。可是用尽了一切办法，父亲的心脏在间断地跳动若干次以后，终于再也跳动不起来了。原来忙乱的病房，立刻静了下来。这时时钟指着11时35分。就是在这个时刻，父亲那颗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昌明，为中国民族的振兴，而搏动了95个春秋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他终于离我们而去。关于他自己，关于他的亲人，他没有留下一个字的遗言。可他心中却挂牵着他那未了的心愿，

因此说了“注意中国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那两句话！

“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这是父亲60多年前自撰的联语。现在他终于怀着“我生有涯愿无尽”的遗憾撒手而去！但他那“心期填海力移山”的精神将永远感召着一切有良知的人们！

编 后

今年是梁漱溟先生诞辰100周年，也是他逝世5周年，桂林梁漱溟研究会届时将举行学术讨论会，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桂林博物馆为纪念这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桂林文化名人，并为社会各界提供一份有关梁漱溟先生的详实史料，特编辑出版《回忆梁漱溟》专辑，献给桂林——梁漱溟先生家乡的读者。

本书所收史料，有的是第一次发表，有的虽已散见各地报刊，但为读者不易看到，特汇编成册，使读者对梁漱溟先生一生的思想活动有一个概略的了解。由于梁漱溟先生是中国当代史上争议较多的一个历史人物，关于他的思想，关于他的为人，关于他一些言行的是非曲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读者自可以从大量的史料中细细加以分析和区别并得出较客观和公正的结论。

由于少数稿件在出版前无法与作者取得联系，故本书出版后，望有关作者与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室联系，我们将按国家有关规定支付稿酬。

编 者

1993年2月5日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桂林文史资料 第二十三辑 回忆梁漱溟

作者 =

页数 = 237

S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